

导 言

王长江

在近年来的政治问题研究中，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执政失败的教训，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毫无疑问，这种现象，是和我们倡导研究政党执政规律、深化对执政规律的认识相关联的。

什么是规律？规律就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所以，规律又称为法则，表示它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面。政党执政规律也不例外。众所周知，在政党政治的条件下，所谓执政，简言之，就是政党以一部分人（或全体人民）的名义对公共权力实施占有和运用的行为。据此，政党执政规律可以表述为：执政党在控制和行使公共权力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反映政党政治本质和必然性的法则和客观要求。

既然执政，就要研究执政规律，这听起来就像说“既然生存，就要研究生命存在和发展的规律”一样自然。但是，这种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常识的东西，上溯 20 年，却并未完全被我们作为常识来接受。这不是说我们从来不讲规律问题。问题在于，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政党，就是因为它是掌握了规律（其中自然也包括执政规律）的政党。这个规律，在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既然掌握了这样一个最根本的、能统驭其他所有规律的规律，那么，对执政规律的掌握就

不言自明了。在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客观地说，我们对政党执政规律的研究是忽视的，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下的功夫也显然是不够的。

研究不够，不仅仅是一个学术上的缺陷，而且主要不是学术上的问题。最主要的恐怕是，它一方面使我们的执政实践缺乏科学性，对权力的控制和运用带有更多的粗放的、经验主义的特征；另一方面则不能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避免犯大的错误，尤其是避免犯别的国家、别的执政党犯过的错误。从总体上说，我们党是一个善于进行理论思考、善于从自己和别人的错误中学习的党。但是应当承认，在这两个方面，我们还是有过多曲折和教训。这说明了社会主义探索道路的艰巨和复杂，也说明，熟悉执政规律，把握执政规律，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现在，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我们终于对政党执政规律的问题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我们看到，一个政党，并非把自己的性质定在工人阶级先锋队上，把自己的指导思想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就等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就会自然而然地按照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办事。相反，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工人阶级政党本身的生命力，恰恰在于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和本国、本党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与时俱进，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我们看到，和领导民主革命相比，我们党的环境、地位、任务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执政党，怎样执政才科学，怎样执政才有效，怎样执政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可，都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的答案，需要我们自己去探索。即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执政既不科学，又缺乏效率，最终也会失去人民的信任。我们看到，一些长期被认为执政地位有保障的党，却在不经意间失去了执政地位，而一些并不被我们看好的党，却长期、反复执政，不但在它们本国，而且在国际上，都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所有这些，都迫切需要我们深化对政党执政规律的研究。这

种紧要性和迫切性，把政党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这种理论走向看作党理论上和实践上成熟的一个重要体现，看作我们党“执政党意识”的新的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

研究政党执政规律，就必须拓宽视野。规律讲的是共性的东西。政党执政规律，自然应当既包括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包括非马克思主义政党；既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也包括西方国家和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这个问题上，以往认识的误区是，往往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看作和其他政党完全不同的现象，似乎没有任何共性和可比性。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全面的。的确，就政党的性质而言，代表不同阶级的政党，其行为特征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哪个阶级的政党，都以取得政权为首要目标，都为取得政权而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都要在执政后努力推动社会发展以便继续执政，都要在用好权力的同时也防止权力的腐蚀，以避免失去公众信任而垮台——在这些方面，政党又有更多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不仅仅要求我们以比过去更大的宽容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世界，而且要求我们从比较、借鉴的角度，以吸收人类共同政治文明成果的视野，来认识执政规律、把握执政规律。把承认相似性与抹煞阶级性等同起来，没有任何道理，只能妨碍我们的思维进步。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应中央党校出版社之约，编写了本书。我们选择了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政党作为案例，从探索执政规律的角度，对它们的执政活动进行分析，对这些政党执政失败的教训加以总结，以期从中得出对我们党有益的启示。虽然总体说来，本书的写作还比较粗糙，尤其是，究竟应该从哪些角度进行研究，这里也只是一家之言，但是作为研究浪潮里的一朵浪花，对于推进研究和思考的进一步深入，总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使得我们有了把这本书呈给大家的勇气。

二

我们选择了一些长期执政、同时又经历了执政失败的大党、老党作为典型，其中包括苏共、东欧共产党、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印尼专业集团、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和国民党。这些政党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它们在本国国内长时间占有较大优势，其他政党，即使是理论上完全平等、完全独立，在现实中也不存在执政可能，于是出现了这些党单独长期执政的局面。就这一特点而言，研究它们的执政经验和执政失败的教训，对于保证我们党长期执政、避免重蹈这些政党的覆辙，更有直接的意义。

例如苏共。作为一个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苏共的历史是伟大而荣耀的。但是，在执政 74 年后，苏共不是独一无二地继续执政，而是在改革中把国家的性质改变了，把自己的执政地位改丢了。这样的事情何以发生？到底是本来就不应该改革，还是苏共由于自己不把握执政规律，从理念上、方式上、体制上就没有解决靠暴力革命获得政权的共产党如何执政的问题，以至于被改革这个“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草”所压垮？到底是本来是“好端端的”党，后来只是因为出了“叛徒”、“修正主义”而突然死亡，还是苏共本身早就是一个百病缠身的党，以偶然的方式走到了必然的尽头？探索和回答这些问题，不只是发展学术的需要，更是政治问题，因为从那里得出的结论，对我们党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是至关重要的。和苏共一样，我们党也靠领导暴力革命夺取了政权；我们也曾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我们也曾痛感这套体制的弊端而转向改革。但是，苏共却因此而垮台。如果不能正确地总结和吸取苏共失败的教训，旧的思维很可能把我们引向歧途。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党在历史紧要关头把住了方向，换来的是今天大步迈向更平衡、更全面、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大好形势。当然，为了使今后的路走得更好，我们仍

有必要继续深化对苏共失败教训的研究。

又如日本自民党。自民党在日本政治舞台上连续执政 38 年，创造了日本走向现代化的辉煌历史。就是这样一个为日本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党，在 1993 年选举中居然也遭遇了政治“滑铁卢”，失去了执政地位，然后分化、重组，往日无可匹敌的地位不复存在。这次失败，原因固然复杂，但是，总根子恐怕就在于自民党长期执政而形成的党、官、商“铁三角”。这套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既给自民党带来了丰厚的利益和好处，也使得它陷在金权政治的泥潭中难以自拔。自民党不是不想摆脱这种“铁三角”的纠缠，三番五次提出改革，甚至把它摆到“政党现代化”的总框架中，可谓设想宏伟。但是，所有这些都以不了了之而告败。自民党由盛而衰的历程，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问题：一个长期执政的党，由于和权力结成了紧密的联系，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来自权力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如何能够既科学地运用权力，又有效地防止权力的腐蚀？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执政党不能有效地抵御权力的侵蚀，即使它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它的执政地位仍然会遭到挑战。甚至在一党制的条件下，亦是如此。无独有偶，印尼专业集团的执政失败，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一点。

再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这又是一个长期连续执政的政党。如果按连续执政的时间长短排序，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紧随苏共之后，达 71 年之久。在这 71 年里，墨西哥是拉丁美洲经济、政治、社会最为稳定的国家之一，甚至被认为创造了不发达国家发展的奇迹。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执政，并取得显著成就，自然有它的奥秘所在。其中最大的奥秘在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依托它独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把纷繁复杂的社会阶级、阶层、集团有效地整合在一起，使各种声音都能够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得到表达和反映，使社会大多数都积聚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周围，从而加强了社会的凝聚力。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为墨西哥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于

是，奇迹就发生了。可惜的是，革命制度党“成于斯，亦败于斯”。在面临时代变化的情况下，这个党虽然采取了积极应变的态度，却由于新的官方意识形态损害了社会多数的利益而难以被公众所接受，革命制度党的政治资源因此而大量流失。加上长期执政造成的和钱、权之间扯不清的关系，革命制度党政权便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危机。羽毛渐丰的在野党看准时机，当仁不让地扯起分道扬镳的旗帜，一举夺走了政权。革命制度党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执政党不能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建立在社会大多数认可的基础上，它的执政地位就必然发生动摇。

还如印度国大党。国大党在印度长期执政，本身就是一件令人称奇的事情。因为印度实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被西方人认同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与此同时，印度又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在这样一种极不相称的条件下长期执政，已属难得。况且，印度的社会状况远比西方社会要复杂得多，更为执政增加了难度。所以，我们不妨说，国大党的执政总体是成功的。但是，我们仍然不能不看到国大党的衰落。在导致衰落的众多原因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党执政那么多年，印度还是经济落后，社会上还是有那么多的穷人。农民问题没有解决，社会贫富悬殊问题没有解决，各阶层平等问题没有解决。这就难怪国大党的执政地位总是不断地受到挑战。印度国大党的执政史给我们的启迪是非常直接的：如果一个执政党连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都没有，那么，它的执政能力就很难不受到公众的质疑。如果经济在一个时期内不发展还情有可原，那么，长期不发展则使得任何理由都难以立足。

至于国民党，就更值得我们研究了。虽然败走台湾，但到了台湾后在台湾发展上所做的事情，还是可圈可点的。论经济，国民党抓住机会，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论政治，国民党不但有效地控制了台湾局势，而且还主动推进了“政治革新”；论队伍，国民党原有的班底也足以令其他力量退避三舍。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国民党在 2000 年失去了它苦心经营 50 年的执政地位。“百年

老店”国民党的垮台，显然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执政党的下台更令我们关注。这不仅由于台湾离我们如此之近，而且由于文化的同根性，还由于建党之初国、共两党都受苏共模式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深入到党的政治理念、活动方式乃至组织机制等方面。国民党的失败给我们的教训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无疑是：既然民主政治是中华民族的必由之路，那么，作为一个有强大影响力的执政党，在其中起什么样的作用，才算是承担起了历史赋予的使命，才算是对历史负责的党？

除了苏共和东欧共产党之外，其他执政党和我们党在性质上都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在这些党身上发生的事情和我们毫不相干，更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漠视它，似乎我们只是一个隔着玻璃看海底的旁观者。恰恰相反，我们的研究，正是要千方百计地搞清楚，如何才能独辟蹊径，防止这些党的悲剧在我们党身上发生。

三

如何深化对大党、老党执政失败教训的研究，是又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在传统思维中，人们比较习惯、也比较流行的是两种做法。一是用我们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准则，比如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坚持共产主义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等等，来套这些政党，说明它们失败的必然性。二是把我们党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作为样本，作为成功的范例，来反观这些政党的不成功。很难说这样的研究毫无道理。至少在增强人们的信心、信念方面，这些方法卓有成效。但是，简单的对比，又往往难免失之肤浅。如果说，在研究初期，这样的概括还不失为一种导向深入的路径的话，那么，随着人们思考的深化，这些结论就已经越来越缺乏说服力了。因此，研究大党老党执政失败的教训，需要方法论的改

进。应当从执政规律的层面，来深化我们的研究。

这就又回到我们前面谈到的问题：联系政党执政规律，来研究大党老党执政失败的教训。把这二者联系起来，意味着要从执政党活动的基本规律上，来对政党的执政实践进行探索和总结。

我们知道，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普遍形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民主政治把民众与公共权力的沟通与互动作为确立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而政党恰恰成了建立这种沟通和互动的桥梁和纽带，成了人们进行政治参与的不可少的工具。由此而论，实际运作中的民主政治，不管属于什么性质，不管姓社姓资，都由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组成：民众、政党和政府。这三者之间的互动、连接，构成了民主政治运作的基本框架。

三者的联系产生了若干对基本政治关系，例如民众和政党的关系，政党和政府的关系，民众和政府的关系，等等。但是，由于民众和政府的关系是靠政党来连接的，所以民众和政府的关系主要通过前两个关系反映出来。这并不是说，两大关系就足以反映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了。除了这两大关系而外，必须提及的另一个重要关系，是执政党的党内关系。因为执政党作为掌握着公共权力的党，特别是当没有其他政党拥有实力与之竞争的时候，其党内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它控制公共权力的效果。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对政党执政规律的研究，说到底，就是对三大关系互动作用的研究。

三大关系又进而衍生出一系列次一级的关系。例如，在民众和政党的关系中，包含着民众和政党体制、政党与其他社会组织、执政党与非执政党等关系；在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中，包含着执政党与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以及与宪法、法律的关系；在党内关系中，包含着组织与个人、代表机构与执行机构、中央组织与地方组织、领袖和普通党员等关系。这样一来，我们就非常清楚地看到了政党执政规律研究的丰富内涵。

因此，理论上看似简单的框架，落到实践中，就会变得极其复

杂。此外，更重要的是，这一系列关系的互动，本质上体现为不同力量之间的博弈。各种力之间呈现一种均衡状态，才会和理想的理论描述相吻合。问题恰恰在于，在实践中，这种均衡不是天然的。例如，民众的力量既可能因为缺乏自主意识而散沙一盘、软弱无力，也可能因为组织起来而变得强大，甚至强大到可以把政党撇在一边；政党既可能因为传统的松散而担不起政治发展赋予的责任，也可能因为在领导建立政治制度中的贡献而凌驾于其上；政治权力既可能因为受强势政党的支配而处于从属地位，也可能因为其自身的特性而吸附政党，使政党变得国家化、行政化、官僚化，进而腐蚀政党。只有保持力的均衡，民主政治的发展才是健康的。

规律性的东西，就蕴藏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关系之中。执政党的责任和能力，在于有效地把握这些关系的现状，把它们引导到健康的发展方向上。在政党政治的历史中，一些政党成就卓著，另一些政党一事无成，还有一些政党迅速膨胀而又像泡沫一样消失，归根结底，就是看它们对这些关系的内在联系是否把握，是否能充分利用执政党的有利地位，有效地处理这些关系。例如，在市场经济没有发展起来的国家，民众往往缺乏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政党与民众之间的联系就会缺乏刚性，民众的利益、愿望、要求难以充分表达；另一方面，权力对于执政党的强大诱惑就会凸现出来。执政党如果不能及时意识到这一点，通过其他途径建立约束权力的机制，那么，执政党十有八九会掉到腐败的陷阱里去。很显然，我们所提到的那些大党老党，都未能避免这个结局。又如，在当今信息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民众对表达途径和信息获得渠道的选择多样化了。人们既可以通过政党来获取信息，表达利益、愿望、要求，也可以不通过政党，而通过传媒来实现这种沟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党仍然沿用过去的套路，对民意和其他信息的感受不灵敏，传递不准确、不及时，那么，人们对政党的信任就会迅速下降，对执政党的能力表示怀疑。一些大党老党失去执政地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长期依赖传统的沟

通手段，而后起的反对党则更能利用现代沟通手段争取公众的认同。如此比较，谁先进，谁落后，一目了然。大刀长矛是无法和卫星制导武器相抗衡的。

本书尽管篇幅不大，但是我们努力想用上述分析框架来说明问题，以求有一点新意。我们不揣冒昧地把它拿出来，摆到大家面前，供大家学习和研究时参考，并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

第一章

苏联共产党：亡党亡国的不归路

1991年8月24日，是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史上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这一天，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宣布：“苏共中央委员会应该做出一项艰难但却是诚恳的决定：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内的共产党员和地方党组织将自行决定自己的前途。”^①第二天，苏共中央书记处被迫发表声明，宣布接受自动解散苏共中央的决定。至此，苏共，这个有着93年历史的大党失去了执政地位，不仅结束了自己单独连续执政长达74年的历史，同时也终结了自身的生命；随后，连同它一起葬送的还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世界上第一个执掌政权的共产党，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红色帝国，就这样走上了亡党亡国的不归路。

苏共的亡党亡国无疑是历史的悲剧，然而，它的最可悲之处在于苏联人民为它举行了一个过于平静的“葬礼”。提起苏联的亡党亡国，人们总是在问这样一个问题：2.9亿苏联人、特别是1500万苏共党员怎么会那么平静地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有个数字大概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回答这个问题。在苏联解体前，当时的《莫斯科新闻》曾登载过一次民意调查的结果：在这份调查中，当接受调查的人被问及“你认为苏共的政策代表谁的利益”时，被调查者中回答

沈志华、于沛等编著：《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1898至1991年苏共历史大事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3页。

苏共代表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的均占 2%；回答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 7%；回答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 11%；而回答苏共代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 85%；回答苏共代表除此之外的“其他集团”的占 13%。^①

这份调查所显示出的数据以及苏联人如此平静地接受了苏共瓦解的现实说明 苏共随着执政时间的延伸和执政地位的“巩固”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来的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不是愈加紧密，而是不断疏远。的确，从苏共执政党走过的历程看，自斯大林开始，长期以来，一方面，苏共对人民的思想、情绪和利益要求缺乏认真的考察和考虑，甚至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进行扼制和压制；另一方面，党内的不良风气，诸如个人崇拜、个人专权、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理论脱离实际、不思进取、贪图享受等等，却日趋增长、泛滥。而这些与共产党人的信仰、党的先进性、共产主义的宗旨格格不入。这样日积月累，人民对党的意见和积怨便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以至于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苏共是他们利益的代表。

那么，苏共是怎样由一个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甘愿为人民的利益流血牺牲，为人民谋福利的党，演变成为一个脱离了群众、高高在上的党，而为群众所抛弃的呢？

一、没有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福利和文化生活需要，削弱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人们说 布尔什维克党是靠“和平”“土地”“面包”这三个口号，赢得群众的支持，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上台执政的。然而，作为执政党 苏共在它 74 年的执政生涯中，却没能最大限度地满足

转引自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75 页。

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福利和文化生活需要，甚至连“和平”、“土地”、“面包”这样的承诺都没能兑现，可以说这是它失去民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从经济生活看

一提苏联经济，凡是到过苏联或是对苏联有所了解的人，眼前就会出现这样奇特的画面：一边是高耸的烟筒，大型的军工联合体遍布全国，另一边则是商店里空空的货架；一边是广袤无际的肥沃土地，另一边则是人们排着长队在食品店抢购食物；一边是加加林早在1965年就幸运地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宇航员，飞向太空，另一边则是直到苏联解体前，她的人民喜欢的羽绒服、牛仔裤、旅游鞋之类的物品，要靠中苏两国大大小小的“倒爷”们才能得到，甚至连孩子们喜欢的泡泡糖和自动铅笔也没有一家工厂能够提供……

就是这样一幅幅的画面构成了苏联人的日常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普通的苏联人除了抱怨之外，无能为力；而身为执政党的苏共，竟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里可以摘一段勃列日涅夫的讲话，看看他对经济短缺问题的看法及处理。1979年11月27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说：“近来，苏共中央委员会和报纸编辑部收到了许多来信，信中抱怨通常被称之为‘小’商品（如最普通的药品、肥皂、洗衣粉、牙刷、牙膏、针、线、婴儿包布以及其他轻工业品）的东西经常脱销。这是不能容忍的事情。

生产这些商品的各部都有责任，轻工业部（部长是尼·塔拉索夫）更有责任。商业部（部长是亚·伊·斯特鲁耶夫）也有过错……

必须在1980年改变这种状况。应当找出由于疏忽、不负责任和糊涂而造成各种商品的‘短缺’的具体负责人，并且应处分他们。①

然而，又一个 10 年过去了，苏联的经济状况依然如故，甚或更加困难。而这一切是与苏共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紧密相连的，绝不是靠处理追究几个负责人或是给他们处分所能解决的。如果说要追究责任，那也只能追究执政党的国家发展战略。

苏共执政后，党担负起了国家发展的经济任务、政治任务和文化任务。但是，在党的战略思想的转变中，却形成了重政治，轻经济，使经济战略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战略的局面。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任苏联总理的雷日科夫和苏共第二书记利加乔夫，在反思苏共亡党亡国的教训中，都谈到这个问题。雷日科夫总结说：“现实生活中很难把经济与政治分开，但是，我们这里跑在前面的总是政治。”^①利加乔夫则说：经济一次次地成了政治的牺牲品，而且是浮光掠影式的政治，“而主要的目的：人民的福祉，销匿在了个人政治奢望的围栏下”。^②

在苏联，情况就是这样，为了政治的需要，人们的经济利益和要求不断地受到压制、甚至牺牲，人民要为国家的强大忍受一切。

当然，这有客观的原因。比如说苏共执政的前 40 年，有国内战争，外国的武装干涉，帝国主义的包围，有希特勒法西斯的入侵。后期又有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冷战。西方的确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压制苏联革命的方针。如果再读一读美国人彼得·施魏策尔写的《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③这本书，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苏共执政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对其国家发展战略的客观影响。

但是，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在苏联国家发展战略制定和实施中的问题，更多的是来自苏共主观上的原因。例如，超越

〔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8 页。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4 页。

〔美〕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

历史发展阶段的理论，就导致其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脱离国情，脱离实际，总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以使自己在与资本主义的竞赛中超越对方，从而违背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背离了群众现实的利益要求。

苏共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理论从斯大林时期就开始了。1936年11月，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中宣布：苏联过渡时期已经结束“社会主义已经建成”。过了两年多，在联共（布）十八大上，斯大林又宣布，苏联的任务是向共产主义前进。战后的1952年，当苏联还是满目战争创伤，百废待兴之时，苏共十九大又提出“要通过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途径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1959年，赫鲁晓夫提出，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1961年，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又明确提出要“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又认为苏联已经处于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在1986年使用了“发展中社会主义”的提法。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赫鲁晓夫是这样解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一切生产资料都属于社会所有，都用来为社会谋福利。简单地说，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使劳动人民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过得更好。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最民主的基础上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说，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使人类生活得好呢？许多劳动人民并没有研究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他们却起来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因为他们想要生活得更好。

人民的确是想要生活得更好，所以才跟着共产党走的。但现实是：苏共为她的人民所描绘的一幅幅美好生活的蓝图不仅没有在短期内实现，相反，随着历史的进程，幸福生活的前景变得越来越渺茫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由于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在苏联，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畸形发展，而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农业则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从 1917—1987 年 70 年间工业与农业的比例来看，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329 倍，而农业总产值仅增长了 4.5 倍。另据统计数字显示：苏联生产资料生产在工业中所占比重最低限度为 80%，而消费资料最多只占 20%。而且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中，很大一部分是军工生产，约占苏联国民生产的 40%。在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中，苏联付出了昂贵的代价。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美国少得多，而按照苏联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计算，苏联用于国民收入单位的生产与美国相比是：固定基金的消耗几乎高出一倍，材料消耗高出一倍半还多，能量的消耗也高出一倍。有人把军工企业称为苏联国民经济的吸血鬼，它占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致使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正像利加乔夫所说：“强大的军工综合体吞食了大部分国家物质技术和劳动资源，结果阻碍了民用经济的发展和重大社会项目的完成”。^①在苏联这样一个工业国家，化学工业 50% 的设备、轻工业和食品工业 80% 的设备都是进口的。而机器设备的进口总额占国家进口总额的 40%。

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苏联经济发展的潜力就被耗尽了，苏联的国民经济开始在原地打转。70 年代，经济困难开始出现，经济增长率明显放慢，主要经济效率指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都未能达到。到 1982 年，战后第一次人民的实际收入跌到零增长。

“土地归农民”是苏维埃政权早期的一个著名口号。农民相信这个口号，并因而拥护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革命。在国内战争中，为这块土地牺牲了成千上万条生命。很难说清，在那之后漫长的岁月里，究竟有多少不幸落在了养育这个国家的农民身上。余粮征集制、全面集体化、“消灭富农”在消灭富农的过程中，总共有 110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47 页。

万农户被消灭，涉及到 500 万到 1100 万人。斯大林在同丘吉尔的谈话中承认，在这个时期有 1000 万农民被消灭了。全面集体化和消灭富农，使广大农民群众统统变成了既无土地，又无生产资料，又无大牲口的“农业无产者”。

苏联搞的工业化在相当程度上是靠牺牲农民实现的。戈尔巴乔夫在苏共历史上的功过，我们另当别论，但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中，对于苏联工业化的实现方式所进行的总结却是历史的真实写照。他说：“斯大林时期，工业化是靠强迫劳动，靠利用集中营的囚犯，同时也是靠农业的破产来实现的。对农业来说集体化成了新的农奴制。”集体化可以与英国建立资本主义关系时的‘圈地运动’相比。它不是在自愿的原则上进行的，相反，农民经常是被驱赶进去的。各级政权为完成中央规定的任务，采取了最残酷的方法。许多农民在革命后得到了土地，经济上得到了发展，而变成了中农。他们不想放弃通过诚实的劳动挣来的东西。推行集体化的残酷性是令人震惊的。那些能比别人搞生产搞得更好的人，最能干、最爱劳动的人被消灭了。那时候农村遭受了非常可怕的打击，其后果直到今天也还没有消灭。而这对整个国家的生活也是有影响的。当时是可以采取另一种选择的（例如，布哈林的方案^①），但是，它们遭到了批判，都被抛弃了。^②

战后又实行了对每一棵苹果树和每一只母鸡都要征税的斯大林税制。到赫鲁晓夫时代，农民连身份证都没有，他们没有迁徙权，只能留在他们所在的村庄。他们从事的生产，首要的任务是为国家提供粮食。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初开始，苏联农业的发展速度甚至落后于沙皇俄国，其粮食产量直到 50 年代才达到沙俄 1913 年的水

① 1925 年布哈林出版了《通向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这本小册子，概括了列宁遗嘱中的思想，即“可以不再对农民使用暴力而进入社会主义”。布哈林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他告诫人们，反对农民的政策等于自杀。

② 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6 页。

平。直到 80 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开始后，让政府总理雷日科夫头疼的还是食品的短缺，还是不得不花大量的外汇购买粮食。

“一个与农民作战的无产阶级专政……绝不会强大。”布哈林当年的一句格言应验了。在布哈林看来，任何冒风险与农民冲突的政策，不管它在经济上的道理多么令人信服，都是不能接受的。他相信，在这样一场冲突中，党会失败。^①

苏联人民最终厌倦了没完没了的以牺牲今天的利益为基础而去展望未来，“大家都希望今天就过上正常的生活”。加之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急速提高，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当“铁幕”拉开后，苏联人放眼世界，不少人走出国门，并且相信国外的物质生活水平绝非苏联能够比拟，他们对现状表示不满，“我们有的西方国家都有，而我们没有的西方人却有”。他们开始审视一切，突然发现在整个苏维埃时期，官方“赶超西方”的口号不过是海市蜃楼，继而对苏共的领导提出了质疑。

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也没能给人民以任何经济上的实惠。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开始于经济领域。改革伊始，便提出了“加速发展”的战略。但是，当经济改革受阻时，改革很快转向政治领域。在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的口号下，政治改革的形势急转直下，走向激进。政治改革的急剧激进化和经济政策的摇摆不定，使国家陷入了混乱。在过热的政治环境下，各派政治力量都把热情和精力投向了如何在国家权力的重新分布中，获取自己的一席之地。身负执政党重任的苏共，也把人民的衣、食、住、行忘在了脑后。利加乔夫对此曾痛苦地回忆说：“当 1990 年秋田野上出现大丰收时，一个用爱国主义精神把人们在共同的、真正全民的事业中团结起来的天赐良机，被失去了、错过了。所有社会力量都关注着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编：《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78—379 页。

如何能全面取得丰收，因为争取丰收能成为一种凝聚因素，若获得成功就会扭转社会悲观情绪，赋予人们新的信心。但没有这样做，这个天赐良机和大丰收，都在徒劳的政治争论闲谈胡扯中失去了。^①与此同时，苏联传统经济中可利用的资源，例如有竞争力的原料和军火贸易，由于来自本国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猛烈批评，不得不压缩，削减。1988年在全世界武器贸易中，苏联所占份额为38%，150亿美元，美国当时占30%，到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份额下降到不足5%，不到20亿美元，而美国上升为60%。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难和沉重了。

人们对物质状况恶化的不满，导致对苏共失望情绪的增强和对改革的不信任，社会上对改革者的支持减弱了。苏共党内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也充分利用了社会上对市场供应状况的不满，这一切加速了苏共的瓦解。

（二）从文化生活看

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教条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列宁逝世后，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苏共党内教条主义倾向日益严重。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相结合，使斯大林成了党的化身和真理的化身。斯大林的理论成为一切思想的源泉，官方的思想成为一切文化领域的主宰。文化绝对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成为笼罩苏联的浓厚氛围。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苏联不曾有过任何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甚至自然科学领域也是这样，更不用说政治科学领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僵化、封闭、保守的思想文化模式在苏联形成。尽管有过赫鲁晓夫时期的短暂“解冻”，但是，“赫鲁晓夫给了社会一点自由，后来他自己拧紧了龙头”。^②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所以，上述模式的主要部分保留下来了。其特征极为明显：

1. 党和党的最高领导人成为各个学科的最高权威和真理的最后仲裁者。现任俄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在反思苏共的历史时就总结说，“对真理的垄断”是导致苏共执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2. 把学术、思想观点的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无限地上纲上线，用“修正主义”“思想上的暗箭”“反苏”“诬蔑”“攻击党”“不道德”等等的罪名，以大批判和大清洗的方式整肃思想文化界。1952年斯大林会见作家团体，他在回答关于“现在应当写什么？”这个问题时说：“写真实！”可是就在这时候，数百名作家被逮捕或者被杀害，其原因正是在于他们要写真实。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意识形态加强了控制，结束了赫鲁晓夫的文艺自由主义，只是这方面的做法怀柔多了，不像斯大林那样动辄实行肉体上的消灭，他的做法是常常把一些“固执任性的人”调到国外。例如，德·彼·戈吕诺夫曾任《共青团真理报》主编，后来又领导过《真理报》和塔斯社，他在专业领域的才干和作为领导的威信不容置疑，但是，因为他不是随声附和的人，因而有一天被突然任命为驻肯尼亚大使，后来又任驻摩洛哥大使。他在国外工作了很久，一直领养老金，一个非常卓越的新闻记者不得不“光荣退休”。

3. 执政党只听到自己的声音，凡是与官方的意识不和谐的一切文化成果均被以各种“罪名”加以否定，遗传学、控制论、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等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以隔离、封闭的方式在“纯洁的社会主义”环境中培养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伴随这一思想文化模式的是在意识形态和宗教、文化与艺术领域中，在历史研究或政治观点方面不断采取各式各样的惩罚行动，这给苏联社会的现实生活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全部世界文明的经验说明：封闭和孤立必然会导致落后。苏联在1970年代后进入了长期的停滞时期，停滞不仅表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标上，还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由于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问题越来越多，苏共执政模式的积弊日益加重，人民群众的意见

越来越大，对改革的企盼日趋强烈。但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却加强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结束了赫鲁晓夫的文艺自由主义，社会没有正常的意见表达渠道，人民也没有实现政治参与的合法途径。1965年，苏联克格勃逮捕并审判了两名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利，随后又审讯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一批青年作家，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由此引发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发展和扩大。

此时，在苏联社会的思想文化生活中出现了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持续不断地发展起来，他们针对党和国家在体制、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另一方面，多数人和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政治上变得消极，对政治的漠不关心甚至尽量逃避政治已成为许许多多人的习惯和自卫手段。正如马克思从前所抨击的那样：“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于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①

面对人民的要求和情绪，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执政党仍然无动于衷，漠然视之。对持不同政见者还是延续斯大林的办法：取缔和镇压。只是镇压的方式比斯大林有所缓和，把肉体上的消灭变成了驱逐出国或流放。而对改革的呼声真乃是“瞎子与聋子的对话”，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改革问题上不仅毫无建树，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即新斯大林主义。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又经历了安得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两年零8个月，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共才进入了改革时期。

然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执政党又没能承担起引导社会意识的责任，导致苏共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上失去了主导地位。此

时，在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的口号下，在沸腾的政治热潮中，苏共历史上的积案、沉冤、秘密……被揭开了历史的面纱；各种“主义”纷至沓来；以往不可动摇的真理变得面目全非，在虚无主义的笼罩下，人民渴望逃离华而不实的理想的樊笼，社会失去了前进的目标。

二、高度集权的苏共领导体制破坏了党与政权、党与社会的正常关系，削弱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一提苏共模式，人们立刻就会把它同高度集权、个人专权、个人崇拜、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干部制度的任命制和终身制等等名词术语联系起来。这些恰恰导致了苏共由人民公仆演变为人民的主人，由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的政党，蜕变为脱离了群众而为人民所抛弃的党。

那么，苏共的这套领导体制是怎样形成的呢？如果说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执政初期历史环境的限定，那么为什么这一模式在弊端已经显露无遗的情况下，还能在苏联延续几十年？

（一）苏共领导体制的形成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从三个方面深刻改变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党的活动性质与方式：首先，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其次，党开始由一个革命家的组织向群众性的组织转变；再次，党的权力中心逐渐由中央委员会转移到一个小机构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些变化给党的领导体制的建设提出了崭新的课题，面对这一课题，列宁开始了对无产阶级执政党领导体制建设的探索。列宁的探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1. 初创时期（1917年11月—1918年6月）。在这一时期列宁

主要是依据巴黎公社的经验，主张实行无产阶级的直接民主制。直到1918年3月，他才改变看法，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是由一种组织来实现”的，即党代表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思想。但是，国内战争的爆发打断了列宁按正常途径探索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进程。1918年5月开始的3年内战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是一次严酷的经历。军事化给襁褓中的党的领导体制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虽然列宁曾指出：“‘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①但是，它实际上对后来苏共领导体制的发展取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1918年7月—1920年12月）这一时期，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党实施了极端集中制的领导体制和战斗命令式的领导方法。其基本特点是：（1）党的权力中心由中央委员会转移到了政治局。在1919年3月国内战争的高潮中，俄共（布）召开了八大，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部建立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八大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规定，政治局有权对“不容拖延的问题作出决定”。（2）委任制和推荐制盛行，选举制只有在党的最高机构中存在。在内战年代，委任制主要采取了群众性动员上前线的办法，规模大，范围广。据说，1920年4月到11月，中央委员会就任命了37547名干部，其中25249人响应党的号召奔赴各地。（3）集体领导“紧缩”了，许多重大问题实际上是由列宁和周围的同志协商决定的。（4）党员的批评自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甚至党内的高级干部也不能享有完全的批评自由。（5）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关系是集中化的。主要表现在：一是经常性地给地方派遣中央代表；二是中央有权解散不合自己心意的经选举产生的地方委员会。

适应战争需要形成的极端集中制的领导体制，虽然对赢得战争

胜利是必需的、高效的，但是，其弊端也必然有所显露。正如俄共（布）的十大决议指出的那样：极端集中制发展了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战斗命令制往往采取被歪曲的不必要的压制形式；必要的特权变成了各种舞弊行为的凭借；党的机关的必要紧缩削弱了党的精神生活。

3. 新经济政策时期（1921年3月—1924年1月）。列宁觉察到极端集中制的弊病，早在1920年9月，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就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的措施。战争结束后，党的十大提出了从极端集中制向工人民主制过渡的任务。

但是，实际上在列宁生前和死后这个过渡都没有完成。相反，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党的领导体制依然是集中制的，在某些方面其集中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党的领导机关的委任制继续以改变了的形式存在着，选举制有名无实。主要表现在：一是与内战时期群众性动员的方式不同，这时委任制采取了个别任命的形式；二是上级组织的最后批准权变成了“推荐权”和“委任权”。（2）严厉禁止派别活动，违者将被开除出党，根据列宁的提议，党的十大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决议》。决议规定实行党内戒严，其中第7条当时没有公布，涉及到中央委员如违反该决议时，中央委员会有权采取一切措施，直至将其开除出党（但需要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监察委员2/3的票数通过）。

新经济政策时期党的领导体制的集中化主要还是迫于当时环境的压力。在不发达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上的“放松”“搞活”与政治上的集中同时并存是一种必要的措施。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种体制下，列宁并没有放弃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向工人民主制过渡的努力。

这一点，从列宁为俄国设计的一条通过新经济政策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总体规划中就可以看到，这个规划的政治方面包括的主要内容是（1）列宁主张改变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以加强其作为最高决

策机构的地位和作用。主要途径一是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把中央委员扩大到几十人甚至 100 人；二是改善中央委员会的阶级成分，增加真正工人的数目。(2) 列宁建议实行工农检查院和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合并，以加强党和国家的监察系统。一方面，他提出应从工人和农民中挑选出 75 名到 100 名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另一方面他主张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权力，保证他们有一定数量的人出席政治局会议，要注意不因任何人的威信而妨碍他们的监督工作。(3) 列宁建议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并提出了党的最高领袖必须具备的条件。他在 1922 年 12 月 24 日和第二年 1 月 4 日的信中，对斯大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大可夫的个性以及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做了详细分析，认为他们个性上的缺陷可能影响到党的领导体制的命运，同时提出了对未来最高领袖的期望：对同志不能粗暴；既要有卓越的才能，又要善于同群众打成一片；在历史的重大考验面前能坚如磐石；必须精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同时又摆脱了烦琐哲学的毛病。

在列宁晚年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个根本精神，就是逐渐实现党的领导体制的民主化。

但是，列宁没有来得及把他晚年的思想付诸实践。1924 年 1 月，列宁逝世后，在当时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下，也因为权力斗争和自身利益的需要，斯大林从 20 世纪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初，不断地强化日趋集中的党的领导体制，最终完成了使党的领导体制由列宁时期的集中制向斯大林时期高度集权制的转变。

1934 年发生“基洛夫事件”，斯大林找到借口，开始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遭到进一步破坏，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被进一步扭曲，个人崇拜更加兴盛，权力的高度集中成为不可扭转的现实。

(二) 苏共领导体制的特征、惯性及其消极后果

有学者把斯大林建立起的这套体制模式的特征概括为七化：

(1) 党的组织行政化。党政融为一体，以党代政，党集中了国家的权力，国家权力机关萎缩。(2) 国家权力个人化。斯大林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国家权力控制系统失灵，公共权力流向少数官僚和斯大林个人，形成个人专权。(3) 干部制度委任化。苏联建国初期以委任的方式向各地与各级岗位输送干部的做法沿袭下来，并且定型化、制度化。党、政、企及群众团体的干部层层由上级委派。(4) 个人崇拜普遍化。不仅斯大林被说成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是洞察一切、不会犯错误的超人，而且各级领导人也被看成是天生具有独特天赋、能做出惟一正确决定并表达群众心愿的人。(5) 监督机构无效化。列宁时期，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出，与中央委员会平行，具有监督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斯大林时期则使党的中央监委失去了原有的性质和监督同级党委的权力。(6) 党政机关官僚化。列宁逝世前，苏维埃国家机关官僚化过程已经开始。斯大林上台后，强化了官僚体制，建立了一种盲目服从上级的“等级制度”，还赋予各级官员种种特权，在庞大的干部队伍中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7) 法律制度虚无化。总书记直接领导的国家安全机构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不受党和国家机构的监督，不受任何法律制度的约束，包揽了从逮捕、审判、监禁到处决这一司法程序的全过程，集中了公、检、法的全部职权 对全国实行恐怖统治。

我们看到，苏共建立起来的这套体制所具有的上述特征，在苏共 70 多年的执政历程中，的确给国家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诸多问题，同时也为党自身的命运埋下了伏笔。就拿“党的组织行政化”来说吧，由于没有摆正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必然损害党与社会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党执政的条件下，如何处理党政关系，这是

实行党的领导的一个重大课题。苏共作为执政党走上历史舞台后，自列宁以来，各个时期的领导人都十分关注并反复强调党政关系的问题。早在 1907 年，列宁就提出了党政既有分工又有结合的原则。针对有人提出“是工人代表苏维埃，还是党？”的问题，列宁强调说问题仅仅在于如何划分苏维埃的任务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以及如何把两者结合起来。此后，这一思想一直贯穿于苏共党政领导的言论和党的文献中。但是，在实施党的领导时，这个问题却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始终混为一谈，科学而有效的执政方式始终没有找到。处理党政关系的基本原则“党不要取代苏维埃的职能”即“不要对细节进行干涉”、“不要进行琐碎监督”、“不要代替苏维埃去解决具体的经济文化问题”、“党决定大事、苏维埃在决定具体问题方面具有独立的自主权等等，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相反，基于斯大林“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党的指示加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对这些指示的执行”^①的认识，没有党中央的指示，国家机关不能决定任何重大问题，实际上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它使苏联国家权力过分地集中于党，党政关系的界限模糊不清，有些甚至出现倒置。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把本属于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经济组织、社会团体的权力集中于党。党成了不受监督和制约、凌驾于一切组织之上的机关。例如，最高苏维埃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机关，是国家的立法机关。但是，自斯大林时期起，最高苏维埃变成了通过和公布党中央决议的橡皮图章，它从来不对党中央的指示表示异议，“一致通过”成了苏维埃对所有问题进行表决时的惯性定律；加之苏维埃代表选举过程中，“实际存在着各级党委领导人委任代表候选人制和等额选举制，以及各级党委领导人兼任同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制、执委会组成人员兼任苏维埃代表制和执委会既是苏维埃的执行机关，又是苏维埃常设机

^①《斯大林全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38 页。

关的制度，使苏维埃对国家管理机关的监督职能无法行使”。^①因此，苏维埃实际上成为党中央机关的附属品。再如党政机构的重叠，使以党代政成为必然的结局。列宁时期，党政机关的分工比较明确，党中央只设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掌握政治决策权、人事权和监督权；到斯大林时期，苏共中央设立了与行政部门相对立的部，诸如工业部、农业部、运输部、计划财政贸易部等等；赫鲁晓夫时期，从上而下搞工业党和农业党，使以党代政的现象更为严重；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党中央设的部、局有增无减，比斯大林时期多出一倍以上，而且有些部、局的名称都与政府部门相同。中央如此，垂直领导的体制使地方也如法炮制，这样，党的各级组织对政府工作的干预、包办，对经济机关的代替和竞争，成了苏联一道抹不掉的风景线。

党政关系问题成为苏联历届领导人头痛的一个难题。但是，由于党对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地位与党的执政方式认识上的局限性；由于党在执政初期，受到历史原因及客观环境的限制，形成了高度集中的体制；由于权力自身的诱惑和权力制衡体系的薄弱，致使这个问题的解决颇有纸上谈兵的意味，长期不见成效。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日趋显露。以至于党政职能分开的问题，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聚焦点，最终成为苏共命运的一个触礁点。

始于斯大林时期的高度集权制的形成，为斯大林的独裁统治扫清了道路，也给党和人民之间筑起了深深的鸿沟。从此，党不是置身于社会之中，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对人民发号施令。党与群众的关系被扭曲了。斯大林与群众的关系同列宁截然相反。正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列宁的特点是：

刘向文、贺永方：《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原因及其教训》，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0 页。

耐心地同群众一起工作；坚持不懈地、不知疲倦地教育他们；有能力诱导群众跟自己走，不采取强制手段，而宁愿通过整个集体的力量在思想上影响他们。列宁的这些特点是同斯大林格格不入的。斯大林抛弃了列宁的说服和教育方法，放弃了思想斗争的方法而选择采用了行政压力、大规模镇压和恐怖的方法。斯大林运用惩罚机构日益大规模地、顽强地采取行动，他这样做的同时也就公然破坏了一切现存的道德准则和苏维埃法律。^①

斯大林从 20 世纪 20 年代末到他逝世为止，不断地在国内进行大清洗、大镇压。在这一过程中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历史之谜。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从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到叶利钦时代直至今今天，一直担任着一个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个委员会专门负责为斯大林时期受政治迫害牺牲的人恢复名誉。他认为那个时期受迫害的人应当在 2000 万左右。1937 年至 1938 年，有一个大清洗的高潮。据 1953 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在宣布社会主义建成后的这两年间就有 1344923 人被判刑，其中被判死刑的有 681692 人。斯大林的大清洗，不仅使千百万无辜者生灵涂炭，冤魂不散。更严重的是，它毒化了人的心灵，恶化了社会氛围。在大清洗中，不少人为了自保而捕风捉影地向当局告密，也有人在刑讯逼供下，提供伪证。而各级组织则以多杀人来邀功。上头规定枪毙、坐牢的定额，而审讯部门说：“不，太少了。我们这里要多 3 倍、4 倍。”这些作法让社会上人人自危，有朝不保夕之感。可以说，从这时起就埋下了人们对苏共的失望、怀疑乃至怨恨。

1956 年 2 月，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把斯大林的错误归结为斯大林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权，把斯大林的暴虐归结为斯大林个人性格上的缺陷，而没有认识到，斯大林之所以能天马行空、为所欲为，正是缘于苏联

〔苏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自《赫鲁晓夫执政十年》，法律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29 页。

业已形成的党的领导体制。

在谈到赫鲁晓夫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地把他比作一个“庸医”，说他看不到苏联的病根，因此开不出有效的药方。在这里笔者还是用了赫鲁晓夫没有认识到体制问题的说法，因为至今还找不到赫鲁晓夫有关揭示苏联体制问题的明确的论述。这里我们还想指出，体制的惯性作用和赫鲁晓夫等后期的苏共领导人与这种体制的关系。他们或许比前任看到了更多的问题，试图改革，但是，归根结底他们是这种体制培养起来的人，他们得益于这种体制，受它的庇护，他们有维护这种体制的本能和习惯。赫鲁晓夫本人曾对此做了解释：“苏联领导决定开始解冻时期，并自觉地走去的时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同时对解冻感到担心：‘会不会因解冻而出现冲向我们的洪水这就将很难处理’”。^①这种担心使赫鲁晓夫未能把改革深入下去，实际上他的同事也不允许他继续走下去。以写《第三次浪潮》而闻名于世的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他的另一本书中曾写到：“没有来自下面的巨大压力，我们无法期望许多今天名义上的领导人会向他们的制度挑战，不管这个制度多么不合时宜。因为这个制度给了他们威望、金钱和权力的幻觉。有些不同寻常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官员一开始就支持政治转型的斗争。但大部分人只有当来自外部的要求不可抗拒，或者危机四伏，已发展到暴力的边缘，从而他们觉得别无选择时，才会采取行动。”^②

这就是为什么在斯大林之后，由他建立起来的高度集权的党的领导体制，虽然经过几代苏共领导人的修修补补，但是始终没有本质上的变化的原因。相反，由于体制的惯性和维护它的需要，在某些方面还被强化了。比如，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为巩固个人的权

① 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3—44 页。

② 〔美〕阿尔温·托夫勒、海蒂·托夫勒：《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108 页。

力，采取了一些组织措施，来保证权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1) 在苏共二十三大上，将中央主席团更名为中央政治局，把中央第一书记的职称改名为中央总书记，从而恢复了斯大林时期政治局和总书记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称谓。(2) 接受赫鲁晓夫下台的教训，第一次在党章中规定“中央委员会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总书记由中央全会选举产生，这就意味着只有中央全会才有权罢免他，有了这样的规定，勃列日涅夫的统治就比赫鲁晓夫要安全得多。因为，人们记忆犹新，1964年，赫鲁晓夫是被中央书记处和主席团罢免，而后由中央十月全会确认的，而在1957年的那次危机中，在主席团以8票对4票的结果撤销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务时，是中央六月全会挽救了他。(3) 恢复了从前被斯大林强化，而后被赫鲁晓夫取消了的“内务办公室”（总书记的秘书处）的作用。勃列日涅夫把自己“办公室”的成员塞进党的高级机关，“办公室”主任是苏共中央书记兼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办公室”的全部成员除一人外全部都是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或者是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从这一点来说，已经超过了斯大林时期，当年斯大林的“办公室”主任波斯克列贝雪夫只不过是一名中央委员。“这就造成一种既成局面：中央有关部作出的有待政治局批准的一切重要问题都不能越过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而要预先求得它的同意。这也直接涉及到统管党的干部政策的中央书记处。”^①

再比如干部的任命制和终身制，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苏联出现了“老人政治”、“病夫治国”的局面。从1982年11月10日到1985年3月10日，在短短28个月的时间内，苏共三任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相继去世。有消息说，在那些日子里，莫斯科广播电台居然不敢播放柴科夫斯基的慢节奏音乐，以免人们误听为这又是在播放哀乐。

阿·阿夫托尔哈诺夫：《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苏共的历史说明，集权制一旦形成，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就无从谈起，正常的社会生活就失去了保障。相反，党内民主机制的无效性，又不断强化着集权制。因此，这种体制的负效运转，使党的体制变成了一个自身封闭的系统，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体系。这样，党内不仅极易滋生各种与共产党人称号不符的腐败现象和消极现象，而且由于这种机制本身缺乏“自下而上的监督”，缺乏自我更新、重新学习的能力，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就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僵化的官僚体制，从而失去了社会更新的活力，失去了回答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能力，也失去了不断吸纳新鲜经验、改正错误的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都曾作过努力和尝试，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实行党政分开，加强集体领导，而后期却在这些问题上不仅重蹈覆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是苏共党建模式的种种积弊，经过长期的日积月累，使党内和整个苏联社会潜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这些矛盾和危机不仅表现在可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指标上，而且隐藏在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群体意识中。而改革进程中，苏共和戈尔巴乔夫所犯的急进主义错误，毫无节制的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与革新苏共的进程，恰恰迎合了社会心理和社会群体意识中那些对苏共的疏离情绪和逆反心理。不当的措施不仅未能逐步地缓解与化解矛盾和危机，相反，加速了矛盾和危机的总爆发。

三、苏共长期以来治党不严，为政不廉，致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令人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破坏了党的公众形象，削弱了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早在列宁逝世前，苏维埃国家官僚化过程已经开始。斯大林当政后，强化了官僚体制，建立起一种盲目服从上级的“等级制度”，并赋予各级官员以种种特权，在庞大的干部队伍中形成了一个被称

之为“官僚特权的阶层”。

但是，在斯大林时期，斯大林偶尔会用残酷的镇压“整肃”这支队伍，以使他们在规定可以享受的特权之外，不敢胆大妄为，贪赃枉法。

在赫鲁晓夫时期，这支队伍也被无穷无尽地折磨过。赫鲁晓夫不断地在上层调换人们的工作岗位，进行各式各样的改组和干部的更新，以期加深干部的危机感，“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在个别工作人员手中的可能性以及个别工作人员脱离集体监督的情况”。

而实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干部的自由放纵，领导的胡作非为，在中央和地方都有所滋长。贪污受贿、营私舞弊、出于贪财的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对很多人来说有利可图的经营不善等等情况大为增长。

勃列日涅夫掌管苏共大权后，对干部队伍提出了“稳定”的口号，随着时间的推移，负责的岗位事实上都成了终身的岗位，而官僚们成为不可替代的人。很多州委书记、部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负责人占据自己的职务达 15—20 年之久，他们享受高水平的生活和各种特权。这种对干部地位和待遇的充分保证和实际上的终身制，不仅使许多干部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助长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习气，更为严重的，是使相当一部分干部有恃无恐，胆大妄为，公然地以权谋私，导致了腐败现象的蔓延。勃列日涅夫执政 18 年，这一时期，苏共党内风气的败坏和各级官员的种种腐败事件广为流传，贪污受贿、任人唯亲、盗窃国库等毒素迅速蔓延，不仅党内高官涉嫌腐败，就连勃列日涅夫的家人和他本人都身陷其中。

勃列日涅夫当政时，不仅使各级官员可以合法地享有等级特权，并庇护非法的行为，而且试图建立“特权继承制”。勃列日涅夫的儿子是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嗜酒如命，为了不致被人看出酒后浮肿的双眼，他常常要带上墨镜，不止一次地在醉醺醺的状态下进行责任重大的商务谈判。勃列日涅夫的一个弟弟也当上了副部长，而且与勃列日涅夫的儿子有同样的恶习。勃列日涅夫的女婿是大名

鼎鼎的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他大概可以算得上是苏联时期各种腐败行为的集大成者。

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叫丘尔巴诺夫。丘尔巴诺夫与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林娜·勃列日涅娃结婚时，只是内务部监狱政治处的指导员，少校军衔。此人善于交际，头脑灵活，深得老丈人的赏识。丘尔巴诺夫和加林娜·勃列日涅娃结婚时，在莫斯科市内得到了一幢装修豪华的公寓和一幢宽敞的郊区别墅。勃列日涅夫从自己收藏的西方小轿车中不仅送给他们一辆捷克的“斯科达—1000”轿车，而且还送了一辆轻型的法国“雷诺—16”。丘尔巴诺夫迅速飞黄腾达，他被提前晋升上校，并得到新的职务。勃列日涅夫非常关心女婿的前途，亲自出马找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希望提拔丘尔巴诺夫担任内务部副部长。之后不久，丘尔巴诺夫便被任命为内务部内卫军政治部副主任，一年后提升为主任。1977年他当上了内务部副部长，1979年再次晋升为第一副部长。1981年10月，45岁的丘尔巴诺夫被苏军任命为军警中少有的几个中将之一。在1976年的苏共二十大上，他被选为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81年的苏共二十六次大上，又被推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大权在握的丘尔巴诺夫在任内务部副部长期间，经常以各种名目到苏联各地“视察”。同时，他还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然要到各地和各单位检查工作。每到一地，他都要带上大批随员，以显示身份。各地方当局也都以国家元首级的规格来接待他。所到之处，他不仅大吃大喝，而且连拿带掖。起初，地方官员还有所顾忌，送的礼品都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工艺品、土特产。后来，发现此人来者不拒，胆子便大起来，为讨好这位“驸马爷”，他们甚至把成捆的卢布塞进他的腰包。金银首饰、文物珠宝、高级工艺品等等，只要丘尔巴诺夫喜欢的，都可以带上。据后来的调查材料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丘尔巴诺夫总共收受贿赂654200卢布，约合105万美元。

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勃列日涅夫庇护下的犯罪，成为莫斯科和

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效法的榜样。勃列日涅夫后期，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里的贪污腐化问题越来越恶劣了；“渔业案件”、“索契案件”、“克拉斯诺达尔案件”、“海洋案件”、“乌兹别克案件”……都引起了公众的广泛注意。社会上关于官员们物质挥霍的闲言和流言越来越多，这其中，许多是事实，当然也添加了为数更多的臆造和猜测。这一切造成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紧张，使党在群众中的声誉和威信下降，使党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宣言受到质疑。

正如前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阿·阿尔巴托夫所写的那样：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人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的威信下降，同时作为一种自然反应，右的和左的平民主义都冒出头来了。”^①

勃列日涅夫之后的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也说：“党光靠讲话是不可能将苏联人民吸引到自己这边来的，思想工作必须要有社会保障。各种各样的经营不善、违法乱纪、贪得无厌和贪污受贿，使得千万名鼓动员和宣传员的工作变得毫无价值。”^②

四、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失误，不仅未能拯救苏共于危难之中，相反加深了党的危机，失去了群众最后的信任和支持，从而促使苏共走上亡党亡国的不归路

苏共在经历了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安得罗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41 页。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32 页。

波夫、契尔年科 6 位领导人长达 60 多年的执政历程后，整个苏联社会处在一种僵化的停滞状态，而此时的世界已经进入新技术革命的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经济发展，社会繁荣，政治稳定。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赛中，苏联已显力不从心。“我们再也这样生活下去了”，成为苏共党内外的共同呼声。于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以改革者的姿态被推上了政治舞台，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改革进程中，伴随着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逐步形成，并作为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苏共中央行动纲领》，即《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推向苏联社会。然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实施，却给苏联社会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及后果，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一）戈尔巴乔夫改革思想“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形成

1. 戈尔巴乔夫改革战略指导思想的转变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形成。

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1931 年 3 月 2 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俄罗斯人，1952 年加入苏联共产党，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从 1955 年起，开始从事党团工作，在进入苏共中央工作前，一直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担任党团领导工作。1971 年起为苏共中央委员，是苏共二十二大、二十四大、二十五大和二十六大大代表。1978 年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1979 年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0 年 10 月 22 日，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5 年 3 月 11 日，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开始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其改革战略指导思想的转变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紧密相关。从整个进程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85 年 4 月到 1987 年秋。这期间，戈尔巴乔夫

改革战略的指导思想是在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石上，全面完善社会主义社会。苏联党政领导的工作重点是加速经济发展和探索经济改革的途径。因此，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改革指导思想是要使苏联社会“多一些社会主义”。

第二阶段，从 1987 年冬到 1989 年末。这是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形成的重要阶段。这段时间，戈尔巴乔夫改革战略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经济体制改革受阻，加速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没有取得明显效果的情况下，改革的航向被转到政治体制改革。戈尔巴乔夫认为：现存的政治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障碍。他开始寄希望于“通过革命性的改革塑造社会主义新形象”。改革的指导思想由“多一些社会主义”转变为“多一些民主”。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初步形成并提出，其主要标志是：

(1) 1987 年 11 月 1 日，应美国一家出版商的请求，戈尔巴乔夫撰写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由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和美国阿波罗公司分别用俄文和英文出版。书中强调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利益和价值高于一切，否定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存在着阶级斗争。把“更多的社会主义”和“更多的民主”作为两个并行的改革原则提出。

(2) 1987 年 11 月 2 日，在十月革命 70 周年庆祝大会上，戈尔巴乔夫作了题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报告对 70 年的苏联历史和重要的历史人物进行了评价，着重强调要改变被扭曲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报告中，戈尔巴乔夫批评人们“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 30—40 年代的水平上”表示要提出社会主义的新概念。

(3) 1988 年 6 月 28 日，在以改革为中心议题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作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报告。第一次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并简略地论述了它的七个基本特征。

(4) 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上发表长篇理论文章《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全面论述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构想及其思想理论基础，指出：“社会主义是一般民主和全人类理想及价值观的体现者和捍卫者”。

(5) 1989年12月31日，戈尔巴乔夫在辞旧迎新的电视讲话中，把一年来东欧的剧变说成是“革命革新的浪潮”，再次强调苏联的改革目标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第三阶段，从1990年初到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这个阶段，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战略指导思想更加明确为“多一些民主”。一方面，他在理论上使其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更加完备和系统化。1990年初，应西班牙《未来的社会主义》杂志之约，戈尔巴乔夫写下了《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哲学思想、社会历史背景、内容及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他在社会实践中全面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90年2月7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党的二十八大行动纲领草案，《真理报》2月13日全文刊登了这个题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草案，供全党全民讨论。1990年7月，《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以党纲的形式提交苏共二十八大通过。此时，苏共官方已承认多党制，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被取消；国家实行总统制和人代会制；各级苏维埃进行竞选；准备签订新的联盟条约。

2.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提出的社会思想基础。

改革进程中，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为苏联社会广泛承认和接受，这有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思想基础，是由改革时期各个阶段的意识形态情形所决定的。

在改革的第一阶段，从意识形态的关系看，新老政治力量都没有给社会造成深刻的危机。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在党内外占主导地位。1986年春，苏共二十七大党纲确定的加速发展战略

和随后的改革思想都是传统意识形态的反映。此时，加速发展战略和改革思想的核心是完善社会主义。同时，产生在这一阶段的社会民主运动，也没有脱离党的政策轨道。在与旧观念的斗争中，各种社会力量实现了意识形态的联合。政治对抗和社会冲突并没有展现出其潜在的能量。因此，这一阶段各种政治力量都没有提出意识形态的新观念，传统的意识形态得以保留，并继续在社会进程中发挥其主导作用。

在改革的第二阶段，深刻的社会异变逐渐加剧，党内外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抗不断增长。在“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的旗帜下，苏共党内形成了三大派：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传统派，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社会上各种非正式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1989年底，全国有6万多个非官方组织。党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对抗的结果是，传统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日益失去自己的桂冠，而新的政治思想的探索，从一开始就有用激情代替现实的特点，并逐步让位于激进思想。此时，苏共内部共产党人和民主主义者的分歧加剧。有人尝试在理论上形成非布尔什维克派和非斯大林派。社会上那些热衷于更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人——自由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围绕着政治体制改革、人民代表苏维埃取得政权、改革联盟国家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苏共的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随即，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学说被创立起来。

在改革的第三阶段，自由民主主义者和民族运动的领袖们在理论宣传中扛起了反共产主义的大旗，实际上此时，反共产主义思潮已经成为理论宣传中的一种思维定势。它以公开和隐蔽的两种形式出现：公开的反共思潮即公开地否定共产主义原则，否定苏共的政治领导地位，要求更改苏联宪法第六章中关于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条款；隐蔽的反共思潮主要表现在自由民主的原则论点中，即要求政治权力和自由，要求议会民主，多党竞争，建立法制国家……这个阶段社会上的非正式组织在继续增长，而且唱起人民阵线和党的

调子。1990年苏联有140多个人民阵线及类似政党的组织，它们提出了共同的民主纲领，其内容大同小异，主要是要求实现政治多元化，自由行动和人权。其反共要求也具体化为：苏共财产国家化；解散军队、克格勃、内务部的政治组织；取消苏共的垄断地位等。

就这样，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成为苏联社会生活的现实。不同的意识形态在相同的时间和空间内共存，并且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一些新生的政党和政治运动常常利用人权、民主、民族复活等价值取向，进行反共产主义和反共的活动，并在此基础上联合起来。此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传统被打破。而这正是各种政治力量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因此，在民主化进程中，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找到了新的意识形态的提法，即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以此同各种意识形态学说达成妥协。虽然激进派觉得它过于保守、陈旧，传统派则认为它过于革命，但在激进派与保守派的力量旗鼓相当，社会上又没有一种意识形态能占据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它仍不失为一种最佳的选择方案。由此可见，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只是作为社会选择的一种，而不是惟一的选择。这种选择只是暂时妥协的产物，不可能有稳固可靠的结果。因为在一个没有民主传统，没有协商、妥协机制，又习惯于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国家，民主派也好，传统派也罢，都不可能容忍这种调和产物的长期存在。

3.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来源。

戈尔巴乔夫认为：“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历史地形成了两种基本立场。一种是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将社会主义价值观纳入现存社会的社会改良进程；另一种是把社会主义看成是通过辩证飞跃而代替已耗尽其历史潜能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两种观点都渊源于马克思。这两种方法即改良的和革命的方法都有自己的客观依据。”^①但是，

米·戈尔巴乔夫：《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载《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0页。

基于这两种立场的社会主义的现实进程，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或曲折。所以，必须根据历史经验和新的现实情况来重新思考社会主义。

因此，戈尔巴乔夫关于社会主义新观念的探索，首先是由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和否定开始的。他认为，从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社会主义被逐步扭曲并发生了严重变形，形成了一套对社会发展的障碍机制。这种体制的严重缺点在于社会生活的过分国有化，它阻碍了人、社会组织和集体积极性的发挥，造成国家机构的官僚化和思维思维的单一化，导致政治上专横独裁、个人迷信，经济上停滞，思想上僵化。这个体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使国家陷入危机，也是苏联目前产生困难的根源。已经开始的改革，如果不能对此进行改革，整个改革任务就无法完成。因此，苏共当前的任务是：消除对社会主义的种种扭曲现象，同与社会主义原则不相容的专横的官僚制度决裂，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对整个社会制度实行重大改革。要通过改革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主义中，包含着原来就为社会主义运动其他流派所赞同的基本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有一个著名的公式，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其次，戈尔巴乔夫把更新社会主义观念看成是解决全球问题和时代问题的必需。他认为，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在发展中也遇到了困难，一方面，在建设“社会福利国家”的同时，也伴随有引起居民不满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新的技术革命，由于社会结构、劳动的性质、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其心理、期望、需求与行为的深刻变化，造成了许多新的问题。但是，社会主义运动未能及时提出可供选择纲领。

戈尔巴乔夫认为，当代世界的实际情况赋予社会主义思想以新的现实意义。这就使有关社会主义必然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的论证过时了。他说：“人类第一次遇到了生存问题。使调节世界矛

盾的观点国际化，成了绝对命令。这既涉及到消灭核战争的危险问题，也涉及到其它的全球性问题——经济、生态、信息、人口、资源和其它问题。因此，把社会主义论证为经济必然性、论证为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必然性结果已经不够了。‘同时’，在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时代，社会主义首先是工人阶级的事情。而现代技术革命使传统的工人阶级人数减少，知识分子、其它社会阶层和集团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得到加强。①

根据上述批判和分析，戈尔巴乔夫为自己的改革理论和社会主义新构想找到了理论依据——“异化”论。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归根结底就是结束“异化”。具体地说，就是结束剥削社会所特有的人与社会的异化现象，即人与生产资料、人与自己的劳动成果、人与精神财富的异化现象。改革就是为了克服异化。实行经济改革，必然要触及到所有制关系，其目标就是克服人与生产资料的异化，克服人与自己的劳动成果的异化，使人成为经济中的真正主人，把经济权交给劳动者。开展政治改革的目的则是克服人与政权的异化，把政权交给苏维埃，以此来实现人民政权的思想，通过民主化，通过复兴苏维埃，使人成为社会的主人。改革最终将使苏联重新获得不加扭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即民主、人民政权、社会公正和人权。

说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问题就变得异常庞杂。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是一个世界进程，一个百花齐放的进程。我们需要的是选择，是构思，是创新。

虽然，在更新社会主义思想的进程中，戈尔巴乔夫仍然强调说，苏共依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伟大遗产，结合当代的现实并考虑到 20 世纪的所有丰富的经验，创造性地发展社会主义思想。

但是事实上，却日趋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而转向了民主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反复强调，苏共要利用别人的经验。他认为，在社会主义这个世界进程中，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外，占有一席之地的还有世界其余部分社会主义思想的各种流派以及内容和动机各不相同的社会运动。应深入研究和正确评价社会民主党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发展。目前，苏共正在有兴趣地研究社会民主党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尽管情况有所不同，苏共也要努力利用其中适合苏联社会条件的经验。

当时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苏共中央书记梅德维杰夫和总统委员会成员沙塔林在解释戈尔巴乔夫的上述思想时补充说，目前，苏共正在研究世界社会主义思想，正在从普林汉诺夫的著作中，从费边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从社会党国际的各政党的纲领中寻找合理的内核。

由此可见，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是多方面的，可以说它是多种意识形态、思想观念混杂的产物。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都给了他思想给养。

（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

1. 新的价值取向。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在新的价值取向上建立的。这就是把“人”放在一切问题的首位，承认全人类的价值和利益高于一切。

戈尔巴乔夫认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融会着英勇精神和悲剧。斯大林所以能够把自己的纲领和自己的方法强加给党和整个社会，是因为他巧妙地利用了革命的急躁情绪，利用了群众运动固有的、空想的平均主义倾向，利用了先锋队希望尽快实现预期目标的意愿。对于向新社会过渡的方式和方法所作的必要探索，导致了残酷斗争，在这场残酷斗争中占了上风的不是列宁主义，而是另一

种与之相反的构想。这种斯大林主义的歪曲导致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质被替换，导致了群众对它的曲解，导致了抛弃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设想中的最主要之点，即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这种歪曲不仅背离了社会主义，而且背离了欧洲的人道主义传统，而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传统的土壤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基于这种认识，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的意图定向为：应该创造现实条件和保障机制，把人作为主角吸引到改革过程中来。处于中心地位的应该是人。国家应该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相反。社会的所有机构都应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我们的政治进程就是以此为目的的。那么，怎样才能体现一切为了人这一基本的价值观呢？对此，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被设想成这样一种社会：

人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为人创造无愧于现代文明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克服人与政权，与他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分离，确保人能积极参加社会进程。

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和经营形式的基础上，确保劳动者变成生产的主人，有高效率劳动的强烈愿望；为生产力进步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提供最佳条件；保证社会公正和劳动者的社会保护。

人民的意志是权力的惟一源泉；国家受社会监督，保证保护人的权利与自由、尊严与人格，而不管其政治地位、性别、年龄、民族和宗教信仰；在法律范围内行动的所有社会政治力量自由竞争。

这是坚定不移地主张各民族人民和睦、平等合作，主张尊重每个民族决定自己命运权利的社会。

根据国际公认的准则，实现人权等等。

总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核心和实质是人道主义。戈尔巴乔夫强调，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的社会就是实实在在的、切切实实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是人在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中，在物质、精神、道德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既然建立这样的社会是改革的主要目标，我们也就完全有理由说我们正在建设人道的社会主义。在建设这一社会时，党的政策中心只有一个字

“人”，党的主要目的是切实使人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保证其有良好的生活工作条件，保证社会公正、政治自由，为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的发挥创造条件。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改革的主要标准是，全面充实人民，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同样占据中心地位。

2.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与基本原则。

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简略论证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七个基本特征：

第一，这是一个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整个社会的发展，从社会经济到精神思想领域，目的都在于满足人的需求和人的全面发展。而且所有这一切都要通过人们自身的劳动、创造和努力来达到。

第二，这是一种有效而活跃的经济制度，它采用科技进步的优秀成果，具有最高的劳动生产率；是一种直接服从于满足社会需要和灵活适应这种需要的经济。公有制和个人所有制以及生产组织的多种多样的形式是这种经济的基础。在这些组织形式当中，劳动人民实际上是生产的主人，工资和劳动成果直接挂钩得到保证。

第三，这是一种社会公正的制度，这种制度把人们对劳动、保健、教育和住房、社会赡养等十分重要的需求的社会保障，同始终不渝地实施按劳分配的原则、铲除任何形式的平均主义和社会寄生现象结合起来。在这个社会中，对人的能力、人的卓有成效的劳动、技能和天才给予最高的评价并给予应有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

第四，这是一种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道德的制度。它继承和扩大人类精神发展的优秀成果和人类丰富的精神阅历。这是一种劳动者的生活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生气勃勃和极为丰富的社会，这个社会否定消费主义、精神颓废和文化原始主义。在高度文化素养的概念中还包括社会的生态文化素养，以爱惜和理智的态度对待生活的自然条件和人们的生产活动，保护和增加自然资源。

第五，这是一种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保证全体劳动人民有充分可能性来表达自己的需求和利益，参与社会进程的管理，人们与政权的隔阂得到克服。这是一种社会主义人民自治、在管理经济和社会进程方面深入和彻底的民主化以及法制、开放性和公开性的社会。

第六，这是一种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制度，是各民族社会与精神繁荣和互相充实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任何民族间仇视的表现以及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偏见都没有存在的余地，占上风的是族际主义和各民族的兄弟情谊。

第七，这是这样的一种制度，它的本质和利益必然渴望和平，渴望加强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合作与协作，渴望在民主与平等的基础上，在互不干涉事务、承认各国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主权的基础上与各国人民建立正常的和文明的关系。

为确保上述特征的实现，戈尔巴乔夫及苏共不断加深和完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并围绕其特征提出了一系列基本原则，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 实现政治多元化和社会生活民主化。包括政党体制由一党制转向实行多党制；国家政权由党的高度集权转向实行三权分立的总统制，在新的原则基础上形成最高权力机关，由威权体制向民主制度迈进；联邦体制由联邦转向实行邦联，即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各加盟共和国和联盟国家之间用多种形式联合为主权共和国联盟；选举制度实行普遍平等的直接选举原则，选举应成为社会一切阶层、个人竞争的场所。

(2) 发展市场经济。实行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包括非国有化和私有化，为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平等、健康的竞争而斗争；用市场调节经济的手段发展经济，放弃用集中的计划对生产的发展施加影响；为组织好市场经济，必须建立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有价证券市场、投资市场、外汇市场、科研成果市场，加速实行财政、货币、信贷体制和价格的改革。为此，应在立法程序内使生

产、贸易、信贷服务、保险业非垄断化。

(3) 实行意识形态多样化。要摒弃精神垄断，要坚决抛弃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和对其他观点及思想的不容忍态度。要站在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立场上，放弃与全民和全人类价值相对立的简单化的阶级立场，“无论从政治中还是从意识形态中我们都要取消‘敌人形象’”实行意见多元化和舆论多元化。

(4) 全面革新苏共。党必须加速改造，党在社会中的地位应有根本性改变，要放弃那种自以为绝对正确的主张，放弃政治垄断地位。党将在民主进程的范围内推行自由的政策并为保持执政党地位而奋斗。苏共同其他社会政治组织一样，参加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党的作用在于以民主方式确认政治领袖；苏共在理论和实践中以全体人民的民主和人道主义传统为依据；党内争论及决策应该民主化，保证意见多元化、批评自由、态度和立场多元化。

(5) 建立法制国家。在法制国家中，可以排除任何阶级、政党、集团、官僚管理体制的独裁专政，保证全体公民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担当任何职务。在法制国家中，国家和公民互相负责，民主通过的法律至高无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政治组织在宪法范围内自由竞争，实行直接的平等的普选权原则。

(6) 苏联武装力量“非政治化”，不干预国内政治生活。在多党制条件下，苏联武装力量不再从属于任何一个政党，不再接受某一政党的指挥调动；在苏联武装力量中新建立的军事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首长，它不再是苏共的工作机关；苏联武装力量的职责是保卫祖国，抵御侵略，不得干预国内政党政治斗争。

(7) 主张使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化。主张社会政治选择的自由，不同制度的国家应该从对抗走向合作。苏共愿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自由党和民族民主党进行合作。

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在苏联改革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它是改革的产物，同时又在实践中指导改革，直接服务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战略。这种理论与实践的

结合，使苏联党和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三）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后果

历史进程反复说明 意识形态往往比随之而来的政治现实要温和得多，思想家也比政治家要软一些。苏联的改革现实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针对自己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积弊进行的改革，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的新探索，有其进步性、合理性。但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实施及其引发的政治现实却是异常残酷的。

1. 革新苏共，导致苏共瓦解。

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苏联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改革伊始，苏共被视为改革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因此，在苏共二十大通过的苏共纲领和章程中，保留了苏共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特性。但是，当改革的航向被转向政治体制改革后，戈尔巴乔夫认为，党已落后于时代。苏共由此被视为改革的阻碍者和改革的对象。1988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坚决主张苏共民主化，主张党的工作应具有公开性。同年 6 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戈尔巴乔夫一再强调党的“革新”问题，说在着手“革命性改革时，党应从自身做起”，明确了党自我净化的思想。此后，革新苏共一直被看成是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一项首要任务，并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轨道上加速了这一进程。

（1）“革新”列宁的一系列建党原则。党的指导思想：由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转为以意识形态多元化作为党的思想来源；党的性质：由工人阶级先锋队，转为“一个按自愿原则联合公民、实施以全人类价值和共产主义理想为基础的纲领性目标的政治组织”；党的奋斗目标：由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转为“把在国内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保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作为自己的目标”；党的组织原则：由民主集中制，转为允许派别存在的“民主制”。结果，造成党内极大的思想混乱，自上而下变成了争论不休的俱乐

部，苏共由思想分歧转向组织分裂。苏共党内由改革而引发的对改革的方针、目标、改革的战略以及实施改革的策略、速度、途径、方法等问题的争论和分歧、矛盾和斗争，变成了对党的信念、党的原则、党的历史甚或党存在的“合法性”的争论和斗争。党的信仰的分裂，使党丧失了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而取消民主集中制原则，则使党失去了团结、统一的组织保证。

(2) “革新”党的领导体制。党的领导地位：由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转为以议会民主的方式获取执政地位；党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由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变为平等的“伙伴关系”。党政关系：党对国家的领导权在“还权苏维埃”的口号下，由“党政分开”的改革目标，走向了“党政分离”。结果，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人代会修改了苏联宪法第6条，删除了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文，从此，苏共的领导地位失去了法律依据。这使原本就遭遇挑战的苏共领导权，在党内外反对派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况下，遇到了更大的冲击。同时，在新旧领导体制的更替中，苏共自身并未做好准备。一方面，没有从理论上解决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与党政分离的矛盾问题；党政分离的结论是从否定传统模式中得出的；另一方面，在实践中没有使广大党员和党的组织掌握新的活动方式，党内一片混乱，党的机制实际上处于不发挥作用的瘫痪状态。这样苏共党的领导就变得异常软弱和脆弱。

(3) “革新”政党体制。政党体制由一党制转为多党制。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前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打破了一党制的传统。随着公开性、多元化和民主化的实施，一方面，导致了社会上成千上万个非官方组织的应运而生，1988年甚或出现了第一个反对派政党“民主联盟”；另一方面，导致了执政党——苏共自身的政治分化。在苏共内部三大主流派，即激进的改革派、中间派、保守派的基础上，各派又在自己的阵营中，程度不同地分化出一系列色彩各异的政治集团，形成了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派中分流的局面。对此，1990年由官方提出推行多党制，并把它作为“人道的、民

主的社会主义”新体制的政党体制基础。但是，多党制体制的有效机制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来。由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型，无疑加剧了社会政治力量和苏共自身的进一步分化与改组，苏共作为政治生活“传动带”的作用也随之被削弱和取缔。

结果，一个执政 74 年的大党，内部四分五裂，在反对派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迅速瓦解。虽然在 1990 年 7 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八大会上，通过了主流派的《苏共中央行动纲领》和《苏联共产党章程》，但在为二十八大会准备的纲领中，还有传统派的《马克思主义纲领》和激进派的《苏共民主纲领》。除此之外，在准备二十八大的过程中，出现了 20 多个行动纲领、几十个党章草案和呼吁书。

在组织上，激进派代表人物叶利钦、波波夫、索布恰克在二十八大会上宣布退党；到七月全会，著名政界人物雅克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鲁茨克伊脱离苏共，另建新党“民主改革运动”；安德罗波娃领导的苏共强硬派宣布成立“布尔什维克纲领派”；各派和新成立的党都有自己的追随者，因此，二十八大会前后苏共出现退党高潮，截止到 1991 年 7 月 1 日，苏共党员由 1900 万锐减到 1500 万。波罗的海三国的共产党也先后宣布脱离苏共而独立。

1991 年 8 月中旬，戈尔巴乔夫决定去弗罗角休假。此时，联盟的前途，苏共的命运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以最尖锐的形式提到了各种政治力量面前，最终以最激烈的斗争方式爆发了八·一九事件。

八·一九事件成为苏共瓦解的加速剂。事件发生后，8 月 23 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发禁共令；8 月 24 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的前途自行决定”。苏共在各级机关、军队和企业的组织被取消。9 月 5 日，无力回天的苏共中央总书记伊瓦什科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决定同现实妥协，解散中央机构和其他党的机关，临时成立一个撤销委员会负责“料理后事”。

至此，苏共在组织上瓦解。

2. 实行人代会制，总统制，建立新的联盟国家，导致苏联解体。

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相适应，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便是“还权苏维埃”，即恢复苏维埃作为国家全权机构的作用，从根本上提高苏维埃作为苏联社会政治核心和立法中心的地位。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确立了一个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其常设机构为最高苏维埃（议会）。1989年5月25日至6月9日，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选举戈尔巴乔夫为第一任最高苏维埃主席。

这一举措直接涉及到苏共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国家的任何问题、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如越过苏维埃是不能解决的。党的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民族政策，首先应当经过人民代表苏维埃这个政权机构贯彻执行。”^①这样，从前属于党的权力，属于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权力，就为苏维埃所取代。但是，在权力移交过程中，苏共的反对派乘机而入，使苏维埃成了各种政治力量的角斗场。

在1989年选举苏联代表的过程中，议会和人民代表大会中都出现了激进派议员团，并很快在组织上形成以激进派代表人物叶利钦、波波夫、索布恰克、阿法纳西耶夫、萨哈罗夫为首的跨地区议员团。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对大多数代表施加影响，使苏联的立法利于反对派的生存和发展。例如，1990年3月，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修改补充苏联宪法法，从法律上取消了苏共的执政党地位，确立了多党制原则；同年10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苏联社会联合组织法，使多党

戈尔巴乔夫：《关于苏共二十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1988年6月28日在苏共第十九次全苏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制的宪法原则进一步具体化，为苏共反对党的合法化奠定了法律基础；1990年6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苏联报刊和其他大众新闻媒介法，确认了意识形态多元化，新闻出版自由原则，使大众新闻媒介脱离了苏共的领导，一些舆论宣传工作者公开转向反共立场，舆论完全失控；苏联最高苏维埃还通过了苏联人民代表选举法，确认了差额选举原则、选举的公开性原则和竞选制，为各色代表人物进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参与国家决策创造了良机。

1990年苏联国内各派力量的格局，由于进行共和国和地方苏维埃代表的选举而发生急剧的变化。苏共党内的各派和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力量，在苏联人民代表和各级苏维埃选举中，为取得各级政权，开始联合成政党、运动和联盟，参加竞选。结果，在共和国一级的选举中，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托维亚、爱沙尼亚的共产党沦为在野党，三国的立法权、执行权和司法权都落入民族主义者手中；在摩尔多瓦、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俄罗斯，苏共丧失了执政权，激进的民主派或分离主义者获胜；在地方的苏维埃选举中，一些地方政权落入苏共反对派手中，如列宁格勒的民主精英索布恰克当选为该市市长；莫斯科市长的权杖落入民主派领袖波波夫之手。

特别是在这次选举中，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当选后的叶利钦发表讲话，说他将致力于实现俄罗斯联邦的主权，这种主权意味着自下而上的独立。也就是说，俄罗斯联邦的法律和宪法具有对全苏法律的优先权，俄罗斯联邦具有独立的内外政策。于是，在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代会上，通过了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

俄罗斯主权宣言通过后，各共和国纷纷效法，半年内，所有加盟共和国都通过了同样的宣言。这意味着，苏联出现多头政治形势，出现了各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间的法律之战和主权之战。它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伏笔。

面对“还权苏维埃”不解决问题的现实，戈尔巴乔夫等人又提

出建立总统制来重新配置最高决策层的力量，以便加强权力，解决问题。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正式提出设立总统制问题。3月苏联人代会召开第三次非常大会，决定在苏联正式设立总统职位并修改宪法的相应条款。修改后的宪法规定总统由民选产生，但鉴于苏联所处的“复杂时期”，这次大会决定首届总统由苏联人代会选举产生。结果，戈尔巴乔夫以 1329 票赞成、495 票反对当选为苏联第一任总统。

总统制的建立，的确加强了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总统被赋予了远比苏维埃主席更为广泛的权力。但它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相反加剧了国内的紧张局势。这是因为：首先，总统制作为稳定局势的应急措施，出台仓促，从总统制正式提出到完成建制，总共用了不到 40 天时间，因而各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规定混乱，矛盾重重，造成整个国家权力体系不能正常运转，反而把全国上下的注意力都吸引到因权力分配而引发的争吵上来，导致政治过热，经济持续下降，民族问题、社会问题激化，而总统成了这一切矛盾的聚焦点；其次，设立总统制的决定是由苏共作出的，而苏共作为执政党的合法地位的丧失，直接决定了总统制的命运；再次，各共和国相继发表主权宣言，纷纷提出独立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联盟中央的法律、法令、政策、措施对各共和国毫无约束力，根本无法推行。尤其是 1991 年 6 月，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后，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俄罗斯联邦的范围，它直接影响到新的联盟条约的签订。

八·一九事件发生后，苏共在组织上彻底瓦解。随后，苏联也遭遇了同样的厄运。

9 月 2 日至 5 日，苏联第五次非常人代会召开。此前，戈尔巴乔夫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哈萨克、阿塞拜疆、吉尔吉斯、塔吉克、亚美尼亚和土库曼 10 个加盟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签署了一项有关新联盟建立之前的合作声明，提出了起草和签署《主权国家联盟条约》并建立过渡时期新的苏联国家机构的建议。人代会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后以绝对多数通过。

9月6日，戈尔巴乔夫主持召开新成立的国务委员会会议，宣布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

12月1日，乌克兰就共和国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同时选举总统。12月5日，经全民投票选举产生的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宣布，乌克兰不准备签署任何新的联盟条约。对此，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首先发表声明，宣布“俄罗斯领导人承认乌克兰的独立”，并表示如果乌克兰不签署联盟条约，那么俄罗斯也不会会在上面签字。

在这种形势下，联盟国家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12月8日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维奇在明斯克签署了《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发表了《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声明》。12月21日，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11个共和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签署了《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的议定书》和《阿拉木图宣言》，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同日，他们致函戈尔巴乔夫，通知他苏联已不存在，苏联总统的设置也已取消。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正式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一项宣言，完成了苏联停止存在的法律手续。

至此，苏联彻底解体。

苏共的瓦解，苏联的解体，标志着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的失败，同时也标志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架构的破灭。苏联共产党就这样承载着自己曾有的辉煌与亡党亡国的悲剧性命运走进了历史，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第二章

东欧共产党：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在 20 世纪的 100 年里，地球各个角落都发生了前一个世纪无与伦比的变化，但就其变化的深度、广度和烈度而言，莫过于 20 世纪末发生在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剧变。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东欧各国共产党相继丧失了执政地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生变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也蜕变为以民主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社会民主党。这一切犹如一场地动山摇的“大地震”，令人瞠目结舌，更发人深思。

波兰统一工人党是倒下的第一块“骨牌”。在以团结工会为主力的反对派的重压下，波兰统一工人党不得不接受政治多元化的要求，实行多党制，取消宪法中关于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规定，放弃对权力的垄断，同意与反对派竞争权力，最后在大选中不敌反对派，失去了执政地位。选举惨败，更是动摇了党员的信仰，波兰统一工人党演变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则是由于党的领导层发生分裂，主张彻底变革的“激进改革派”占据上风，把党引向了蜕变之路。以波日高伊等为首的激进派，积极倡导多党制，放弃党的领导地位，纵容了反对派势力，使之成为与匈社工党相抗衡的力量，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自身的社会民主党化导致了党的分裂，更是为反对派通过大选获取权力铺平了道路。

波兰、匈牙利局势的变化很快影响到东欧其他国家。在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反对派的压力和

各国共产党党内的分裂，共同把党推向了不归之路。社会民主党化后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虽在第一次大选中战胜了反对派，但是它们的执政地位已是摇摇欲坠了，最终在反对派的步步紧逼下沦为在野党。与这些国家的和平过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马尼亚的武装冲突。齐奥塞斯库执政时期对社会的压制和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注定使人们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宣泄内心的不满。齐奥塞斯库夫妇被送上了断头台，罗马尼亚共产党也不复存在，由反对派组成的救国阵线接管了政权。南斯拉夫的剧变也显示出不同的特点。社会主义自治民主制削弱了南共联盟的领导核心作用，多党制的推行则将南共联盟推向了分裂的边缘。南共联盟性质的变化未能遏止各共和国共盟的独立倾向，南共联盟最终彻底解体。在失去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核心力量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一分为五，并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之中。

东欧共产党在 1989 年失去了把持 40 多年的执政地位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像历史上发生的任何重大事件一样，都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合力，即历史结果。”^① 因此，绝不能简单地认为东欧剧变、共产党垮台是由某一两个因素促动的，必须全方位地分析和认识。但是，多重因素中必然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有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的区别。在诸多因素中，苏共的执政模式对东欧造成的危害是东欧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最为根本的原因。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是东欧共产党在丧失政权后社会民主党化的直接根源。同时，民族和宗教因素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西方的“和平演变”和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转变则是东欧政局变迁的外部因素。

一、苏联模式的直接促变作用

由于推行苏联模式导致东欧共产党最终丧失执政地位，这其中的道理是不言自明的。且不说别国模式被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必然导致水土不服，更何况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远不是一种成熟、完善和理想的模式，存在着明显的弊端。在政治上，由于集权过多，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现象滋生，民主监督机制不健全，造成官僚主义、滥用权力和各种腐败，毒化了社会政治空气，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恶化了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这种模式的经济体制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生产资料得不到合理配置，生产效益日趋低下，浪费消耗十分严重；经济的集中管理束缚和压制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整个经济缺乏活力和动力，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在消费服从于生产的方针下，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日常生活需要的食品和日用品长期短缺。因此，在采纳苏联模式后，东欧各国就接连不断地发生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最终导致东欧人民在抛弃苏联模式的同时，也抛弃了东欧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一）苏联政治模式的危害

由于照搬苏联模式，东欧的政治体制带上了高度集权的特征，形成了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即国家权力集中于党，党的权力集中于少数领导人。

首先，国家权力集中于党，无论是议会、政府还是法院都只是执行党的决策的工具。从1948年起，东欧共产党成为各国政权的核心理，成为权力的垄断者。由党做出所有重要决定，指导和控制所有的重要机构，任命所有的重要职务。无论是政府、立法机构和法庭，还是中央或地方权力机构，都只是扮演党的执行机构的角色，都要对执行党制定的重要决策负责。对共产党而言，国家机构没有独立的地位，其主要任务就是把党的决定转变为国家的政策。

虽然东欧各国的宪法都规定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享有立法权。但是，由于共产党控制了方方面面的权力，议会成为形式上的最高立法机构，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它的作用只是把党的决定转变成国家的法律。在议会休会期间，议会的权力和责任授予国务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委员会有权制定法律条文，而且委员会可以把它的权力授予委员会主席，而这个主席通常是党的总书记。这样，立法权实际上又落入党的手中。

而且，东欧国家的议会定期会议上进行的讨论都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本来应属于议会讨论的问题，也常常找借口不让议会参与。例如，有的国家以保守国家机密为借口，根本不在议会讨论国家预算问题。议会的监督作用也受到削弱，对重要国家机构的任何批评都受到压制。

不仅如此，议会选举也受到党的严密控制。虽然各国都规定了普遍、平等的选举原则；但是，在实践中，党通常通过爱国人民阵线或全国阵线等组织控制选举过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所有被提名的人都必须是全国阵线的候选人，这就保证了作为全国阵线领导力量的共产党垄断对候选人的挑选工作；在匈牙利，尽管 1971 年取消了爱国人民阵线对议会候选人独有的甄别权，但提反对爱国人民阵线纲领的候选人仍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 1975 年的选举中，反对爱国人民阵线的票数仅占有效票的 0.4%。

党政机构之间相互渗透，党加强了对国家行政机构的监督。党内设置一套与国家的行政机构平行的执行机构，如与政府分管工业、农业、外交、人事等部门相对应，中央书记处也下设工业、农业、外交、人事等部。党的执行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政府的相应部门。党的执行机构的人员队伍十分庞大，党的领导人占据着国家和政府的关键职位，职务的互相交织确保了党的统治。例如，贝鲁特既是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也是国家主席。

党还控制着所有重要职务的任免权。企事业单位的任免都由党的相应机构控制：高级官员的任免权属于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层属

于城镇委员会。由党的领导人挑选他们认为“合适的”人担任重要职务，而这些人也就只对决定他们升降命运的领导人负责。人事任免权是保障党对国家和社会机构实施控制的重要机制之一，而这种自上而下的委任制和实际上的终身制为权力过分集中、干部脱离群众监督和享有特权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与立法权、行政权一样，司法权也由党控制。形式上，司法权属于司法部，由司法部任命法官。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判决都是由党的有关机构做出。例如，在对共产党领导人的公开审判中，判决书都是由党的政治局事先起草，然后交给法庭。除了政治公开审判外，党和国家的官员从未因犯罪行为被判刑，他们只是悄悄地被撤职或被调到其他地方，以维护党的声誉。所以有西方学者说：“像共产党的其他国家机关一样，司法机关向来是为执政党的政治目标服务的，在斯大林主义时期的清洗案件和公开的阶级歧视中，它的驯服和武断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①

这种党凌驾于一切权力机构之上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首先，以党代政，一方面干扰了行政系统的正常运转，削弱了政府机关的作用。另一方面易于在执政党队伍中滋长官僚主义，培育特权阶层，甚至直接影响党内的民主生活，如阿尔巴尼亚，在从全国解放到1948年召开一大的这段时间里，就因党中央组织书记兼任政府内政部长，致使警察式的工作方法渗透到了党内，妨碍了党的民主建设。另外，党政机构重叠导致党和国家机关增员过多，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下。其次，以党代议，使议会成了把党的决定变成国家的法律的工具。如本·福凯斯所说，“议会这个机构只起橡皮图章的作用，它是为在别的地方作出的决定服务的。”^② 这种状况

〔美〕特里萨·拉科夫斯卡-哈姆斯通、安德鲁·捷尔吉：《东欧共产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页。

② 〔英〕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

使一切权力属于劳动人民成了一句空话，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体现，参政议政的政治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最后，以党代法，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治。

其次，共产党内部的领导权集中于少数人。东欧各国共产党内部的领导体制几乎是一致的，都是实行等级制，以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结构为模式。

根据党章规定，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党代表大会。党代会每4年或5年召开一次。但是，这一规定并没有被遵守。由10~15人组成的政治局是党的真正决策机构，是党最重要的领导机构，负责制定所有长远计划。政治局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在有些国家称为主席团，在中央委员会休会期间代表中央委员会行使权力。党的真正权力集中在政治局，政治局提交给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在一般情况下会无一例外地得到一致通过。

党的等级制度在地方也被采纳。国家的每个行政单位（共和国、县、城镇、区或者乡村）、每个部以及部属机构、每个工厂及车间、每所大学及系科都有党组织。党员定期召开全体会议。地方一级的党的机构监督和决定着每个企业、事业或学校的活动。

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但是，照搬了苏联共产党的做法，过分强调集中，忽视党内民主建设。对党做出的决定不允许怀疑或争论，必须努力执行党的所有政策。对党的政策提出任何疑问都会被视为背叛。自1948年年底起，各国共产党越来越多地采用无情的清洗手段，维护党的“先锋队”特征和铁的纪律。大约每4名党员中就有1名因“敌对”、“偏离”、“小资产阶级倾向”、“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或“不成熟”被开除出党。

党的总书记或主席不仅掌握了党的权力，同时又担任国家最高领导职务，这种集权制度产生了个人崇拜。正如赫格居斯所说：“个人崇拜是任何极权制度的产物，不管这个制度在哪里。……在极权制度里站在权力顶端的是一个人数极少的集团，同时集体领导的形成通常是短命的。如果出现了一人的领导，于是这个制度的利

益便要求为他编织神话，谱写赞歌，因为这样有助于推动这个制度的运转。”^①

个人崇拜现象在东欧各国都存在。“50年代每一个东欧国家都有自己的‘小斯大林’。在保加利亚是契尔文科夫，在罗马尼亚是乔治乌·德治，在波兰是贝鲁特，在捷克斯洛伐克是哥特瓦尔德，在匈牙利是拉科西。他们都享受官方发起的对他们的吹捧，其程度仅次于斯大林本人。”^② 这些党的总书记或主席都被描述为英明过人、和蔼可亲、多才多艺，在各个领域都是无可挑剔的专家。他们的一个讲话或一篇文章都会成为国家的指导方针，成为学习和引用的教材。。

东欧共产党在二战胜利前影响不大，缺乏社会基础，可谓先天不足。由于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英勇表现提高了自己的声誉，赢得了群众的拥护。但是，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党实际上具有了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凌驾于群众之上，严重脱离群众，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使党的政权很难在人民群众中扎下根。同时，这种体制也损害了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声誉，致使东欧社会主义建设危机频发，乃至最后走向剧变。

（二）苏联经济模式的缺陷及其危害

东欧国家在经济上也照搬了以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为特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苏联经济模式，这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模式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第一，过分单一的所有制形式脱离了东欧国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羁绊着经济的进步，尤其是农业

〔匈〕赫格居斯·安德拉斯著：《赫格居斯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75 页。

② 〔英〕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6 页。

集体化的实施违反了自愿原则，强制农民加入合作社和严厉打击富农的做法伤害了农民的利益，不少人背井离乡，土地荒芜，农业损失惨重。第二，无所不包的指令性计划包揽了国民经济整个生产分配过程，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手段更是严密地控制着企业的一举一动，完全排斥了市场的作用。在这种体制下，企业不再重视产品的竞争力，科技人员缺乏顺应世界科技革命浪潮的创新精神，劳动者浪费严重，产品更新缓慢、积压如山，经济效益低下，经济发展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和活力。第三，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国民经济各部门间比例失调，不仅造成了对原材料和能源的巨大消耗，经济增长趋势下降，而且由于农业和轻工业的滞后，食品和日用消费品的供应日趋紧张，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改善。

此外，苏联的经济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高投入，获得高产出，是典型的消耗型模式，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如，建立大机器工业体系，就需要大量的钢铁、电力和劳动力等。这种模式的产生也是基于苏联地大物博，能源、矿产和劳动力都十分丰富，有能力投入大量的资源这样的现实。

而东欧国家都是中小国家，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不及泱泱大国苏联。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自然资源蕴藏量相对丰富。波兰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无烟煤，以及大量的铜矿，还有铅、银、锌、硫磺、镉和铁。罗马尼亚拥有欧洲最大的陆上油田，天然气产量也相当高。褐煤、铝矾土、锰、铅、锌、金和银的蕴藏量也相当丰富。但是，这两个国家缺乏大规模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劳动力。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矿物资源则极为贫乏。匈牙利只有铝土，保加利亚有少量的褐煤、铅和锌。捷克斯洛伐克是东欧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却又是自然资源最贫乏的国家。虽然它拥有欧洲大陆蕴藏量最大的沥青铀矿，可以提炼铀和镭，但是它没有足够的煤和充足的水力发电。

因此，东欧国家不具备进行苏联式的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模式的条件。可是，这些国家却不顾自然资源不足的条件，贪大求

全地去建立以冶金工业为龙头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结果，它们只有通过进口超过自身生产能力几倍的各种燃料、水力发电和核动力才能满足需要。例如，波兰南部的克拉科夫地区建设了大型的“诺瓦胡塔”钢铁厂，而大量的矿石却要从苏联运来，这就造成了严重的浪费。而且，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下，把有限的资金和生产要素都投入重工业，势必造成农业和轻工业更加落后。东欧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不仅没有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而拉大了与后者的距离。二战前，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实力超过奥地利，是名列世界前10位的工业富国，到1989年，奥地利人均国民收入居世界第11位，而捷克斯洛伐克却跌到世界第33位。保加利亚与希腊接壤，两国在人口、面积、自然资源上相当，长时期内人均国民收入也接近，到了20世纪80年代，保加利亚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为希腊的54.8%。正如波兰经济学家法别尔耶维奇所说：“苏联的体制只适用于具有极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如果运用到别处则是有害的。”^①

而且，苏联的高速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符合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国际背景。苏联自成立之时，就受到帝国主义的进攻。直至20世纪30年代，它继续处于英国、法国操纵的欧洲协约国集团的重重包围之中，又面临着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威胁。为了迅速增强国力，立于不败之地，苏联形成了一种“准备打仗”的经济模式。正如苏联官方所指出的：“不断扩大军用品生产是战争时期苏联经济的基本规律。”实践证明，苏联模式是十分适应战争的需要，苏联适应战争的能力远远高于英、美、德等国。二战时苏联年均生产的坦克和火炮比德国几乎多1倍，比英国多3倍；大炮比德国多5.3倍，比美国多0.5倍，比英国多4.3倍；飞机比德国多70%，比英国多50%。

〔英〕本·福凯斯著：《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

但是，1945年东欧所处的国际环境与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外部环境大不相同。由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打击，无论是世界各国的人民，还是领导人，都对战争怀有一种恐惧。尽管世界范围内也有局部战争发生，也有冷战，但总的来说，东欧获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因此，东欧各国不像苏联那样需要建立应付战争需要的经济模式，人民对苏联的经济模式带来的积极效果也就体验不深了。

苏联经济模式的弊病使得东欧一再陷于难以克服的经济困难之中，危机频发，社会动荡，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政治后果。

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都是起于经济政策的调整和经济形势的恶化。1950年开始的六年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实现高速工业化的目标，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平衡，轻工业和农业远未完成计划指标。面对食品和日用消费品的匮乏及物价的上涨，大部分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没有提高，人民群众怨声四起。1956年5月，波兹南采盖尔斯基工厂的职工率先提出增加工资、调整不合理的劳动定额、支付加班费等要求。6月，因上述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该厂1万多名职工走上街头，游行占领监狱，冲击省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流血惨剧发生了。

1959年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在国内保守势力阻挠、国外苏联非难的压力下，波党放弃了“波兰道路”，重新回到苏联模式的老路上。继续实行工业化方针的结果是国民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日渐加重，农业歉收，市场供应紧张，整个20世纪60年代波兰成为经互会国家中国民收入增长最慢的国家，波兰人民不得不勒紧裤带。波兰的当权者首先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持，1968年3月，因禁演《先人祭》引发了学生的抗议活动，政局为之动荡。1970年12月，政府决定大幅度提高社会消费品的零售价格，人民负担加重，愤怒的浪潮很快席卷了格但斯克、格丁尼亚、索波特、埃尔布隆克和什切青等城市，罢工规模不断升级，爆发了比1956年波兹南事件更为严重的流血事件。

盖莱克上台后，推行“高速度、高积累、高消费”的“三高”政策，力图借助国外贷款实现工业现代化，利用出口产品偿还外债，以改善和提高人民的劳动条件和实际工资。但好景不长，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国际市场上石油和原材料价格上扬，国际收支平衡失衡，外债激增，国内则连年干旱，农业歉收，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各地开始出现了一些抗议活动。1976年初，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日用消费品严重不足，商店门前经常排起长队，不满情绪滋生。到1976年6月，政府已无力拿出对农产品的巨额补贴，商品价格难以维持，遂决定提高肉类、鱼类、黄油、食糖等食品的价格，尽管政府允许补贴因提价造成的损失，但工资越高补贴越多的做法仍让广大劳动人民难以承受。因此，在提价方案公布几小时后，拉多姆的工人就走上了街头，总工和罢工风潮急速蔓延到华沙郊区的乌尔苏斯和普沃茨克。在强大的压力下，提价的决定在14小时之内被取消，经济危机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加深。4年后的1980年7月，政府不得不再次宣布提高肉类销售价格，东南部小城米耶莱茨的工人当即揭竿而起，抗议肉价上涨，随后全国各大工业中心和城市相继卷入，政局急剧恶化。在社会主义政权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波兰于1981年12月进入战时状态。

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也与社会上长期积聚的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经济发展缓慢的不满情绪密切相关。二战前的匈牙利农业基础较好，推行农业集体化后，由于强制农民入社和实行过高的征收计划，农民的生活水平连年下降，生产积极性受到重创。1952年农民的实际收入比1949年下降66%，生产合作社社员收入只及个体农民收入的67.5%。1953年农业平均产量刚刚达到战前10年的平均数，但就某些产品的质量来说，还达不到战前的水平。同时，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得轻工业和农业难以获得必要的投资，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得不到满足，1951年起国家开始凭票供应主要食品和日用消费品，并通过提价来缓解供不应求的局面，结果导致了人民生活质量的降低。濒临崩溃的经济状况激化了

社会矛盾，悲剧已经不可避免了。

其他东欧国家虽没有像波匈那样因经济困难导致动荡，但也不时陷入危机的泥潭。比如，由于照搬苏联的发展战略，造成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农业比例失调，1953年，农业生产仅为战前的88%。对农业和轻工业的忽视导致了食品和日常消费品供应不足，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在这种形势下，1953年6月1日，捷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将旧克朗变换成新克朗。新旧克朗的比价是1:5，而且每个公民只能兑换300旧克朗，剩余的旧克朗以50:1的比价计入封存的账簿。币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当天，比尔森市5000名工人走上街头，高呼“我们不能忍受这样的掠夺”等口号，冲击了市政府。比尔森事件发生不久，6月17日民主德国东柏林也爆发了罢工和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的经济政策，数千名工人和市民走上街头，要求降低生活费用，按时支付工资。罢工很快蔓延到全国，游行者与警察之间甚至发生了冲突，死伤数百人。最后，苏联驻军出动了坦克，平息了事态。东欧其他国家也时常发生因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在南联邦，因生活费用上涨，实际收入减少等原因，罢工不断，整个20世纪60年代每年都要发生罢工百次以上，1981年3月，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那大学的一些学生抗议学生食堂伙食引发了遍及全省的示威活动，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

频发的危机和动荡不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且埋下了政治剧变的祸根。首先，因经济问题而起的危机反过来使严峻的经济形势更是雪上加霜。波兹南事件的直接经济损失达350亿兹罗提，1970年12月事件在格但斯克沿海地区和什切青地区分别损失了1亿和3亿兹罗提，1980—1981年的危机更是使波兰经济倒退10年有余，1981年的国民收入仅及1978年的80%，1982年又下降为76.5%。长期的萧条、艰难的生活损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损坏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信誉，经济上的管理不善和政治—社会紧张以螺旋式下降的方式相互作用，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岌岌可危了。

其次，在由不满于落后的经济面貌和恶劣的生活条件而引起的抗议、罢工乃至暴乱中，人们在提出经济要求的同时，往往还会提出一定的政治要求。波兹南事件中，游行喊出了“释放政治犯！”“俄国佬滚出去！”“布尔什维克滚出去！”等政治口号。匈牙利事件时，走出经济困境、纠正冤假错案、改善党的领导和反抗苏联控制的呼声相互交织，此起彼伏。波兰1980年的工潮更是由经济罢工转到政治罢工，明确提出了建立独立于党和政府的自治工会、言论自由和释放政治犯等条件，与政府谈判。正是在一次又一次得不到解决并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中，广大人民群众逐渐对当政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改变现行制度的想法慢慢地滋生并蔓延开来，反对派应运而生，并发展壮大，成为东欧执政的共产党有力的挑战者。对当权者更为危险的是，形势的恶化被一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反对派领导人视为有利因素。尽管听起来很怪异，但事实是“越糟越好”的信念被广泛利用，特别是波兰的团结工会反对派，为了上述目的不断利用这一信念。当时，各种活动和手段都用上了，例如大罢工、持续的通货膨胀——工资指数压力、要求对国有企业提供大量补贴、甚至鼓励国外的金融制裁等，都被作为手段来制造这种恶化形势，结果使得经济范围的危机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

邓小平同志说得好：“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但不幸的是，在东欧，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东欧的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与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终于在和平的经济竞赛中失手于资本主义。1988年，波兰严峻的经济形势再次引发工潮，执政当局被迫一让再让，团结工会东山再起，波兰社会主义制度土崩瓦解，随之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政权也毁于一旦。

（三）留下硬伤的大清洗

为把苏联模式强加于东欧各国 必须清除各国共产党内 特别

是领导层内的障碍，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在东欧的确立因而伴随着急风暴雨般的清洗运动。清洗首先针对那些不愿照搬苏联模式，不愿屈从于苏联利益，坚持按本国实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国党领导人。波兰工人党总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因其“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的主张而首当其冲，他在1948年6月工人党中央全会后屡遭攻击，于1950年8月锒铛入狱。保共中央书记兼部长会议副主席特莱乔·科斯托夫也曾因在自己主管的经济工作中把保民族利益置于苏联的国家利益之上而冒犯了苏联，在清洗运动中被指责为怀有民族主义和反苏情绪，犯下了“铁托分子”的罪行，遭到公开审判，并于1949年12月被处决。

不仅如此，随着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被东欧国家所接受，清洗大大超出了为推行苏联模式扫清障碍的范围，而是更多地受到了苏联国内政治形势和东欧各国党内权力斗争的影响。与哥穆尔卡相比，拉伊克·拉斯洛显然是“匈牙利忠诚的斯大林主义者”，但是，在苏联国内反犹太主义的浪潮中，身为犹太人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拉科西·马加什为保全自己，也为了加强对权力的控制，先发制人，把矛头对准了时任内务部长、大权在握、威信颇高的拉伊克，拉伊克就这样走上了绞刑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更是成为反对犹太主义运动的牺牲品，曾经的“清洗者”鬼使神差般成了被清洗的对象，以他为首的11名副部长以上的捷共高级领导干部被处死，另外3人被判处终身监禁。罗马尼亚的清洗更具有党内权力斗争的性质，通过清洗，不仅“国内派”——司法部长帕特勒什卡努死于非命，而且“莫斯科局”的代表人物——罗党中央第二书记、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长安娜·波克、党中央第三书记、部长会议副主席兼财政部长瓦西里·卢卡和党中央第四书记、内务部长特奥哈里·乔治斯库等也难逃厄运。与东欧其他国家总的模式大不相同，土生土长的共产党人（1933—1944年在罗马尼亚监狱中度过的乔治乌—德治）赢得了反对莫斯科派（战争年代在苏联度过、在那里掌管罗共

事务的鲍克和卢卡)的派系斗争的胜利,从而借清洗之手成功地攫取了党和国家的绝对权力。

自1948年开始的这场清洗重演了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悲剧,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损害了这些国家共产党的力量和威望,践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影响了社会主义的声誉,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

在波兰,仅在1948年9月到1949年12月间,统一工人党(1949年12月由工人党和社会党合并建立)就连续三次进行清洗,清除那些坚持哥穆尔卡的观点或是同情他的人,几乎牵涉到1/4的党员。1951年5月,斯彼哈尔斯基、克利什科、洛加一索文斯基、宾科夫斯基、柯玛尔将军、柯钦斯基将军等大批军队高级将领被捕,19人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70多人被判处终身监禁,约有1500人被判处10至15年徒刑。

在匈牙利,拉伊克案审判后的1950年,劳动人民党主席、共和国主席团主席萨卡希奇·阿尔帕德、党的副书记马罗山·捷尔吉和卡达尔·亚诺什、外长卡拉伊·贝洛等人相继被捕入狱。1951年46.4%的中央委员被撤换,1949—1953年间共有470多人遭到清洗,20万人受株连,近百万人被当作怀疑对象。

在保加利亚,科斯托夫案件株连了包括内务部长安东·于哥夫在内的20多名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领导干部,上千名高级干部被判刑。

在罗马尼亚,1948年到1950年间,通过对党员的普遍审查,共清洗了20多万人出党。

在捷克斯洛伐克,“50年代初,新一代政治犯估计远远超过10万人,在422个监狱和集中营里受折磨。”^①围绕各类政治审判进行了党员审查和换发新党证的工作,结果全党有8.4%的党员和

〔美〕特里萨·拉科夫斯卡-哈姆斯通、安德鲁·捷尔吉：《东欧共产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

预备党员，即近 20 万人被开除。

大规模的清洗运动与社会主义本质格格不入，它使整个社会弥漫着恐怖气氛，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首先，清洗歪曲了司法制度，使法律成为施加政治迫害的工具；其次，在各党内部制造了相互怀疑的气氛，破坏了党的稳定团结，损害了党的威信。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无数起冤假错案侵蚀了党员对党的忠诚和信仰。“审讯和个人专制”，不仅使一些党的领导人蒙受不白之冤，而且“破坏了党员之间的正常关系，……被捕者完全孤立，没有人给他一点帮助，尽管很多人都知道他们是被冤枉的。……所有审讯都只是走过场，那些了解真相的人已丧失勇气，丧失了他们对正义、真理和人类关系的判断力，”甚至“导致党员社会主义理想破灭，失去对党的信仰和忠诚。”^①清洗所造成的恐怖氛围，向所有的党员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在党内讨论时要少发言，不要出风头，否则就会招致杀身之祸。忠于党的事业，勇于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人反而会遭到怀疑和清洗，那就只有消极处事以保平安了。党员丧失对党的忠诚，但在公共场合又假装忠诚，这种人格的分裂对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是致命的伤害，为后来东欧发生社会政治危机埋下了隐患。

可见，照搬苏联模式，是导致东欧共产党丧失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都有清醒的认识。1990 年 1 月 27 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夫斯基明确指出：“强加于我们并接受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在如此大的范围内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由匈牙利共产党蜕变而来的匈牙利社会党在 1989 年 10 月 9 日通过的纲领声明中写道：“80 年代末，匈牙利社会进入历史转折关头。渊源于斯大林的政治制度已经耗尽其潜力，只有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进

迈克尔·蒙克：《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 错在何处》载《国外理论动态》2001 年第 3 期，第 23 页。

行根本性改革，才能克服业已形成的危机。”1989年12月20日，捷共非常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也说：“酿成这一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主义的变态，其实质在于非民主的、集中制的、行政命令式的管理体制。”东欧各国抛弃苏联模式是历史的必然。人民抛弃的是斯大林强加给他们的东西，纠正了历史犯下的错误。但是，令人痛心的是，它们在摆脱苏联模式的时候，连同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也一起丢弃了。

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潜移默化

二战结束后，东欧各国中只有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政党体制是共产党一党制，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都曾经历了多党竞争政权的多元时期。直到1947年，各国的反对派在权力斗争中被消灭后，有影响的政党除共产党外，就只有社会民主党了。二战期间，东欧的两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或工人党）和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共同参加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两党在战后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战争胜利后，两党都主张重建东欧经济和对东欧社会进行民主变革，为两党的继续合作提供了可能性。两党在战后与其他党派一起组成多党联合政府，共同治理国家。然而，随着苏联模式在东欧的推广，东欧加快了建立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的进程。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1948年无一例外地进行了组织上的合并。两党在合并期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尤其是共产党的合并要求受到了社会民主党右翼的强烈抵制，即使主张与共产党联合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也希望两党的合并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新党应是马列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结合体。但是，迫于政治压力，清除了右翼后的社会民主党加入了共产党，完全接受了共产党的纲领。至此，社会民主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从东欧的社会生活中消失了。但是，两党合并后，社会民主党组织虽然不复存在，但是，它信奉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却一直存在影响，这在民主社会主义传统深厚的波兰、匈牙利

和捷克斯洛伐克表现得尤其突出。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非斯大林化运动中和 70—80 年代的改革浪潮中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多次显露，思想的影响最终反映在组织的变化上，最终促成了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东欧各国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

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公布后，以华沙大学教授、波党中央委员科瓦克夫斯基为首的一大批知识分子，组成了“十月左派”，在他们的刊物《直言》杂志上斥责斯大林主义的实践是反社会主义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基层组织开始出现社会党化倾向。1957 年 4 月，波兰一批青年社会党人和农村青年组成了一个新的联盟，宣布他们不愿做“党和政府的被动执行者”，而是要本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精神”来恢复社会主义的设施。党基层组织的社会党倾向，促使重返政治舞台的哥穆尔卡在政治局成立专门委员会，迅速研究和解决具有重要意义的前波兰社会党活动家问题。哥穆尔卡的改革设想中也包含有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分。他提出：在当时的波兰，“最强有力的潮流是要求文明生活民主化，民主化的道路是通往我们的条件下建设最好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惟一道路”。民主化纲领中最重要的是“把议会的作用提高到国家权力中最高机构的作用。”这些举措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美国波兰问题专家杰万诺夫斯基指出：“波兰人支持哥穆尔卡是因为哥穆尔卡是他们惟一的希望。他们希望转向一种稍微接近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制度而不是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希望从苏联那里至少重新获得一点独立。”

1980 年，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具有民主社会主义倾向的基层组织之间加强了横向联合。这种横向联合最早从托伦市的托维莫尔工厂开始。10 月底，托维莫尔工厂党委第一书记兹·伊瓦诺夫联合托伦市其他几个大厂和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党组织，成立了“党组织协商委员会”。伊瓦诺夫明确声称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一直是社会主义者。基层组织之间的横向联合运动很快扩展到全国

各地，波及 12 个省。基层组织的民主社会主义倾向推动了整个党向社会民主党演变。随着改革的深化，大批具有民主社会主义倾向的人进入党和政府的核心部门，成为国家政策的制订者，其中包括 1981 年当选为部长会议副主席的拉科夫斯基，他被认为是党内“烂透了的自由派分子和社会民主党分子”。1987 年拉科夫斯基又成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直至作为最后一任党中央第一书记，把波兰统一工人党带上了民主社会主义之路，成为“波兰社会民主党之父”。他曾明确表示：“许多年来，我的目标就是使波兰统一工人党向社会民主党的方向进行深刻的改革，……我作为记者和政治家决不隐瞒这一点。”^①

1989 年 7 月，由华沙大学的党员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七八运动”，要求解散党，建立“社会民主党式的新党”。不久以后，托伦、彼得哥什等城市相继提出建立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主张。这意味着“党正处在解体状态，它已起来造了自己领导人的反”。^② 1989 年 9 月统一工人党十届十五中全会接受了这个建议，通过决议，决心从根本上改变波兰统一工人党，使它成为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左派党。1990 年 1 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终止党的活动，并把它改建成“类似西北欧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纲领”的“波兰式的党”，实现了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

在匈牙利，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起，前社会民主党右翼就积极复活社会民主党，提出恢复私有制纲领，认为，“社会民主党不只是小人物的党，而且是每个接受其纲领的人的党。党立足于私有制。”匈牙利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内也出现社会民主党组织。如厄特沃什·罗兰大学法学院成立的“社会主义组合”。卡达尔在巩固匈

①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拉科夫斯基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90 年 1 月 27 日）。

② [波]米·费·拉科夫斯基：《波兰剧变是怎样发生的》，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12 页。

匈牙利政权后，为“社会民主党人案”平反，并大胆启用前社会民主党人，如，前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涅尔什·雷热被委以重任，负责制定新经济政策和改革政策。80年代末，匈牙利党的领导权主要掌握在倾向于社会民主党的人手中，他们从上层直接推动匈牙利工人党的社会民主党化。1989年12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率先行动，通过民主社会主义纲领，改名匈牙利社会党。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也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传统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中是有生命力的。原社会民主党绝大多数党员拒绝参加共产党，他们作为一支客观存在的民主社会主义力量散居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之中，随时准备重建社会民主党。1968年5月，曾遭受残酷迫害的前社会民主党人以兹德内克·贝希内等5位社会民主党老干部为代表公开站出来，发表声明，宣布恢复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声明指出：“只有现在，在民主社会主义时期，才有可能恢复党的实际活动，并同长达90年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传统联系起来。恢复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并不是分裂劳动人民的力量，恰恰相反，而是发挥迄今为止一直靠边站的民主社会主义和热爱自由的群众的积极作用……”声明还提醒人们注意“这个历史事实，在欧洲，哪里社会民主党从政治生活中消失，哪里就不再有公民自由权利和民主……”恢复社会民主党的声明，在原社会民主党党员、工人群众和青年大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短短几周内，在布拉格、布林和其他城市里出现了54个社会民主党地区委员会，建立了近500个工人和大学生组织。

在捷共党内潜伏的社会民主党思想对党也一直存在着影响。用前中央委员阿尔弗雷德·米尔尼的话说，他们是一个“未来党”，作为影子，一直对社会有重要的潜在影响。捷共前中央书记杜布切克提出的“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观念和“捷共行动纲领”中有不少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比如全人类价值占优先地位，考虑民族特点和国家的民主传统，政治观点和政治派别必须多元化，用以捷共为首的各种社会主义力量的广泛联合取代绝对的政治垄断等思想。

1989年初，杜布切克积极领导成立了“社会主义复兴俱乐部”，发动民众示威游行，呼吁社会最大限度地促使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民主社会主义势力的发展。不久以后，捷克党内出现了“共产党人民论坛”派，加速了捷共的社会民主党化进程。该派部分成员脱离捷共另建新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论坛。留在捷共内部的“共产党人民论坛”主要致力于党的“现代化”，尽量使党抛弃苏联模式。1989年1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实现了社会民主党化。

东欧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后，党的指导思想、性质、组织原则和政策主张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放弃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惟一的指导思想，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自由、平等、社会公正和民主等基本价值，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党的奋斗目标。

剧变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东欧各国共产党的惟一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东欧各国共产党在党章中都对此作了明确规定。1981年通过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章程》中规定：“波兰统一工人党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根据波兰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具体条件的要求，贯彻该理论的原则。”《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党章》中也规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共产党，在其行动中以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指导思想。”《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章程》中规定：“党以她的政策和日常组织活动的基础——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决反对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切表现 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保加利亚共产党章程》中也作了类似的规定：“保加利亚共产党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始终不渝地以马列主义学说和依据该学说而制定的社会主义纲领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在东欧发生剧变后，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几乎都倒向民主社会主义，接受社会民主党信奉的自由、平等、社会公正和民主等基本价

值，而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的政党采取公开否定的态度。如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认为：“波兰统一工人党所坚持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其实质就是，起码在投资和国民收入分配领域内全部或部分的计划取代调节经济的市场机制。这一思想总的看来是一种空想。”抛弃政治民主是共产党人的主要弱点，其理论根源产生于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这种主张实际上意味着一党专政，这必然产生寡头政治或干部专权。”《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宣言》公开宣称：“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致力于实现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它把社会公正、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平等、劳动人民的团结一致看作是最高价值。……党愿意同所有接受人道主义和民主思想的人合作。”

匈牙利社会党和保加利亚社会党虽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但是也主张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兼收并蓄。《匈牙利社会党纲领》规定：“党坚决维护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连斯大林主义也未曾使它削弱吸引力的那些思想和价值，如扩大人的自由，实现自下而上地反映出来的社会公共意志，自治，真正的集体化，社会的团结、公正、机会均等和社会福利保障。”党的精神源泉是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但党对一切新的有科学根据的思想开放。”在党的《基本章程》中，匈牙利社会党明确表示：“党的目标是民主社会主义，党是毫无保留地接受人类发展普遍价值，即人道主义、自由和民主，并具有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政治组织。”匈牙利社会党把自己视为国际工人运动和欧洲左派的有机部分。希望同致力于改革的中欧和东欧的左派党以及同世界各国改革的共产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保持紧密和有机的联系。”可见，匈牙利社会党虽然仍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党的理论源泉，但同时毫无保留地吸纳了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并且“希望通过和平的人民民主途径，在保持社会和经济运行能力的同时，达到民主社会主义。”

保加利亚社会党也明确表示：“党的思想理论革新应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进行。党现在是并且将来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它受

到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所创造的一切非暂时性珍贵之物的鼓舞，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伟大思想和事业的鼓舞。”但是，同时，保社会党又表示要从“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及其他进步的政党和运动的丰富经验中吸取精神营养”，党的目标和直接任务是建设民主的社会主义。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同时，还需要广阔的精神境界并吸收和利用全人类的价值以及全世界的文化。”从保加利亚社会党的《纲领》和《章程》可以看出，党在指导思想上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搞折中，但是党的奋斗目标却是民主社会主义，而不再提共产主义。同样，保留了原来名称的捷克共产党也没有公开抛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它只是提出“明确而断然地同党和社会的斯大林主义模式决裂，抛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赞成创造性的理论思想，放弃任何形式的思想教条，”但是党明确表示致力于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社会。

第二，在党的性质上，不再强调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把党定位为全民党、群众党，面向所有阶级和社会阶层。

东欧各国共产党在剧变前都强调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波兰统一工人党章程规定：“波兰统一工人党是共产主义者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领导劳动人民，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党章中强调：“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久经考验的战斗先锋队，是思想一致的共产党人联盟。”保加利亚共产党党章则规定：“保加利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是由工人阶级、农业劳动者和人民知识分子当中最有觉悟的分子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

而演变后的各国党都抹杀自己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强调自己是社会民主党性质的、承认并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新型议会党；是一个跻身于欧洲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之列的欧洲左派党，向所有赞成党的纲领的人们开放。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在谈到党的性质和阶级基础时说：“波党尊重依靠自己的双手和智力劳动为生的人的愿望和要求。党将团结一切赞成党纲的人们，不管其

世界观如何。”匈牙利社会党宣布：党已从国家党变为现代左派社会主义运动，变为由党员监督的政治性的群众党，它向匈牙利所有民主的、进步的力量开放。保加利亚党在阐述党的社会成分时指出：“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党。我们的党维护创造物质财富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同样也维护在社会生产中日益进入前列地位的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分子的利益，维护文化艺术创作者和整个人文知识分子的利益。”可见，东欧社会民主党虽然仍把工人阶级当作可依靠的力量，但不再把自己定性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是在把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的同时，向所有阶级和社会阶层开放，注重党的普遍性和群众性，抹杀了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

第三，在组织原则上，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实行民主一致原则，党内允许不同思潮和派别存在，不干涉党员的信仰、言论和行动自由。

民主集中制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组织原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类型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先锋队、战斗堡垒，就在于它是一支有纪律、组织严密的队伍。放弃民主集中制原则，就等于把党变成一个松散的、没有权威的辩论俱乐部。破坏了党的统一和团结。剧变前，东欧各国共产党都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基本组织原则。波兰统一工人党党章规定：“波兰统一工人党及其党员、党组织、党委、监察检查委员会及执行机构在自己的活动中遵循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党内生活的首要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活动中不可分割地遵守集中和民主，这是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团结和行动的统统一不可缺少的条件。”捷共则规定：“党的组织建设和活动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把党的统一行动、党的牢固的组织建设以及党的严明纪律同最广泛的党内民主和共产党员的首创精神统一在一起。”德国统一社会党党章也规定：“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建设和党活动的基本原则。”

社会民主党化后的东欧共产党不仅改变了党的性质，而且抛弃

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片面强调扩大党内民主，甚至允许派别活动的存在。波兰社会民主党就明确表示：“我们支持思想上和政治上探索的自由，支持自上而下的创新精神。在我们的队伍中，观点和要求的分歧可以通过组织不同的论坛或纲领性派别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党也放宽了入党的条件，向一切承认党的纲领、具有民主的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敞开大门，凡拥护党纲者不管其世界观如何，都可入党。匈牙利社会党纲领声明也宣称：新的社会党是“民主的党，党员的党，它（放弃民主集中制，但保持其活动能力和行动统一）在自己的内部建制和组织中也实行民主的原则；实行自愿组织的原则、建设性地讨论问题的原则和建立派别自由的原则。”1989年10月9日通过的《匈牙利社会党章程》则更加明确表示允许党内派别活动的存在。章程规定：“党员有信仰、表达意见和行动的自由，它包括自由结社、组织团体和采取联合政治行动的自由。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各种观点、意见和派别持容忍态度。”党内公开活动的各个派别有权在选举代表和代表制领导机构的过程中按他们支持者的比例拥有代表。”

捷共也对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了批判和摒弃。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当前，党内民主的现行原则民主集中制，渐渐地官僚化了，变成了一种机械的方法，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跌落到了时代的后面。因此，今天党的建设的首要原则，就是要实现广泛的党内民主，要允许党内各种不同的观点派别的存在，党的领导政策，永远只能由全国代表大会或全国代表会议确定，同时确认党内一些派别的观点和地位。”保共也提出必须清除在党内生活准则和组织原则中扭曲的现象，重新研究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因为这一原则已“不适合现代的民主目标和已形成的党的全民性面貌。”只有抛弃了民主集中制，才能够顺利拆除党的等级命令制的组织结构。“党在广泛的民主性和多元化的基础上开展自己的活动，在党纲和党章的范围内，在维护党的组织统一的情况下，有自行组织为思想流派、倡议、行动纲领及联合组织的自由；各种思想流派应在由选举产生

的党的机构中得到公正的反映；党员不能因参加党内的各种行动纲领、流派和团体而受到处罚。”

第四，从执政的共产党演变而来的社会民主党提出了许多新的政策主张。

在政治上，各党都主张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制和三权分立原则。各党普遍认为，应实行多元化的、真正起作用的多党制，并制定和通过使所有政党、社会组织和其他民主团体都能独立提出候选人的新选举制度；党在议会民主的范围内同其他的政治力量进行竞争和平共处；鼓励政治反对派的存在，主张各种政治势力要相互尊重、平等对话；主张地方管理机关高度自治，积极发展公民社会，尊重人权和公民权，建立一个能保证法律的至高无上地位和公民自由的法制国家；主张民族团结和民族协商一致；实行政教分离原则。

在经济上，主张从本国经济社会条件出发，推行渐进改革，以保障人民的生活需要；反对全盘私有化的激进改革措施，主张各种所有制形式都应在面向社会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平等地拥有一席之地，通过自由竞争显示自己的优越性；但强调对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经济部门和基本自然资源实行国有制，反对出卖和侵吞国家财产，反对使人民的财产落入私人手中，抵制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既不赞成现实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又反对全面移植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主张把市场原则同社会公正、社会保护原则结合起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保劳动人民广泛参与经济决策，其中包括工资基金、报酬和利润的分配；支持农业的发展，赞同缩小城乡之间劳动和生活条件的差距；同意经济向外国资本开放，但这种开放不能破坏本国的经济和政治主权，反对向外国人出售国家财产和土地。

在对外关系上，把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放在突出的地位，反对外来干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的统一；主张国与国之间放弃相互控制和使用武力，赞成裁军和扩大信任；承认一切民族都有在

不侵犯伙伴的权利和利益的条件下的自决权；主张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互利和加强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倡导睦邻政策和区域合作，在谅解、合作、相互尊重各自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同邻国的关系；支持建设欧洲共同大厦，同欧洲各国进行积极合作，重视参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谋求早日回归欧洲；主张同致力于民主和公正解决全球问题、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一切左派团体发展合作关系，继续发展同社会党国际的合作。

在社会政策上，尽量保护充分和合理的就业，反对把失业、通货膨胀和社会生存环境的破坏看作是经济机制中的一个固有因素；反对两极分化，在公平分配时必须注意照顾所有的残疾人；保证在一切社会生活领域男女平等；保证每个人普遍享受文化和教育的权利；坚决改善生活环境，联合所有的社会力量制定和实现有效的生态政策；改善卫生机构的条件，增加国家对卫生事业的拨款。

东欧社会民主党一直是东欧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源远流长。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强行把社会民主党并入共产党内部，实现组织上的合并，根本无法消除两党之间的分歧与冲突，更不用说实现思想上的融合。社会民主党之所以接受被“吞噬”的命运，主要是迫于形势，并不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以及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两党合并后，民主社会主义派别和思潮不仅在共产党外部时有涌现，甚至渗透到共产党内部，最终使共产党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替代选择。

三、民族和宗教因素的推波助澜

民族和宗教对世界的影响力向来是不能低估的。在东欧各国，民族和宗教矛盾一直都很复杂。战后的社会主义时期，并没有使民族之间的敌对和宗教矛盾得以缓解。随着东欧局势出现动荡，民族与宗教矛盾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推动了东欧共产党的垮台和社会主

义制度的瓦解。

（一）盘根错节的民族矛盾与东欧共产党的垮台

欧洲列强长期以来对东欧的争夺和占领给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蒙上了阴影。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和二战后的苏美出于自身利益对东欧国家边界的划分，造成了绝大多数国家内部民族杂居的局面，各民族间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与不同领土要求相结合，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在整个共产党执政时期，苏联与东欧各国之间的矛盾、东欧各国主体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国家内部各民族之间的矛盾贯穿始终。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的要求成为推动东欧剧变的重要动力。

在东欧各国 40 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东欧共产党以及东欧国家都是处于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乃至霸权主义的控制之下，其民族利益不得不服从于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实际上的苏联利益，甚至国家主权也得不到保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东欧各民族对这种不平等状态的不满，促使它们走上了摆脱苏联控制，彻底否定苏联模式，乃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

东欧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对于苏联的安全至关重要。因此，自二战结束前，苏联就开始了在控制东欧方面的动作。1944年4月苏军打进罗马尼亚后，苏联与英国就在巴尔干半岛划分苏和西方的利益达成了秘密协议；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就波兰问题与美国和英国针锋相对，坚持以1944年7月在卢布林成立的临时政府为基础建立波兰战后政权，并于这年4月与波兰临时政府签订了为期20年的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雅尔塔会议后，苏联马上派副外长维辛斯基到罗马尼亚，逼迫罗国王任命苏联看好的民族民主阵线政府；1945年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后，7—8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国波茨坦举行会议，苏联在德国的共管中分得了一杯羹，并力争在东欧国家建立亲苏政府；9月在伦敦召开的苏

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上，美英试图以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签署和约要挟后者进行自由选举，苏联对此毫不妥协，直到 3 个月后三国外长再次在莫斯科会晤，苏联才勉强同意在罗、保两国政府中增加些许反对派成员。斯大林说：“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由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都将是反苏的 我们不能容许。”

伴随着苏美关系的破裂和冷战的爆发，苏联进一步加强了对东欧的监控。1947 年 9 月，苏联发起建立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9 年 1 月和 1955 年 5 月，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组织先后宣告成立。借助这些组织和机构，苏联开始在东欧进行政治清洗，推行苏联模式，并以其利益规范东欧各国的行动，对东欧国家出现的独立自主倾向，轻则批评、干预，重则武力相向，与东欧各民族的矛盾日渐加深。

南斯拉夫与苏联的矛盾在二战期间就初露端倪，碍于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同盟关系，苏联对铁托为首的南共产党领导游击队抗击法西斯和建立临时政府的行动没有给予足够的援助，再加上战争后期苏军在南的表现恶劣，致使南共颇有怨言。战后，苏联为了避免与实力强大的美国直接对抗，为了争取时间搞国内建设，没有全力支持南斯拉夫对与其交界的里亚斯特和与奥地利交界的卡林西亚等地的领土要求，并试图组建能够控制南经济的联合公司和苏南银行，这些做法以及南的抵制更加剧了双方关系的紧张。1948 年 1 月，保共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访问罗马尼亚时，重提南 1944 年 11 月提出的建立南保联邦的问题，苏联把这样一个包括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巴尔干国家的联邦看成是对它在东欧的权威的挑战，遂操纵情报局，掀起了对南的讨伐，南苏矛盾白热化了。

波兰与苏联的对抗由来已久。18 世纪俄罗斯曾三次瓜分波兰，统治波兰长达 150 年之久，1918 年 11 月，波兰复国后，发动了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1938 年，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共产国际以波兰共产党内部混进了间谍和特务为由，处决了一些波

共领导人，解散了波共；1939年9月，苏联借德国入侵波兰之机，进驻波兰东部地区。二战后波苏边界的变动，卡廷悬案的疑云，苏联授意搞掉坚持独立自主的哥穆尔卡，并派在波兰出生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到波兰担任国防部长的做法，以及波苏贸易中的不平等现象，使得波苏间旧恨未消，又添新仇。1956年波兹南的示威者喊出了“俄国佬滚出去！”的口号，10月会议上波苏险些兵戎相见，1968年反俄诗剧《先人祭》轰动一时，反苏情绪随之高涨。

匈牙利与苏联的关系因苏对匈国内事务的一再干预而受损，匈共领导人库恩·贝拉和匈内务部长拉伊克都成了苏联政策的牺牲品。前者在苏联肃反中惨遭杀害，后者在东欧的政治清洗中被处决。而苏联扶持的拉科西则把匈牙利搞得一团糟，经济建设一蹶不振，冤假错案层出不穷，更令民众不满的是，拉科西对苏联亦步亦趋，甚至军服都要模仿苏联。1953年3月斯大林病逝后，为与国内反对个人崇拜的浪潮相适应，苏联开始要求东欧国家共产党检查自己的政策。6月，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把匈高层人物召到莫斯科，批评他们的错误政策，并做了相应的人事调整，这才有了纳吉·伊姆雷的复出。复出后的纳吉与拉科西分歧严重，在拉科西的屡次控告下，配合苏联政策的转向，纳吉再度被冷落，其党籍和党内外一切职务被剥夺。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重新唤起了匈社会对惩办拉科西、恢复纳吉职务的呼声，在此情况下，苏共领导人继续插手匈党内部事务，敦促拉科西下台，建议恢复纳吉的党籍，但局势并未因此平静，拉伊克等四位前党和国家领导人遗骸的安葬仪式更激起了人们对苏联模式、苏联控制的愤恨，10月底，哥穆尔卡在波兰的复出引发了社会上压抑已久的反苏情绪，匈牙利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不得不求助于苏联出兵才平息了事态，匈苏关系的疙瘩越结越深。

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的对抗因1968年8月苏联带头的五国出兵而达到了高潮。1968年4月，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开始对苏联模式提出大胆的挑战。苏联认

为捷偏离了苏政策的航道，损害了苏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因此，从捷改革伊始，苏联就利用各种手段，对捷内政滥加干涉，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攻击捷共领导人，与波、匈、保、民德领导人频繁开会，提出对捷实行经济制裁和军事干预，并与捷领导人多次会晤，对捷施加压力，同时，苏国防部长和华约总司令访捷，华约军队在波、捷边境多次举行军事演习。面对压不服的捷克斯洛伐克，苏纠集波、匈、保、民德五国悍然入侵，把杜布切克等捷共领导人挟持到莫斯科，名噪一时的“布拉格之春”被扼杀在襁褓之中。苏联等国军队的入侵激发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苏的民族情绪，反对苏军占领的罢工、示威和游行一浪高过一浪，1969年1月，捷查理大学学生帕拉赫为抗议苏军侵略自焚而死，数十万人为其送葬，3月，捷冰球队在世界冰球锦标赛中战胜苏联队，数十万人走上街头，参加了反苏游行。

罗马尼亚与苏联间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领土归属之争使双方心存芥蒂。十月革命后，苏俄曾允许比萨拉比亚这一沙俄在100多年前占领的地区自治，1918年4月，比萨拉比亚与罗合并。但在1939年8月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德国重又承认了苏在比萨拉比亚的权益，1940年6月，苏联以罗政策威胁其西南边界的安全为借口，迫使罗马尼亚人撤离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为此，罗于一年后与苏作战，同德军一起占领了这两个地区。二战后，根据苏罗于1949年11月签署的条约，苏联再次把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占为己有。赫鲁晓夫上台后，罗苏间的矛盾超出了领土之争的范围，罗对苏反个人崇拜政策存有异议，对苏倡导的经互会各国国民经济计划的配合、国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持不同立场，开始寻求国家的自主与独立。1960年，苏联不满于罗在经济上“单干”，阻碍“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的做法，罗苏双方展开舌战。此后，罗采取了诸如撤换亲苏干部、取消俄语学院和俄文书店等一系列措施抵制苏联的影响；在中苏论战中，罗也没有应和苏的反华论调，而是于1964年4月中央全会后发表了《罗工人党关

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问题立场的声明》，表明了抵制苏共干涉别国内政的立场，罗苏关系日渐冷淡。之后罗马尼亚和苏联领导层变动（齐奥塞斯库取代乔治乌-德治，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鲁晓夫）也没有减轻两国的敌意。齐奥塞斯库的民族主义情绪在1965—1968年间变得更加激烈，他不断提到罗对比萨拉比亚的历史权利，这越来越引起了勃列日涅夫的不满。不仅如此，罗还在外交政策上与苏联保持距离。1967年6月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罗没有追随苏联与以色列断交，并同联邦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68年8月，它谴责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动员全国人民保卫祖国；1969年8月，它不顾苏联的反对，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罗，推动了罗美关系的发展；1979年1月，它谴责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它主张所有外国武装力量从阿撤军，也没有同苏一道抵制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阿尔巴尼亚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在二战后的40年代和50年代达到了顶峰，尽管当时的阿尔巴尼亚也曾为苏联对它的轻视而黯然神伤，也曾对反个人崇拜等政策心存疑虑。但进入60年代后，阿苏关系由于阿反对苏共对中共的指控而急转直下，苏联撕毁了与阿的所有协定，撤走了所有援阿专家，断绝了与阿的一切联系，1961年12月，阿苏双方召回了各自的大使，两国关系已经无法挽回。

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矛盾遗患无穷。苏南冲突的爆发使苏联为清除铁托独立倾向对其他东欧国家的带动作用，加大了在东欧进行政治清洗的力度，结果更激化了东欧各民族与苏联的对抗。苏联对波匈捷三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伤害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民族自尊，对苏联的怨恨和对苏联模式的不满最终化为对东欧执政的共产党的反抗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罗马尼亚对外政策上摆脱苏联控制，坚持独立自主的成就掩盖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个人崇拜也因而得以滋生。阿尔巴尼亚与苏联的彻底决裂更是使其在“反帝反修”的口号下，把苏联模式发展到了极端。

不仅如此，苏联对东欧的政策还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某些东欧国家主体民族间、甚至一国内部的民族纠纷。素有“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地区民族矛盾错综复杂，二战后，建立南、罗和阿联邦以及南阿合并计划因苏联的反对而流产，虽无法断言这样的联合一定有利于缓和民族纷争，但其后形成的保苏、南罗和阿尔巴尼亚三足鼎立的局面无疑埋下了巴尔干地区民族冲突的祸根；1948年的“情报局事件”中，苏联胁迫匈、波、保、罗、捷各国对南进行政治围攻和经济封锁，并在匈、保、阿等国大揪“铁托分子”，南斯拉夫与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一度恶化；1956年“波兹南事件”中，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波兰，1968年，苏联联合波、匈、保、民德军队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引起捷的强烈抗议，此外，苏联对捷内政的干涉还加剧了捷国内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间的矛盾，由于以捷克族为主力的改革派被镇压，斯洛伐克族领袖胡萨克当政，斯族在党政部门一直占据优势地位，控制着党和国家的命脉，这使得捷克族深为不满。

当然，不可否认，二战后一些东欧国家在实现民族平等、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和科教文卫事业方面多有进展的同时，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存在着失误，这也是导致东欧内部民族矛盾丛生并逐步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捷克斯洛伐克，尽管“从战争之初，西方和苏联就同意，胜利后将恢复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并且事实也是如此”而且在1945年4月捷民族战线政府通过的科希策纲领中，“政府保证新国家将建立在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完全平等的基础之上”，但是“直到1968年有关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联邦国家的法律通过，每个民族才有了自己的政府、议会和國家的所有行政部门。”在罗马尼亚，从20世纪70年代起推行的农村规范化政策不仅引起了国内少数民族的抵触情绪和大量出走，而且加剧了罗南、罗匈间关系的紧张。在保加利亚，日夫科夫实施民族同化政策，不承认境内土耳其族的存在，强迫它们更改穆斯林姓名，取消个人身份证上的族别登记，撤掉学校的土耳其语课程和电台的土语节目，

禁止土族的传统风俗和宗教礼仪，致使土族人怨声载道。在南斯拉夫联邦，不平衡的地区发展，连同相应的文化分歧，给民族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不恰当的政策措施更是火上浇油，民族纠纷不断，1967年9月克罗地亚语地位之争，1968年11月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因悬挂阿尔巴尼亚旗帜而引发的游行，1969年8月斯洛文尼亚总理反对联邦政府的“公路事件”，1969年底克罗地亚共盟开展的反对一元主义的斗争，1971年11月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骚乱，1981年3月由科索沃普里什蒂纳大学发起的要求成立科索沃共和国，与阿尔巴尼亚合并的示威和罢工等使得南斯拉夫联邦各民族间的冲突日趋尖锐，科索沃频发的动荡还给南阿关系造成了难以弥合的裂痕。

东欧内部的民族矛盾给西方国家干预东欧内政，颠覆共产党执政地位提供了机会。比如，1989年5月，保加利亚警方与聚居在其北部的穆斯林发生流血冲突，西方国家乘机提出强烈抗议，攻击保政府。8月，保武装部队与居住在其东南部的穆斯林的冲突再起，西方国家随即掀起了谴责保加利亚的浪潮。美国召回了其驻保大使，国务卿贝克还在纽约秘密会见了保外交部长姆拉德诺夫，以强硬的措辞表明这样的立场：美需要看到保的人权状况，特别是关于土耳其族的人权状况得到改善。再如，在罗马尼亚警察和军队与蒂米什瓦拉市的示威者爆发激战后，欧洲议会发表声明，要求齐奥塞斯库下台。欧共体冻结了与罗的长期贸易协定，停止了与罗的一切高级接触，其成员国还纷纷召回了驻罗大使，以示抗议。

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东矛盾和东欧内部各民族的纷争在长时间的积聚之后，再也无法遏制，在一些国家以迅猛之势爆发出来，动摇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1988年8月起，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对派抓住民众把共产党、社会主义与苏联控制相提并论的心理，借苏联出兵20周年、捷独立70周年和帕拉赫自焚20周年的契机，举行游行示威等抗议活动，喊出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口号；1989年4、5月间，保加利亚土族人聚居区不断爆发示威游行，挑战日

夫科夫政权。5月底，给予保公民双重国籍并允许其自由出入国境的新国籍法和护照法通过后，仅在土耳其关闭边界前的不到3个月时间里，就有30多万土族人离开或被驱赶出保加利亚，大量的移民引起了全世界对保人权记录的关注，动摇了已经摇摇欲坠的经济，由此开启了保加利亚剧变的进程；1989年12月，罗马尼亚蒂米什瓦拉市匈牙利族神父拉斯洛·托克什因反对齐奥塞斯库的农村规范化计划被驱逐，该市市民发起抗议活动，罗局势迅遭恶化，蒂米什瓦拉事件成了罗政局演变的导火线。

与上述三国相比，南斯拉夫联邦境内塞尔维亚族、斯洛文尼亚族、马其顿族、克罗地亚族、黑山族以及波黑波什尼亚克族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在造成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的同时，更导致了国家解体乃至流血战争，正如《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一书中所写：“虽然南斯拉夫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也存在着诸如经济停滞、外债增加、风气衰败、意识形态体系崩溃等问题，但真正导致这个国家解体的原因却是民族冲突。其他几个东欧国家虽然也存在着民族问题，但与南斯拉夫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①

（二）宗教势力与东欧共产党的垮台

在东欧剧变过程中，宗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推动着东欧的政治进程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东欧共产党在获取政权后，一直都没有处理好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没有达到既保障宗教自由，又使宗教不干预政治的目的。政府先是对宗教采取压制的政策，后又任其发展，使其演变成反政府的力量，推动了东欧共产党的垮台。

东欧国家的宗教传统一直比较深厚。早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便传入阿尔巴尼亚。7—10世纪，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保加利

〔英〕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页。

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先后接受了基督教，布拉格成为中欧基督教发展中心。9世纪，拜占庭基督教成为保加利亚的国教，13世纪，天主教在波兰获得国教的地位，17世纪，捷克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起义失败后，天主教被宣布是惟一的国教。同时，自14世纪以来，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侵入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波黑和马其顿等地，伊斯兰教得以传播，逐渐成为阿尔巴尼亚和波黑地区的主要宗教。

二战胜利初期，在新建立的人民民主国家里，只有阿尔巴尼亚公开宣布不承认任何宗教，并禁止建立具有宗教性质的组织，也不允许进行宗教活动和宗教宣传。其他东欧国家大都制定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实行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宗教政策，但是，在实践中，这些政策并没有得到贯彻，相反，宗教力量受到不同程度的禁锢与打击。1949年起，波兰当局发起了反对宗教“反对分子”的运动，通过法令没收了2000多家医院、保育院、孤儿院等教会慈善机构，规定如果教会禁止神职人员和教徒与政府合作，就构成犯罪，最严重者可判5年徒刑，结果数百名神甫被捕，其中6人以政治罪被处以死刑；1953年波兰政府逮捕了红衣大主教斯特凡·维辛斯基，缘由是他反对政府任命、调动和撤消神职人员及更动教会管辖权限的法令。捷克斯洛伐克也在1950年取缔了东仪天主教会。其他一些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府也没收了教会的财产，关闭了不少教堂和清真寺，与教会和教徒的关系十分紧张。

1956年波匈事件后，东欧各国共产党相继改变了宗教政策，缓和与宗教势力之间的关系。在波兰，维辛斯基被释放，几个天主教人士被选进议会，维辛斯基也表示支持政府建设人民波兰的政策，教堂得以兴建和重建，神职人员数量迅速增长；在匈牙利，政府与天主教会达成协议，天主教会保证忠于政权，政府则增加了宗教人士在政府机构和群众团体中的代表名额，准许教会出版报刊，并在一些普通小学开设宗教课程；在罗马尼亚，政府和东正教保持着合作关系，东正教支持政府的政策，政府准许教会进行宗教活

动；在捷克斯洛伐克，教会获准出版自己的报纸和其他出版物，东仪天主教会也于 1968 年得以恢复。另外，南斯拉夫、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开始与梵蒂冈的罗马教廷进行谈判，匈牙利的卡达尔和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还访问了梵蒂冈，以求实现与罗马教廷关系的正常化。

在宽松的宗教政策下，各国宗教势力增长迅速，其中尤以波兰最为突出。波兰的天主教会不仅保持了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而且借助其在民众中的巨大影响和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利用国内反对苏联控制的民族情绪和政治动荡、经济困难以及由此引发的信仰危机，逐步壮大力量，转化为民族独立事业的领头人和共产党政权的惟一合法的反对派。早在 1966 年 4 月，天主教会就在庆祝建教 1000 周年的宗教集会上宣布在波兰历史上可以没有元首和总理，但是人民不能没有神父。维辛斯基也称，教会必须影响国家生活各个方面。1976 年春，波兰政府修改宪法时，天主教会以侵犯波兰的国家主权为由，反对把与苏联结盟写入，反对在宪法中规定波兰统一工人党是波兰的领导力量。6 月，政府提高物价的决定引起工人罢工，许多工人被捕，天主教会发表文告，呼吁政府停止镇压，特赦被捕的工人，维辛斯基公开宣称，教会要干预政治。1978 年 10 月，克拉科夫教区大主教沃伊蒂瓦当选罗马教廷教皇，更名约翰·保罗二世，波兰天主教会的势力进一步得以加强。1970—1980 年的 10 年间，国家批准建造和扩建的宗教设施达 741 座。从 1980 年 9 月起，电台向全国转播华沙圣十字教堂的弥撒。1981—1982 年又发放了 635 份建造和扩建宗教设施的许可证。到 1983 年底，全国教堂、祈祷所的数目比战前增加了 1 倍多，神职人员也成倍增加，在军队中还设立了随军神父。

随着力量的壮大，天主教会在波兰政治发展中的分量不断增加。自 1980 年夏，工潮再起，团结工会诞生以后，天主教会在整个 80 年代扮演起政府与团结工会之间调节人的角色，其地位和作用也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对此，波兰政府前总理米·弗·拉科夫

斯基评论道：“教会扮演调停者的角色，使教会成了国家政治版图一个极为重要的、甚至可说是决定性的因素。”^①雅鲁泽尔斯基定期与大主教约瑟夫·格莱姆会晤，讨论政治形势，天主教主教团与政府代表成立了联合委员会，频繁召开会议，协商各种问题，天主教政治活动家奥兹多夫斯基还被议会任命为副总理，负责社会事务。即使在1981年12月至1983年7月的战时状态时期，教会的活动也没有受到限制，甚至电台仍然照常在每个周日向全国转播华沙圣十字教堂的弥撒。

虽然天主教会名义上是政府和团结工会的调解人，但实际上它是站在团结工会的一边，对政府持反对态度的。团结工会刚一成立，维辛斯基就公开表示支持。波兰实行战时状态期间，天主教会多次致函雅鲁泽尔斯基，发表《关于社会妥协问题提纲》和《关于社会经济问题的建议》，要求当局与团结工会对话，取消战时状态，恢复团结工会，并暗中支持团结工会的地下活动；战时状态结束后，天主教会更是利用宗教活动，煽动民众对当局的不满，力促团结工会合法化。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天主教会与团结工会一起影响着波兰政局的发展。

由此可见，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东欧都没有实现宗教与政治的分离，宗教对东欧政治的影响一直存在着。随着东欧局势日益紧张，对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威胁越来越大，宗教势力也越来越活跃，推动着东欧政局的变迁和共产党的垮台。这个时候的教会手中已经掌握有大量的资源，如组织、教堂、电台、报纸、杂志等，它们可以利用这些资源介入政治，在政局演变的关键时刻发挥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波兰面对1988年的罢工浪潮，天主教会呼吁政府保持克制，与社会有代表性的团体对话，以解决社会冲突。在教会的倡议

〔波兰〕米·弗·拉科夫斯基：《波兰剧变是怎样发生的》，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

下，8月底，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和政治局委员斯乔塞克与教会代表东布罗夫斯基和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就组织圆桌会议的前提和方式举行了会谈。1989年2~4月，圆桌会议召开，天主教会作为重要的一方参加了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团结工会取得了合法地位，波兰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后，天主教会，特别是其基层结构凭借其在民众中的广泛影响，在竞选中为团结工会摇旗呐喊，团结工会在6月的大选中获胜，教徒的支持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

在捷克斯洛伐克，天主教会在1989年以来的游行示威中公开站到反对派一边，抗议政府逮捕“七七宪章”领导人哈维尔及其他反对派组织成员，呼吁政府与示威者对话。

在罗马尼亚，在宗教团体中处于弱势的新教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向当权者发起了公开挑战。它提请关注新教徒遭到的迫害，强调新教在罗马尼亚社会中的关键作用，警告说：“如果面对着信仰的冲突，我们将必须首先把我们的忠诚献给上帝。”要求：“让新教的信仰者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把他们看成是拥有充分权利的公民，而不是简单地容忍他们。”声称：“基督教革命将满足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新教的影响开始扩大，到80年代末，其最大的一支已在全国1200多个教堂中发展了超过30万教徒。终于，在1989年12月，当局对蒂米什瓦拉的匈牙利族新教神父拉斯洛·托克什的驱逐点燃了罗马尼亚剧变的导火索。新教徒们积极参与了蒂米什瓦拉的示威游行，而且让他们感到欢欣鼓舞的是，尽管罗马尼亚的青年和民众接受了多年的无神论教育，但是宗教仍然对这些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教徒们把处死齐奥塞斯库夫妇当作是最好的圣诞节礼物。一些新教徒还被选进了救国阵线的地方委员会。

在保加利亚，日夫科夫的民族同化政策伤害了土耳其族人的伊斯兰教信仰，他们被迫更改穆斯林姓名，宗教活动也无法进行。1989年4~5月，在土耳其族人聚居地多次发生穆斯林与当局冲突事件，大批穆斯林在保加利亚边界开放后移居土耳其，宗教问题叠

加在民族纠纷之上，引起政局动荡，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南斯拉夫，民族与宗教矛盾更为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塞尔维亚族和马其顿族信奉东正教，阿尔巴尼亚族和波黑波什尼亚克族信奉伊斯兰教，克罗地亚族和斯洛文尼亚族信奉天主教，不同的宗教信仰激化了民族间的争斗，致使南斯拉夫的政治剧变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中。

在东欧共产党垮台的过程中，国家内部的宗教势力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国外的宗教势力也借机参与到东欧的政局演变中，其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有罗马教廷，它从两个方面推动了东欧政局的变化。

首先，罗马教廷拒绝从东欧各国政府建立的神父协会的成员中挑选主教，而是遵从教皇的意志，任命持反政府立场的主教，如南斯拉夫大主教库哈里奇一直批评南斯拉夫政府无神论的教育政策，并把自己看成是“同国家平行的一种社会力量和精神领袖”；捷克斯洛伐克大主教托马谢克致信捷总理什特劳加尔，要求彻底修改国家的宗教政策，教会与政府平起平坐，进行“对话”；波兰的格莱姆普任大主教后，天主教会成了大量政治活动的庇护所。

其次，教皇的访问也起着关键作用。在波兰，教皇一次又一次在“民主化”的关键时刻露面，这些访问的目的绝不仅仅是纯宗教性质的，而是带有明显的政治性。1979年教皇保罗二世对波兰的访问改变了人们对暴力镇压、失业失学等的恐惧心理，这次访问被看作是共产主义在东欧“终结的开始”。在那里，人们第一次团结起来，以格外和平和自我节制的方式，大规模和持续地反对共产党对国家的全面控制，这是1989年变革的标志和主要的国内催化剂，除了罗马尼亚之外，东欧其他国家的剧变都没有出现过激的暴力行为。1983年6月教皇第二次访问波兰期间，会见了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一家，结果教皇一离开波兰，斯琴霍瓦和克拉科夫就举行了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弗罗茨瓦夫、波兹南和华沙等地出现了反政府传单、标语和团结工会的旗子。1987年6月，教皇第三次访问

波兰，这次访问的政治色彩更为浓厚，他明确声称，团结工会运动是“当今世界反抗压迫和进行解放人类斗争的典范”，波兰教会“应该把团结工会的目标和策略接受为自己的目标和策略”；把争取人权和政治多元化的斗争放在首位”。可见，约翰·保罗二世对20世纪80年代的波兰变革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1990年捷克斯洛伐克政局动荡之时，教皇应刚上任不久的捷总统哈维尔的邀请，于4月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在这次访问中，教皇祝贺教徒和人民“夺取了自由”，说他来捷的目的是“鼓舞自己的兄弟”，祝福他们“在自由和民主的道路上更好地前进”。这些讲话促进了捷政局向“自由民主”方向的演变。对于教皇的作用，美国出版的《真正的战争》一书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教皇没有装甲师，但是他拥有的力量不是苏联的坦克所能粉碎得了的。”^①

四、不可忽视的外因

东欧各国地处东西大国之间的夹缝地带，一直是东西方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东欧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获取，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但没有使整个地区从大国的阴影中走出，反而使其更容易受到大国的影响。无论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还是社会主义大国苏联都想想方设法控制这片地区。因此，在探究东欧共产党垮台的原因时，不能不考虑西方大国和苏联的作用。

（一）西方的和平攻势

二战后，东欧被划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但是，随着冷战的全面爆发，为了遏制苏联的社会主义，分裂以苏为首的社会主义阵

安也致：《宗教对东欧政局的影响及其背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1年第4期。

营，美国加强了对东欧的渗透，鼓励东欧国家摆脱苏联控制，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西方国家就提出要用“和平方法”解放“铁幕内的卫星国”。波匈事件后，东欧各国更是成为西方国家演变的重点目标。美国总统肯尼迪认为，东欧的卫星国是苏联铁甲里面的“脆弱部分”，美国应通过援助、贸易等手段密切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以“培养自由的种子”。1985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抛出对外政策“新思维”，撤消对东欧的控制并鼓励东欧走“民主化”道路，使西方对东欧的促变活动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反复强调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和一切“有效的手段和方法”促成共产主义在 20 世纪结束前“彻底崩溃”，在 1999 年实现“不战而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种种手段对东欧国家展开了和平攻势，其中最重要的有：

第一，以经济援助或贸易为诱饵。

美国和西欧国家惯用的手法就是凭借它们的经济实力，把握有利的时机，以经济援助、贸易为诱饵，诱使东欧国家脱离苏联集团，接受西方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同时，经济援助也是西方国家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

1949 年苏南冲突愈演愈烈之际，美国向南斯拉夫提供了 2000 万美元的贷款。1950 年 11 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又向国会提交了“南斯拉夫紧急救济法案”，指出，帮助与苏联对抗的国家保持独立，是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的。这项法案的通过，实际上是使美国对东欧国家的经济援助合法化。之后，西方国家加大了对南斯拉夫的援助力度。1951 年春，美、英、法一起制订了一个三方援助方案，目的是弥补南斯拉夫下一年度的预算赤字；到 1955 年西方结束第一阶段大规模援助时，美国已经向南斯拉夫提供了共计 59850 万美元的经济援助以及 58850 万美元的军事援助，而只有经济援助中的 5500 万美元需要偿还。

20 世纪 60 年代，罗马尼亚开始走独立自主路线，于是，美国就加紧了在罗马尼亚的活动。美国高级官员频繁出访罗马尼亚，与

罗马尼亚签署了一系列经济贸易合作和文化交流协定，并给其以最惠国待遇，鼓励罗对苏联的独立性，扩大苏联集团内部的裂痕。进入 80 年代后，由于罗马尼亚固守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拒绝“民主化”，美国就不断指责罗不搞改革和违反人权，并于 1983 年和 1988 年两次中断了给罗的最惠国待遇。

美国等西方国家还十分重视东欧国家的改革动态，以经济援助鼓励东欧通过改革摆脱苏联模式乃至社会主义制度。针对波兹南事件后波兰开始的改革进程，美国给波兰提供了经济贷款、无偿援助和贸易最惠国待遇，开展了与波的文化交流。在 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后，美国向捷克斯洛伐克许诺吸收捷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联邦德国关系正常化等诸多优惠条件。

80 年代末期，东欧局势出现动荡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更是抓紧时机凭借其经济优势来颠覆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1988 年 10 月，美国副国务卿怀特黑德在他第六次出访东欧时兴奋地指出，东欧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处在重要的十字路口，西方应当共同努力，利用这个历史性的机会，为了欧洲各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推动东欧和平的、积极的变革。他还说，从根本上说，这些苏联集团国家的政权想从西方那里得到的是经济支持、贸易变革和政治上的承认。如果西方国家看到东欧各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取得了“真正的”进展，看到它们都比以前更明显地尊重本国公民的人权，西方就愿意给予帮助。

1989 年 7 月，布什在出访波、匈期间，向这两个国家提供了大约 1.5 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其中波兰为 1.15 亿美元，匈牙利为 0.35 亿美元。布什要求美国国会批准这项援助计划，以支持东欧国家“新的改革”¹³，促进和奖赏中国和苏联集团内政治多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在 1989 年 10 月匈牙利更改国名 3 天后，布什正式宣布给匈牙利最惠国待遇。有外电甚至评论说，共产党在波兰退位，在匈牙利也准备这样做，“至关重要是贸易和西方向共产党国家提供的与贸易有关的信贷及技术，以此作为使它们接受

民主方式的诱饵。^①此外，美国还制定了“小马歇尔计划”，欧洲共同体筹集了“欧洲发展基金”，给东欧以紧急援助。而且，西方国家主要根据东欧国家达到自由化改革的各种标准的能力向它们提供信贷，同它们发展贸易和合作，为改革提供具体的物质刺激。

美国等西方国家还向东欧国家的反对派提供了大量的物质帮助，处心积虑地扶持它们，力求把它们培养为各国共产党的有力的竞争对手。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向团结工会提供了大量援助，资助团结工会代表团遍访美、英、法、日、西德等30多个西方国家。1981—1983年波兰实行军管期间，西方国家企图以经济援助为诱饵迫使波兰政府让步，承认团结工会。1981年12月17日英国的《泰晤士报》宣称：“如果波兰释放被拘留者，并立即同团结工会举行谈判，那么西方就可以考虑向波兰提供执行改革计划所需要的大量援助。”^②1982年团结工会被取缔后，美国立即宣布暂时取消波兰已在美国享有22年之久的优惠贸易地位，暂停给波兰进口货物以关税优惠，西方其他国家也停止向波兰提供设备和原材料。波兰因西方的经济制裁而蒙受了1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在制裁波兰政府的同时，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向处于地下的团结工会提供了大量资金和宣传设备，并把198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瓦文萨、1987年的肯尼迪人权奖授予团结工会的另外两位领导人。

1989年4月，团结工会合法化后，美国总统布什宣布美将给予波兰10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4月18日，布什又呼吁国际金融机构和美盟国效法美国帮助波兰的“民主力量”，援助的条件是波兰进一步采取行动深入经济改革，而经济改革必须是建立在政治多元化的基础上。

《共产党世界“社会主义大厦”的崩溃》，载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9年9月5日。

柳静编著：《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料》，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页。

西方媒体也直言不讳地承认西方国家对团结工会的扶持。1989年8月27日的《华盛顿邮报》发表了题为《我们如何帮助团结工会取胜》的文章。文章中说：“没有美国工会在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持，他们（指波兰团结工会）有可能无法使波兰共产党旨在摧毁团结工会的努力归于失败。劳联—产联向团结工会提供的物质支持是急需的印刷机、滚筒油印机、电传机和其他只有用难以得到的西方货币才能买到的设备。……在1981年12月13日戒严令发布以后，（劳联—产联主席）柯克兰……立即下决心采取一切办法援助团结工会。美国工会提供的资金和来自全国维护民主基金会的数百万美元通过劳联—产联的自由工会协会送给了团结工会。”^①

对于其他国家的反对派，美国等西方国家也给予了大量的经济援助，美国国会拨款2500万美元给全国维护民主基金会，用来扶持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论坛、保加利亚的“生态公开性”等反对派组织。阿尔巴尼亚反对派民主党在1992年3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得到了美、德、意等西方国家物质和道义上的援助。后来当选为阿总统的民主党人贝里沙自己也说：“美国是（阿）推翻共产主义的决定因素。”

第二，通过新闻媒介进行舆论宣传。

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利用各种宣传媒介，向社会主义国家灌输西方的意识形态、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煽动反社会主义情绪。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中明确指出：“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失利，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外援和文化交流都将毫无意义。”^②艾森豪威尔在20世纪50年代也说过，在宣传上花1个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5个美元。而东

^①《我们是如何帮助团结工会获胜的》，载美国《华盛顿邮报》1989年8月27日。
^②〔美〕理查德·尼克松著：《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

欧各国又是西方国家进行思想文化渗透的重点目标。1960年1月17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了《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的第10号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东欧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与西方相近，又与西方毗邻，“一向是瞩目西方的，特别容易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主张“关注东欧”。^①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杜勒斯就提出了“解放铁幕内的卫星国家的三叉计划”，利用“美国之音”等宣传机器“挑起铁幕后面各国人民的抵抗情绪”。除了利用本土的“美国之音”外，美国于1950年和1951年又在西欧设立了两个专门面向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型广播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每周播音时间长达1097小时，向东欧国家介绍西方的成就、生活和价值观念，促进东欧的“言论自由”和“自由交流思想”。对于这种大规模文化渗透的目的，“美国之音”的一位副台长就曾毫不掩饰地说：“我们应当破坏苏联及其卫星国家的稳定，促进它们的人民和政府之间发生摩擦……我们要尽量在共产主义集团各国领导人之间打进楔子，使他们相互不满和相互猜疑，我们应当煽起民族主义的火焰，鼓励宗教感情的滋生”。

匈牙利事件爆发前，从1956年7月下旬起，“自由欧洲电台”和“美国之音”就进行蛊惑性宣传，鼓励匈牙利人民为了赢得民族独立，应当不惜一切代价。事件平息后，美国和西欧各国又在联合国一致谴责苏联出兵匈牙利，要求苏联撤军，要求联合国向匈牙利派驻观察员。

1980年团结工会一出现，“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美国之音”就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向波兰和苏联东欧地区广播波兰各地的罢工情况和团结工会领导人的讲话。联邦德国的德国广播电台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第10号研究报告《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1960年1月17日发表）。引自刘洪潮主编：《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策略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在波兰语节目中向罢工工人明确建议：“不要上街，要保护好运动的领导”；“不要提反对党和国家的口号”使运动保持在“文火之上”，“逐步加码和逐步动摇波兰的国家基础”。英国 BBC 也说：“只要什么地方发生罢工，团结工会就要利用它来向政府提出新的要求。这样一来，一切就像螺旋一样上升。”

1989 年东欧剧变中，西方媒体活动更加频繁，“美国之音”和西欧的电台连篇累牍地进行煽动宣传，而且把触角伸向东欧国内。“自由欧洲电台”在波兰和匈牙利设立了办事处；“美国之音”也在华沙设立分台。东欧在实行多元化后，舆论宣传失控，出现了许多由反对派组织控制的媒体。西方大众传播媒介伺机直接插手这些传播机构，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对它们进行操纵，影响这些媒体的政治方向。1989 年 12 月初，6 个国际新闻组织在巴黎制订了“援助东欧计划”向东欧国家已经建立或正在筹建的反对派新闻机构提供财政援助，受援对象包括波兰团结工会的《选举日报》、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的《人民报》。

第三，公开干预。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以经济援助操纵东欧国家的发展进程，通过舆论宣传大造声势，而且还在必要的时候直接出面插手东欧国家的事务，加速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和东欧共产党的垮台。

在 1948 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中，西方国家就曾通过使馆与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密切联系，共商对策。回国休假的美国驻捷大使斯坦哈德还特意提前结束假期，返回捷克斯洛伐克，力促捷克恢复过去的社会制度。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对东欧的直接干预也逐渐增多。1987 年 9 月，当时还是美国副总统的布什访问了波兰。在访问期间，布什表示了对团结工会的支持，他会见了瓦文萨等人并与其共进晚餐。布什说，应当让波兰人“更自由、更独立”，波兰当局应当“尊重建立独立自由自治组织的权利”。

1989年初，捷当局以“煽动罪和妨碍公务罪”判处“七七宪章”领导人哈维尔9个月徒刑，西方国家立即联合起来对捷发起攻击，以取消原定访问、召开大会和提抗议等方式对捷内政横加干涉，逼迫捷当局给哈维尔减刑。1989年7月，联邦德国外长根舍访捷时，还专门会见了获释不久的哈维尔。

同年，布什等美国政要相继出访波兰、匈牙利，制造舆论，企图用美国的价值观改造这两个国家。布什谈出访波匈的动机时说：“我们的任务是很明确的，修补旧的裂痕，实现几十年的梦想，出现一个安全、繁荣、和平与自由的新欧洲。”针对匈牙利开放奥匈边界，布什大加鼓励，他在匈牙利发表演说时说：“把匈牙利和奥地利隔开的带刺铁丝网在今年早些时候已经拆除，铁幕开始裂开，这还是头一次。你们伟大的国家匈牙利带了头。”英国《卫报》评论说：“布什总统对波兰的三天访问加剧了这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危机，并且为团结工会在政府里发挥作用提供了可能性。”^①

在1990年3月民主德国大选中，除由德国统一社会党演变而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外，其他各主要政党和竞选联盟的背后都有联邦德国政党的支持。联邦德国政党不仅向民主德国的联盟党提供了大量的金钱和物品，甚至派选举声援团亲赴现场，为自己的联盟党拉选票。

西方国家的一些显赫人物甚至直接抛头露面，参与东欧各国反对派的活动，并在选举中支持这些反对派。美国驻匈牙利大使直接走上街头参加反对派的示威游行。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亲临1989年波兰大选现场，为反对派拉选票，他还在团结工会的选举日报上发表讲话，说团结工会如果在选举中失败，就会产生不良后果。联邦德国总理科尔也曾6次前往民主德国，参加竞选集会，明确表示，如果德国联盟获胜，联邦德国就会大规模地援助民主德国，两德可望迅速实现货币联盟，民主德国公民的存款将以

① 《布什的访问加剧了波兰的政治危机》，载英国《卫报》1989年7月12日。

1 : 1 的比率兑换成联邦德国马克。

（二）苏联的“松绑”

与西方国家的长期渗透相比，苏联的政策变化虽只有短短的几年，但由于苏联在东欧的特殊地位，它对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变迁、共产党丧失政权的作用显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法国总统战略事务顾问沃特雷诺等人甚至认为，东欧剧变既不是西方颠覆的结果，也不是东部内部革命的结果，而主要是苏联改变政策的结果，如果苏联尚能用武力维持其东欧势力范围，那么在东欧什么也不会发生。这个看法虽有其片面性，但也指出了苏联政策的演变与东欧剧变之间的密切联系。正如 1989 年 11 月 25 日《日本经济新闻》在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纷纷下台后发表署名评论中所说的：“从背景来说，苏联促进东欧改革的意图发挥了很大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苏联和东欧受到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风暴的影响，波兰、匈牙利实行民主，取得了苏联的同意自不必说，就连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旧政府相继倒台，背后也有苏联的意图。”

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是美苏冷战的结果。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美关系走向缓和，放弃了对抗，在冷战时期对苏联有战略价值的东欧国家也就失去了其重要性，而这些国家日益落后的经济和它们对苏联的依赖，也变成了苏联沉重的负担。为了甩掉包袱，苏联不仅改变了对东欧国家的一贯政策，而且鼓励东欧国家进行变革。

1985 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后，提出“新的政治思维”。“新思维”承认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进程应该有所不同，无论是两党之间还是两国之间即使存在观点上的分歧，也应该相互尊重；不能对行动上不一致的国家或政党横加指责；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里，各政党之间没有上下级关系，也不存在指挥中心，每个政党都应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政策，进行平等对话；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成为真理的垄断者。因此，苏联同东欧国家之间的关

系应建立在“自由选择”、“绝对平等”和“互利合作”原则的基础上。

在“新思维”的指导下，苏联对东欧采取了新的政策，由过去的全面控制转变为让东欧国家自己选择发展道路。戈尔巴乔夫于1988年发出了让东欧走自己的路的信号。这一年的3月，戈尔巴乔夫在访问南斯拉夫时，“发誓抛弃以任何借口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做法”，表示“所有国家都有权选择它们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不久以后，他又在联合国大会上宣称“所有国家对它们自己道路的自由选择是不容许有例外的普遍原则。”^①这等于向东欧各国政府和反对团体传达了这样一个明确的信息：苏联不会采取行动来维持现有共产党单独掌握政权，相反苏联赞同采取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改革。

不以“老子党”自居，任由兄弟党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应该说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一大进步。但是，给东欧国家松绑，让它们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其后果却是诱发了这些国家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抛弃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由于东欧国家长期处于苏联的严密控制之下，并且遭遇了苏联模式带来的巨大危害，因此，对苏联控制苏联模式、甚至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已经积聚很深。戈尔巴乔夫放弃苏联原来对东欧的全部强制性原则，不但失去了苏联对东欧统治的基础，而且必然加速东欧抛弃社会主义的进程。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在大多数波兰人看来，共产主义是出卖独立给俄罗斯的同义词。对不同政见运动来说，从外部控制和压迫中解放出来也意味着波兰恢复其在西方社会中的正确位置。持不同政见者因而把国家独立等同于接受西方价值（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②

迈克尔·G. 罗斯金：《东欧的再生》 普伦蒂斯—豪尔公司 1991年英文版，第130页。

卡伦·达维莎、布鲁斯·帕罗特主编：《东中欧民主的巩固》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7年英文版，第72页。

更何况，苏联不仅给了东欧充分的自由，而且引导东欧国家进行“民主化”变革。戈尔巴乔夫在出访东欧或与东欧共产党领导人会晤中，竭力宣扬他所倡导的“新思维”和民主化、公开性，鼓吹“一个已经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革命和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国家目前正在发生革命的变革”。^① 戈尔巴乔夫的言论在东欧掀起了很大的波澜。而苏共提出的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更是契合了波、匈、捷等国国内涌动的要求取消共产党领导、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的暗流。当时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激进派”领导人伊姆雷·波日高伊就说过：“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与匈牙利的努力是一致的，并且为匈牙利采取行动创造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国内的“改革”刺激了东欧剧变的发生。

不仅如此，戈尔巴乔夫还对东欧的“民主化”进程表示支持和赞许。1989年2月，匈牙利正式决定实行多党制后，戈尔巴乔夫表示十分满意，认为是对苏联“民主化”进程的极大支持。3月，他对前往苏联访问的匈党总书记格罗斯表示，尽管苏联“不想把革新社会主义的构想强加于人，但朋友的支持将加强我们的信心与力量，”。

1989年2月，在波兰召开的圆桌会议上，波兰统一工人党同意波兰实行西方模式的议会民主制，允许团结工会在新议会中占有35%的议员席位。不久，苏联《新时代》刊物就刊登了对瓦文萨的采访，并引用瓦文萨的话说，团结工会是波兰的一支促进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力量。戈尔巴乔夫甚至还表示，可在适当的时候会见瓦文萨或团结工会其他代表。4月5日，波兰圆桌会议闭幕，政府承认了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苏联对波党不断地向反对派妥协，一步步

^①《在布拉格文化宫举行的捷苏友好大会上的讲话（1987年4月10日）》，《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年6月—1987年6月）》，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页。

地放弃执政地位的做法持肯定态度。4月底，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访苏，戈尔巴乔夫再次明确表示赞赏波兰的“民主化进程”。6月18日，波兰党在大选中失利，团结工会获胜。7月4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接受英国《卫报》记者采访时说，如果团结工会在波兰组成政府，苏联准备接受这一事态发展。

12月9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指出，1989年是以东欧出现重大变化而著称的一年，而东欧改革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实行民主化，进行社会主义革新。他赞扬东欧的改革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合乎规律的结果，是人们自己选择的结果。他还表示苏联积极支持东欧的变化，并从尊重人权、不干涉、承认选择自由的立场出发同所有东欧新政府建立国家关系。

苏联领导人对积极进行“民主化”改革的东欧国家大加赞许的同时，明确表示：“凡是主张保留原来由党控制的‘行政命令’制度的东欧国家领导人，苏联不再给予支持。”^①对于反对“民主化”改革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指责他们是“保守派”，向他们施加压力，督促他们尽快进行“改革”。例如，戈尔巴乔夫曾致函日夫科夫，敦促他要在保加利亚进行“改革”，否则，他将被生活所淘汰。苏联领导人还捎信给齐奥塞斯库，希望罗马尼亚开始“改革”进程。在罗马尼亚政局发生动荡、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反对齐奥塞斯库时，苏联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罗马尼亚人民的行动，称其为“正义事业”。罗马尼亚非共产党政府成立后，苏联是最早承认这个新政府的国家。1989年戈尔巴乔夫出访民主德国期间，告诫昂纳克说，不要误了革新的最后一列火车。在克伦茨取代昂纳克担任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后，苏联马上表示祝贺。1987年底，雅克什接替胡萨克出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后，由于他没有按照苏联的指示实行“改

〔英〕雷切尔·沃克：《震撼世界的六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怎样葬送了苏联》 改革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页。

革”也成为不受苏联欢迎的人物。在1989年底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局势难以控制时，捷当局曾准备利用军队的力量强行制止动荡。但是苏联警告捷领导人，不许动用武力以防干扰即将举行的苏美首脑马耳他会谈。

戈尔巴乔夫对东欧所采取的姿态，备受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赞许。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戈尔巴乔夫将“作为本世纪有创新精神的人物之一被载入史册”。^①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要是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勇气和远见，东欧的民主是不会蓬勃发展的，戈尔巴乔夫为欧洲的变革创造了条件，这种变革是我们过去不敢奢望的。……戈尔巴乔夫主席理应因席卷欧洲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而受到特别的赞许。”^②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一切机会，向东欧国家发动和平攻势，以达到使东欧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目的。当然，不能说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是被西方所动摇和颠覆的，但是西方的和平攻势至少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苏共在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后，在外交政策“新思维”的指导下，一改过去对东欧国家和共产党的严密控制，放手让东欧各国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并鼓励东欧共产党走“民主化”道路。就这样，西方的长期渗透和苏联政策变化的共同作用，加速了东欧共产党垮台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土崩瓦解的进程。

基辛格：《同一个新俄国打交道》，载美国《新闻周刊》1991年9月2日。
撒切尔夫人1990年12月30日发表的新年祝词。

第三章

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的终结

日本自民党成立于 1955 年 11 月 15 日，由日本政坛上的两个保守政党——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而成。这两个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前的政友会和民政党。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坛出现了政党林立、政局动荡的局面。随着美国由对日本实行“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转变为将其扶植为与社会主义抗衡的力量，日本各政治势力之间出现了组合和集结的势头。在 1955 年 2 月进行的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虽然保住了其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但所得票数远远低于半数，如果不同参加内阁的另一个保守党——自由党联合，就可能失去政权。在这种背景下，一直向自由党和民主党提供政治资金的财界为了确保保守党执政，竭力敦促两党实现合并。同年 5 月，自由党和民主党首脑举行了会谈，7 月，两党政策委员会制定并发表了《新党的使命》、《新党的性质》和《新党的政纲》。11 月 15 日，两党举行了联合大会，正式组成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

自民党的组织由中央和两层地方组织构成。党的最高机关是党代表大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党的中央常设机构包括总务会、政务调查会、两院议员总会、选举对策委员会等决策机关，以及党的干部会、组织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国民运动本部、国会对策委员会、财务委员会、纪律委员会等执行机关。自民党的最高领导是总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通过秘密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干事长、总务会长和政调会长由总裁任命。干事长辅佐总裁主持党的日常工作。

地方组织由以郡、市、町、村为单位设立的支部和以都、道、府、县为单位设立的联合支部组成。

自民党党员主要由国会议员、地方政治家和一般党员构成。其中，国会议员党员是党的核心。一般党员成分复杂，人数极不稳定，多为国会议员的后援会和友好团体的集体党员。根据党章规定，支部有权接纳党员。申请人党者由两名党员正式推荐，填写入党申请书，向党中央或居住地县支部提出申请并缴纳党费即可。但实际上，自民党的组织活动缺乏规范。自民党的地方组织极其松散，基层党员几乎不受任何党纪约束，事实上也不履行正式的入党或脱党手续，既无义务，也无权利。绝大多数党员不但不参加党组织活动，甚至连党费也不缴。例如 20 世纪 60 年代，自民党号称党徒 190 万人，但按期缴纳党费的党员只有 5 万人左右。这 5 万人“几乎都是国会议员和地方政治家，或者是 2600 多个党分部跑腿的人。”显然，自民党活动主要集中在中央一级。总裁和干事长、总务会长、政调会长三大干部才是掌握着自民党实权的人物。所以，有日本学者评价说，自民党是“国会议员的团体，是中央的组织”。就连自民党的领导人也曾这样讲：“我对党内外任何人都说，自民党简直不配称为一个政党。”总的说来，自民党是一个缺乏组织基础的党。

自民党自成立后就一直占据着日本的执政舞台。日本政坛上时常有新的政党涌现出来，并在大选中与自民党竞争执政权，但是它们的力量根本无法与自民党相抗衡。所以，长期以来，自民党被称为“万年执政党”，在野党被称做“万年在野党”，后者的存在不过是被用来衡量对前者的满意度。这种由自民党一直持续把持政权的体制被称为“一党优位制”。所谓“一党优位制”的含义就是：“长时期在得票和议席方面超过其他政党、占据优势地位的大党。”由此可见，可以被称为“一党优位制”的体制必须具备下列要素：首先，该体制必须是政党多元主义体制，即在处于优势地位的政党以外，还存在着其他政党，这些政党受到法律保护，可以通过选举与

优势政党竞争权力，也就是说，一党优位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多党并存并相互竞争；其次，就政权结构形态而言，优势政党在选举中能够获得绝对多数票（即赢得半数以上议席），从而单独执政或在联合政权中居于核心地位；最后，优势政党必须能够长期、连续执政；“长期”的期限一般要在 15 年以上。

自民党长期连续执政使日本社会避免了政局动荡，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且，自民党一党执政，也保持了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一贯性和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这对日本在短期内发展成为世界性经济强国起到了决定作用。在自民党指导下，日本创造了“日本模式”，国力空前强大，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行列。然而，在 1993 年 7 月举行的大选中，自民党在众议院未能取得半数以上的席位，只好将政权拱手交给由社会党、公明党、新生党、民社党、社民联、日本新党、先驱者党和参议院民主改革联盟七党一派组成的联合政府。8 月 6 日，日本新党代表细川护熙当选为第 79 任首相，8 月 9 日细川内阁正式诞生。这标志着自 1955 年起持续了 38 年之久的自民党一党单独执政的终结。一个创造了本国经济奇迹的执政党，缘何在选民面前遭到如此空前的惨败？综观自民党 38 年的执政历程，可以说，冰冻三尺，确非一日之寒。

一、源远流长的派阀政治，最终导致自民党的四分五裂

自民党内部派阀繁多，渊源已久，争斗甚深，这给该党造成了严重的“内伤”，最终发生了分裂。这是结束自民党一党执政历史并下野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派阀”是指在某一个集团内部形成的非正式的小集团。这些小集团形成的基点是它们在思想、出身、

利益、憎恶、对特定人物的忠诚心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点。它们会通过连续性的共同行为，试图对该集团的意识决定行使影响力。^① 自民党的派阀以国会议员为中心成立，而且这些议员们必须是有希望争取到总裁职位进而成为首相的人。党内的各派阀都是一个组织齐备的小集团，内设总务、资金、政策、宣传等部门。按惯例，各派阀每周定期召开一次所属议员出席的总会。每个派阀都会任命一个事务总长，由他负责派阀内部的总务，而且负责与其他派阀的协调工作。派阀政治是日本自由民主党的一大特色。虽然，在其他国家的政党内部，也经常会因为政见不同而出现不同的小集团，但这多是暂时的、相对的。一旦造成分歧的具体问题解决了，这些派别也就自然消失了。然而，自民党内部的派阀活动却十分持久。纵观日本自民党的历史，俨然是一部“派阀”的盛衰和聚散离合的历史，是一部无休止的“派阀”抗争的历史。

日本自民党内部派阀的产生深受其历史、政治运行方式和文化传统的影响。首先，派阀的产生有其深厚的历史原因。日本早年的政治史就充满了文武重臣、幕府藩臣组成的派阀之间的勾结与对立。明治维新后西方的政党政治出现在日本，但是，政党组织和政党政治的运作上都带有派阀的历史烙印。1955年11月，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成立自由民主党，但大体上，两党内部的系谱都没有根本的变动，新成立的自由民主党并没有将各派系的隔阂消除并将它们整合起来。据称，当时党内就保存了11个派阀，即旧自由党系统的吉田（茂）派、绪方（竹虎）派、大野（伴睦）派，旧民主党系统的鸠山（一郎）派、三木（武吉）派、岸（信介）派，以及旧改进党系统的三木（武夫）派、松村（谦三）派、大麻（唯男）派、芦田（均）派、北村（德太郎）派。这些派别规模大小不一，最小的也就是几个议员的松散结合，并且还有很多议员同时归属两

参见徐万胜著：《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个以上的派阀，而无所属议员则多达 80 名以上。^① 这些保留下来的派阀在党内相互抗衡竞争，这就构成了后来派阀繁衍的基础。

然而，促成自民党派系形成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开选举自民党总裁的制度的确立。战后初期，日本各保守党都延续战前的传统，由党内少数几个派阀的领袖预先协商决定总裁人选，然后再拿到党的大会上正式确认。自民党成立后，确立了总裁公选制度，由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和地方代表选举产生党的总裁，当时大约有 500 人左右有选举权。在这种制度下，派系就成了争夺本党的最高领导权，进而掌握政府权力的有效手段，于是，党内有实力的人物就开始培养各自的势力，组织派阀。再加上任何一派凭借自己的力量都很难完全掌握党内半数以上的选票，都必须争取其他派系的支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当选总裁。而且，分配党政官职的时候，也是按照派阀的大小来按比例分配。这样一来，派阀就是出任党政要职的有效途径。因此，党内的议员也都愿意团结在有实力的人周围形成派系。此外，想当首相的人首先必须得赢得自民党总裁的选举，他本身必须拥有相当有财力和人力的派阀，只有这样，他才有资本与其他派阀讨价还价。因此，组织派系是必要的手段之一。只有有了强大派阀的支持，才能当上总裁并成为首相，派阀也就因此产生了。

日本的政治运行机制也是派阀政治得以发展维持的重要原因。日本是议会民主制国家，以争取权力为最终目标的政党最关心的是能否在议会中取得多数议席，从而达到上台执政的目的。而政治家最关心的则是在选区中获胜当选议员。1996 年之前，众议院实行的是中选区选举制度。在这种选举制度下，一个选区选出 3—5 名议员，得相对多数票的候选人当选。这就出现了自民党在同一选区要同时提名多个候选人，同一选区中就出现了同一政党内的各候选

参见徐万胜著：《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6 页。

人之间相互竞争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自民党中央很难给其在所有选区的所有候选人提供同样的资金及后援支持。因此，每一个议员候选人要想在选举中获胜，就必须求助于各派阀领袖的支持与帮助，甚至新人的参选也要寻求新派阀后台的支持。同时，各派阀的领袖也希望本派阀内能产生更多议员，以此来增加本派的势力，在党内人事安排及政策制定中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取得有利地位。各派实力的增强必然带来自民党中央整体实力的提升，这当然也是自民党中央乐于见到的，自然也就得到自民党中央的支持与首肯。这种互利互惠的关系也帮助维系了派阀政治。

派阀政治的产生和发展也深受日本民族政治文化的影响。以部落为中心的观念深深地存在于日本人的意识之中，日本的政治也带有部落联合的特征。在日本社会中，个人埋在集团之中，同时个人对集团也十分依赖。不论是在政界，还是在财界，甚至学术界，凡是日本人所到之处，都有派阀的存在。在政党内部形成派阀，也是日本人这种民族性格的反映。在自民党派阀政治中，派阀的利益高于党员自身的利益，派阀成员必须服从于派阀领袖，这充分体现了集团高于个人，以及对权威服从的集团意识特征；派阀内成员相互协调，对外采取一致行动，体现了集团意识中内“和”而对外排斥的特点。作为派阀领袖要在资金分配、选举支持等方面“施恩”于本派成员，作为回报，下属要同领袖保持行动上的一致，这又体现了集团意识中传统的“恩主关系”、“亲子关系”的家族社会和纵式社会结构的日本文化特征。正是这些植根于日本国民内部的深层的文化特性支持了派阀政治这种特殊的政治形态的出现和发展。

自民党的派阀政治经历了一个演变和发展的过程。1956年的总裁选举是自民党派阀政治发展的起点，围绕这次选举，在党内形成了“八大师团”。所谓“八大师团”是指战后两个保守政党合并建立的自由民主党内部有八大派阀，领袖人物分别是岸介信、池田勇人、佐藤荣作、大野伴睦、河野一郎、三木武夫、石井光次郎、石桥湛山等8人。这八大派阀后又逐渐演变为以田中派、中曾根

派、安倍派、宫泽派、河本派等五大派阀为主的新格局。到 1992 年底自民党分裂前，党内又形成了六大派阀：宫泽喜一派、小渊惠三·羽田孜派、加藤六月派、三冢博派、渡边美智雄派和河本敏夫派。自民党内部派阀的演变有其自身的规律，通常是在派阀的领袖朝着争取总裁进而首相职位努力的时候，派阀就呈现生机和活力；一旦领袖获取了总裁职位，该派阀也就进入了其鼎盛时期；待到从权力的位置上坠落下来，派阀就会走向衰退，甚至分裂、解散、消亡。如“八大师团”中的大野、石井两大派阀的消失与这两派的领袖都曾努力进军总裁宝座，但是又始终未能如愿有关。而岸介信、池田、佐藤、河野和三木实际上是五大派阀的创始人，他们同时又相继担任过总裁和政府总理的职务。

派阀政治对自民党来说可谓是一把双刃剑。自民党的荣与衰都与派阀政治息息相关，真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自民党主导日本政坛时期，首相职位一直在不同派阀领袖之间交替，派阀竞争取代了党派之间的竞争，这就使得日本政权具备了民主之形。这反过来又有助于自民党维持‘一党优位制’。政权由一个派阀转到另一个派阀可以起到‘拟似政权交替’的作用”；通过派阀之间的相互对立和抗争，间接地反映舆论动向，派阀的‘拟政权交替’也容易完成自民党的政策转变。所以自民党能够比较灵活地应付国民的意见和要求，甚至可以采纳在野党的政策”。^①这也是自民党能够创下连续执政长达 38 年的辉煌的奥秘所在。派阀政治也为自民党提供了制约平衡机制。派阀与派阀之间形成了互相牵制的态势，达到了防止权力独断专行的功效。尤其是在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情况下，派阀与派阀之间的对立、抗争，有时能够防止权力集中。另外，由于自民党的基层组织十分薄弱，几乎不发挥什么作用，这样派阀就可以承担基层组织的一些职能，比如，培养和输送

王振锁：《自民党派阀初探》，载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研究论集》

(4)，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4 页。

干部、统一党内意见、教育党员等。

派阀政治也衍生出一些为日本国民所深恶痛绝的政治恶疾。派阀斗争是“金权丑闻”的重要根源。派阀的历史沿革已经显示，自民党派阀斗争的核心问题是“权”，也就是由谁当总裁进而成为政府首相。要想当总裁，就首先要要在党内建立自己的派阀，这样才能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同样，如果派阀的领袖能够荣登总裁宝座，整个派阀也就随之繁荣。但要维持强大的派阀，就需要有巨额的金钱作为后盾。尤其是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由于派系抗争的激烈化，以及选区情况变化等原因，选举所需要的政治资金越来越多。1986 年自由民主党五大派系的总收入是 79 亿多日元，比前一年增加了 65%。据日本报纸透露，90 年代初安倍派用于每个竞选议员候选人身上的钱高达 1000 万日元到 2000 万日元。其他派系估计也需要差不多的金钱数目。这只是竞选议员所需要的开支，如果再加上议员的日常开支，数目自然会更加庞大。单靠合法的政治资金很难筹措到维持派系正常活动的资金，因此，只有从非常途径集聚“政治资金”，结果不免闹出“金权”丑闻。日本的众多丑闻，如 1979 年的洛克希德公司行贿案，1988 年利库路特股票丑闻案，1991 年的野村、日奥“证券丑闻案”以及 1992 年的“佐川案”都与派阀争斗有些许关系。同时，派阀政治还使本应由全体议员来审议制定政策的民主程序变成了派阀领袖和个别实力人物之间私下协商的“暗室政治”。而这些都是与议会民主原则根本背离的，直接造成了国民对政治丧失信心。

派阀之间的政治争斗有时也削弱政党的整合功能，造成党内冲突与对立，严重阻碍政党形成一个统一团结的整体。鉴于自民党派阀是以利益为基础而集结的小集团，由此，各个派阀在提出能够促进自己利益的政策并竭力推行这一政策时，不可避免地会有损于其他派阀的利益，也就不可避免地会遭受来自其他派阀的攻击、破坏或对政策的扭曲，这也就影响了当政者的决策，或者削弱了政策执行的效能，造成政治资源的浪费。如果在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各

派阀再各自维护自己的利益，互不妥协，就很容易引起尖锐冲突，政党分裂也就难以避免了。总之，激烈的派阀争斗不仅造成了自民党的严重内耗，同时也招致了国民的厌弃和反感，严重危及了自民党的统治。

实际上，自民党自身也早就认识到了派阀政治的弊端，也曾有总裁提出解散派阀，停止派阀活动。早在 1963 年派阀政治刚刚形成态势之初，池田内阁就曾组建由三木任会长的党组织调查会，在党机关内讨论如何消除派阀的问题。之后，福田内阁时期，福田也提出“刷新政治”的口号，带头宣布停止派阀活动。大平、田中、三木、中曾根等派也都曾提出要停止派阀活动。但是，这些行动都没有奏效，派阀不仅没有被解散，而且长盛不衰。最终这把双刃剑导致自民党分崩离析。

1992 年，原自民党副干事长、熊本县知事细川护熙退党并另立门户，成立了新党“自由社会联合”。这一党名实际上包含着自由民主党的“自由”和社会党的“社会”两层意思，其用意是，一方面以“自由主义”为基础，一方面又纳入社会主义的平等理念，隐含着保守与革新从对立走向联合。不久后该党改名为“日本新党”。这是自民党走向分裂的前兆。

1993 年 6 月，日本国会围绕政治改革法案展开了激烈争论。宫泽喜一首相虽曾表示要“实现政治改革”，但因党内外各种意见难以协调而被迫于 6 月 16 日决定放弃在本届国会通过政治改革法案。6 月 17 日，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 3 个在野党以政治改革法案在本届国会搁浅是宫泽首相的重大失职为由，正式向众议院院长樱内提出对宫泽内阁的不信任案，并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18 日在国会对该案表决的关键时刻，自民党羽田派的 35 位议员也投了赞成票，致使不信任案获得通过。当天日本的各大报纸均以“自民党分裂”的大号黑字为标题，抨击自民党。之后，宫泽内阁宣布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宫泽内阁没有实现政治改革，不仅遭到在野党的抨击，也引起党内主张政治改革的议员的强烈不满。6 月 21

日，以自民党政治改革推进本部事务局局长武村正义为首的 10 名年轻议员宣布退党，并在当日组成“先驱新党”，亦称“新党魁党”。接着，羽田孜和小泽一郎于 23 日带领 44 名国会议员成立新生党。同一天，自民党内另有 80 余名议员以海部俊树为核心宣布成立“自民党政治改革推进议员联盟”，声称要与党内“慎重派”划清界限，继续推进政治改革。党内分裂必然影响自民党在新的一届大选中的得票率。实际上，在自民党下台之后，上台执政的七党一派联合政府中，有三个党——先驱新党、新生党和日本新党——是从自民党内部分裂出来的。更为可悲的是，这三个党在选举时高举的旗帜竟是“结束自民党的一党统治”和“推进政治改革”。

二、愈演愈烈的金权政治，导致民众对自民党的厌倦

所谓“金权政治”就是指公共权力的执掌者用手中的权力来换取个别利益集团的金钱，通常这种权钱交易是在违背社会公认法规的情况下发生的。日本的政治与钱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日本元老政治家岸信介表示：“政治就是金钱，也就是力量”。日本前国会议员池田正辅也评论说：“政治竞选就像扒手集团中的竞赛。”无论是总裁候选人还是国会议员候选人，要当选，就必须不惜血本在自己的选区里培植自己的势力，必须有自己的政治团体和后援会，必须拥有一个庞大的选举班子，必须随时随地采取各种手段收买人心。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金钱作为后盾。“有钱就能当选，当选就需要钱”，这已经成为日本政治生活中的一条铁律。单就总裁选举而言，政治资金的多寡是能否当选总裁的要素之一。1978 年，由福田派与大平派竞争总裁。这两派之所以力克群雄脱颖而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选前这两派的资金总额在各派中位居第一、二位。由此可以看出，资金对获取总裁职位的重要性。1978 年，中曾根康弘财力排名第三，1979 年升到第二，1981 年终于跃居到第一位，

这就为他在 1982 年总裁争夺战中胜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 1985 年，竹下登的资金为 8.2 亿日元，安倍晋太郎为 7.6 亿日元，渡边美智雄为 6.38 亿日元。最后的结果是竹下登夺得了胜利，成为自民党的总裁。这些事实足以显示金钱对日本政治家仕途升迁的重要性。

自民党用于政治目的的资金来源主要有这样几个渠道：政治捐款、党费和事业收入（党报党刊收入和出席宴会招待券等）。但是，党费和事业收入只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满足自民党从事政治活动的需要。所以，自民党的资金主要来源是政治捐款，尤其是来自财界的政治捐款。据统计，自民党政治资金的 50% 来自企业的献金。^① 那么，财界为什么会乐于把大量的金钱投给自民党呢？说到底是为了换回各种利益。日本经济四团体之一的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永野重雄一语道破天机：“河堤快决口时，就要出钱雇人去修堤。村里有钱的人自己不出工，就花钱雇人。企业给自民党捐款，就是给对我们有利的政治交劳务费。”早在 1955 年，当时担任经团联副会长的植村甲午郎就直言不讳地说：“保守党就像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儿子，但因为它是我们的‘独生子’，所以不能见死不救，必须出钱养活他。”^② 财界通过各种渠道向有关的派阀或政治权威人物提供政治资金，而自民党又是在派阀以及有势力的党的干部和议员的影响下决策，因此，这些派阀或关键的个人在对决策施加影响时自然不会违背财界的意志，往往会从财界的利益角度出发有效地引导决策。另外，由于这种“投资”往往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长期的，财界就很容易在自民党干部或所属成员中培养起自己的利益代表者，从而长久地影响政策决定。

日本政治结构上的弊端和法律制衡机制上的漏洞在一定程度上

参阅林尚立著：《政党政治与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24 页。

^② 转引自：《政治资金与自民党的兴衰》载《日本学刊》1996 年第 3 期，第 48 页。

纵容了金权政治的发展。① 在政治结构方面，自民党战后形成了“党、官、财”一体的统治结构。在党与官的关系上，官僚为政党献计献策和输送人才，反过来，政党会在国会审议官僚提出的议案和预算时向官僚提供帮助，并为官僚提供升迁的机会。在党与财的关系上，财界向政党提供政治资金和选票资源，而政党则在辅助金、政策、税收等方面照顾财界；在财与官的关系上，财界参与审议会等政府机关的咨询活动，而官僚则在产业育成等方面给予财界积极的行政指导。② 在这种铁三角关系中，任何形式的“权钱交易”都很容易展开，更何况在这种公开的“大三角关系”中，还存在着非公开的派阀（或是“族议员”）、行业团体与官僚之间的“小三角关系”。在“小三角关系”中，行业团体或大企业等利益集团直接向自民党各派阀及其议员个人提供政治捐款，而且提供方式更加隐秘，这就为“金权政治”孳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在法律制衡机制方面，尽管在1948年日本就出台了《政治资金限制法》，1975年又通过了《政治资金限制法修正案》，但是，该法律存在着十分严重的缺陷，根本无法有效地发挥遏制“金权政治”的作用。例如，该法律规定，不论个人或团体，对政党以外的同一政治团体或同一政治家，每年捐款金额不得超过150万日元。如果捐赠的政治资金数额不超过100万日元就不需要向主管机构申报资金来源，只要在报告书上登记总金额就可以了。很多政治家就钻这个漏洞。他们组织众多的政治团体，从而“化整为零”地筹集巨额政治资金，只要一次数额不超过100万元，就可以隐瞒其来源。另外，政治家还可以通过其他手段筹集巨额捐款，如高价出售宴会招待券等，而法律对这些却没有限制。因此，伴随着日本政治进程的发展，金权政治在日本愈演愈烈，金权丑闻成了自民党的李

① 参见宋益民：《日本“金权政治”刍议》，载《日本问题》1989年第7期，第23页。

② 参见林尚立著：《政党政治与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页。

生兄弟。据统计，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到 1993 年自民党下台，日本政坛的重大丑闻、舞弊案不下 20 起。

在金权丑闻中，首当其冲当属田中角荣卷入其中的洛克希德案件。洛克希德案件使盛极一时的“田中军团”受到重创，并导致“自民党绝对优势”时代终结，出现了“朝野伯仲”时代（即在野党的整体实力与自民党的实力处于均衡状态）。田中角荣属于“能挣会花”的大政治家。他凭借庞大的人际关系以及与企业之间的友好关系，聚敛了巨额财富，然后又用这些政治资金轻而易举地收买到很多议员，建立了牢固的地盘，同时用金钱控制议员来维持强大的凝聚力。所以，田中派在自民党内有强大的势力，田中角荣也被冠以“金权派政治家”的称号。^① 1974 年 12 月 9 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因财源来路不明受到在野党和国民的追究，被迫辞去首相职务，但这只是其政治生涯受挫的开始，洛克希德案件则使他身败名裂。1976 年 2 月，美国参议员丘奇揭发：美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商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在向国外推销飞机的时候，向国外的皇室成员、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等行贿。此事败露后在世界范围引起了轰动。不久以后就爆出，洛克希德公司为了向日本的“全日本航空公司”推销三星式客机，曾通过日本政界的幕后人物支付给日本政府高官 30 多亿日元的“活动费”。怀疑的目光一下子就集中在田中角荣的身上。因为全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引进三星式客机的时间，正好是田中与尼克松会谈后不久。日本新闻媒体对此事大肆渲染。三木武夫意识到此事关系到日本的政治声誉，下令彻底调查。尽管田中一再表示自己是清白的，检察当局仍然认定他有犯罪嫌疑，指控他在 1973 年 8 月至 1974 年 2 月担任首相期间，从丸红公司那里先后 4 次接受了洛克希德公司现金 5 亿日元。1976 年 7 月 27 日，田中角荣被送进东京拘留所。8 月 16 日，东京地方检察厅以受贿罪和违

参见王振锁著：《自民党的兴衰——日本“金权政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4 页。

反外汇法罪对田中起诉，次日田中缴纳 2 亿日元保释金后被保释。经过近 7 年的马拉松式的审判，1983 年 10 月 12 日 判决结果下达，田中被判有期徒刑 4 年，并追缴其受贿的 5 亿日元。田中成为日本政治史和审判史上第一个曾担任过首相却因涉嫌任职期间受贿而被起诉的人，其社会影响可以想象是多么强烈，自民党的公信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案件被揭出不久，河野洋平等 6 名国会议员就出于对自民党政治腐败的不满宣布脱党，组建“新自由俱乐部”。1976 年 12 月大选中，自民党遭到了空前的惨败，靠发展无党派议员入党的方式才勉强保住了议会过半数席位。由于三木首相下令彻查洛克希德案件，自民党内部很多人担心会引火烧身，掀起了“倒三木”运动，有 2/3 的议员提出要三木下台。迫不得已，三木首相以承担选举失败的责任的形式宣布辞职。但是，洛克希德案件并没有平息。1983 年宣布判决后，在同年 12 月的大选中，自民党再度没有保住众议院议席的稳定多数。事后，一向被社会舆论指责为受田中派势力支持的中曾根内阁也承认：“失败的最大原因在于未能处理好田中问题”。他表示今后“要全部排除田中的政治影响”，“确立政治伦理”。^①直到 1985 年田中病倒，田中势力迅速消退，洛克希德案件对政局的影响才逐渐减弱。

1988 年 6 月 18 日，一桩超过洛克希德案件的“金权交易”丑闻——利库路特案件——再次曝光。这一天的《朝日新闻》报道说，川崎市市长助理接受了利库路特公司的未上市股票并且非法获利 1.2 亿日元。利库路特公司是日本的一家新兴信息产业公司，该公司发迹的奥秘就在于向政界要人行贿，行贿的主要手段是利用未上市股票和现金。报道发出后，立即在日本社会再次掀起波澜。后经初步查证，1984 年年底到 1986 年 9 月期间，利库路特公司将未上市股票以低于正常上市价（每股 5270 日元）的优惠价（每股

王振锁著：《自民党的兴衰——日本“金权政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4 页。

1200~3000 日元) 转让给政界、财界等各界要人。1986 年 10 月股票正式上市后, 这些持股人都通过抛售股票获取了巨额利润。涉嫌“利案”的政界、财界要人数十名, 大都是自民党议员, 其中, 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其秘书的名义购买了 2.6 万股并获利 1.3 亿余日元。当时担任自民党总裁、首相的竹下登、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大藏大臣宫泽喜一也涉嫌其中。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购买股票并从中牟利数千万日元。这是日本战后最大的受贿案件。但是, 由于利库路特公司向政界要人贿赂的是未上市股票, 而不是现金, 根据法律规定, 公司转让股票属于合法的交易行为, 通常股票价格有升有降, 所以如果找不到转让股票者带有特定目的的证据, 就很难将其行为判定为行贿行为, 接受股票的人也就不能被断定为是受贿。结果, 牵扯到此案件的议员中只有 2 人因受托受贿罪被起诉, 其他议员如宫泽喜一、安倍晋太郎等人仅以辞职了事。但是, 随着利库路特案件调查的深入, 首相竹下登的民意支持率一路下降到 3.9% 创下日本历史最低点, 由此折射出国民对政治的不信任程度。1989 年 4 月 25 日, 竹下登首相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辞职。他在宣布辞职时说: “以利库路特事件为发端, 招致国民对政治的不信任仍在扩展。作为政府最高负责人和自民党总裁, 对此痛感负有责任, 向国民深表歉意, 为恢复国民对政治的信赖, 我决意引退。”^①

利库路特案把自民党政权推向空前的政治危机之中。为了阻止自民党声誉的继续下跌, 迫切需要一位国民公认的清正廉洁的领导人来力挽狂澜。但是, 昔日抢手的总裁宝座现在却无人敢问津。谁都害怕受到利库路特案件的牵连, 使自己的政治声誉毁于一旦。经过最后的筛选, 外务大臣宇野宗佑接替竹下出任首相。在意外收获首相一职后, 宇野信誓旦旦地表示要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来推进政

王振锁著:《自民党的兴衰——日本“金权政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81 页。

治改革，并指出：“恢复国民对政治的信任是巩固国家和平与繁荣的基础，”民主的根本就在于不辜负国民的信任和委托 推行诚实而透明的政治”。可这位仁兄上台没几天就爆出了“用金钱玩女人”的桃色丑闻。接着，在 7 月的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又遭惨败。在这次选举中，自民党只获得改选的 126 个席位中的 36 席，加上非改选的 73 席，共 109 席，远远低于参议院的半数（126 席）。这是自民党自 1955 年执政以来第一次失去参议院多数地位，标志着自民党主导国会两院的历史结束了，这对自民党一党独大地位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打击。7 月 24 日，宇野首相宣布引咎辞职。宇野内阁从 6 月 2 日上台到 7 月 24 日宣布辞职，历时不足两个月，可谓“超短命内阁”。

对自民党最致命的打击莫过于金丸信案件。1992 年 8 月 27 日，素有自民党内“教父”称号的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在自民党总部大楼会见记者时承认，1990 年 2 月他接受过东京佐川急便公司总经理度边广康的 5 亿日元“政治捐款”他决定辞去自民党副总裁和竹下派“经互会”会长职务。同年 9 月 28 日东京地方检察厅以违反政治资金限制法数量限制罪，向东京简易法院提出起诉。次日，法院裁定金丸信罪名成立并罚款 20 万日元。10 月 14 日，迫于朝野内外的压力，金丸信辞去众议员职务。78 岁的金丸信“告老还乡”后，花了 3 亿日元重修旧宅，希图安享晚年。但是，更大的丑闻败露了。1993 年 3 月 6 日，金丸信以偷税漏税数亿日元、违反所得税法的嫌疑被捕。3 月 27 日，东京地方检察当局以违反“所得税法”对金丸信追加起诉。经查实，金丸信的私人财产总额不少于 100 亿日元。这些收入大部分来自其家乡山梨县的土木建筑业及总部设在东京的大型综合建筑企业等。这些建筑企业捐献政治资金，以换取承揽公共事业的建设工程项目等好处。1996 年 3 月 27 日，金丸信告别人世，判决未了身先死。但是，金丸信本人长期在自民党内部以及政府中担任要职，而且是自民党内最大的派阀竹下派的领袖人物，所以金丸信案件给竹下派、宫泽内阁以

及自民党的整个统治结构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1992年底，竹下派内部围绕接替金丸信会长一职的人选产生严重分歧。支持小泽一郎的竹下派要拥立大藏大臣羽田孜为新会长，可是派内一部分人希望由小渊惠三副会长接替会长职务。小渊派在小泽一郎缺席的情况下拥立小渊为后继会长。事后，支持羽田孜的小泽派立即作出强烈的反应，他们不仅提出选举“无效”，而且宣布脱离竹下派，成立“改革论坛 21”。由此，竹下派一分为二为羽田派和小渊派，从此结束了竹下派控制自民党的局面。

一起接一起的金权政治丑闻搞得自民党遍体鳞伤、焦头烂额。正是这些腐败案件导致日本“国民对政财勾结、政治家为所欲为的现象深感绝望。因此，他们对政治越来越不信任”。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自民党历届内阁都把政治改革、清廉政治作为最重要的课题，但是，到头来并没有什么实际性的改变，一个个的政治改革方案最终都是不了了之。这更加剧了自民党的内讧，加剧了国民对自民党的厌倦，“人心思变，选民把票投给了有清新之意的政党”。

三、一党独大下民主的“变形”， 导致国民的强烈不满

二战结束后，在美国的控制下，西方民主被导入日本，日本实现了政治民主化。明治以来的天皇专制主义政治体制被废除，以天皇为象征的日本宪法的制定和实施开辟了日本的新时代。《日本国宪法》根据“国民主权”原则，推行“议会内阁制”，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原则的政治体制，日本从制度上确立了民主主义。战后合并建立的自民党各派阀也达成了民主政治的共识。在《建党宣言》中自民党提出要“立足于民主政治的本意”“走议会政治的大道”。但是，制度上的民主主义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中民主的原则可以贯彻。由于社会党的力量根本无法与自民党相抗衡，

日本并没有走向类似美国和英国的两党制，而是形成了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的政治结果，而自民党在权力运作方面的种种弊端使得日本呈现出“一流的经济，三流的政治”，民主发生了扭曲变形，民主政治实际上只是躯壳。

首先，在自民党一党长期统治下，出现了政治权力的专制和垄断。民主是与权力分散相联系的。权力分散就意味着不同的政治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就为不同的利益和观点提供了表达的渠道。实行多党竞争的国家，不同的政党轮流上台执政，不同的利益集团就可以通过支持不同的政党来反映自己的利益诉求。反过来，政权也就具备了应对社会需求的功能。自民党党内的派阀政治虽然具备“拟似政权轮替”的特征，由权力在党内派阀之间轮替取代了政党之间的权力交替，使自民党政策具备灵活、多变的特点，能够应付国民的意见和要求，但是，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起，自民党内部的田中一竹下派势力占据了主导地位，形成了自民党控制日本政治，而田中一竹下派控制自民党的权力结构，亦即实际上由田中一竹下派控制日本政治的局面。尤其是田中派的领袖田中角荣一度成为幕后操纵日本政权的重要人物，因此，当时处于台前的大平内阁、铃木内阁、中曾根内阁分别被戏称为“角影内阁”、“直角内阁”和“田中曾根内阁”。

田中角荣病倒后，田中派势力衰退，原属田中派的竹下登当上了自民党干事长，距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只有一步之遥。竹下登伙同田中派中的一部分人成立了竹下派，并成为党内最大的派阀。1987 年后的几届内阁——宇野内阁、海部内阁和宫泽内阁——都是由竹下派促成的。因此，竹下派在政府事务中享有很大的发言权，甚至可以说主导政府决策进程。例如，海部就任内阁首相后致力于政治改革，并于 1991 年 6 月向众议院提出了以《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三法案”（《公职选举法修正案》、《政治资金规定法修正案》、《政党资助法》）然而，9 月众议院以审议时间不充分为由否决了法案。海部首相试图解散众议院以

取信于民，但是竹下派会长金丸信闻讯后立即表示反对并拒绝再支持海部，迫使海部首相放弃竞选连任自民党总裁。

竹下派对宫泽内阁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宫泽喜一在自民党总裁竞选中胜出就是仰仗着竹下派的支持。新成立的宫泽内阁在党和内阁的人事安排上，都得事先与竹下派领导人进行磋商并征得后者的同意，重要职位往往都由竹下派的实力人物把持着。因此，宫泽虽然名为自民党总裁和日本首相，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太多的自主权，处处都要听命于竹下派。直到1992年竹下派因金丸信事件分裂，宫泽首相在改组内阁时才自豪地说：“这次党和内阁的人事安排是由我下的决断。”

此外，从1981年铃木内阁开始，历届内阁都十分强调党内融合，党内职位和政府公职都根据派阀势力的大小来分配。特别是自民党在1986年大选中获胜以后，竹下、安倍、宫泽等主要派阀为了争取中曾根首相的支持，都不愿意成为强有力的反主流派，这也就是说，党内没有主要的派阀充当反对派的角色，在派阀运营体制方面确立了总主流体制。对于自民党而言，“总主流派体制的确有利于党内运营的稳定，但也产生了较大弊端。通常情况下，当权力不能应对社会变化时，这种社会变化将通过反对派而被政界吸纳，并且，反对派也是通过适应社会的需求来夺取政权的。在日本，由于在野党并非有效的、强大的反对派，自民党内的反主流派则发挥着这种功能。因此，总主流体制确立的结果，是失去了通过反主流派来适应社会现实的机能。”^①

其次，民意代表机关，即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议会功能的弱化，出现“议会政治空洞化”。^②在议会政治中，自民主党的一党

① 徐万胜著：《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5页。

② 林尚立著：《政党政治与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5—457页。

独大，首先意味着一党长期在议会中拥有多数，多数党当然能够主导议会对政策法案的审议和表决，长此以往，议会的民主程序和原则趋向形式化。其次，在议会内阁制下，一党长期独大，就意味着一党长期掌握政权，组织政府，从而使议会政治中主导轮流执政的民主机制停滞，议会政治趋向一党独裁。同时，由于在野党长期的在野地位，失去了执政的可能，政策形成的能力弱化，因而作为反对党的反对机能也趋向弱化。

日本议会政治弱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党政议”的高度一体化。首先，政党的官僚化，使自民党的决策核心与政府官僚形成密切联系，在“党高官低”的态势下，政府部门的具体决策和官僚的活动，都直接受到自民党组织和党的核心成员尤其是“族议员”的干预和影响，从而使党政关系趋向一体化。其次，在以委员会为中心的审议制度下，长期居议会多数席位的自民党，通过自身设立的与国会中各委员会基本对应的部会组织，与国会中的各委员会形成全面的联系。由于部会的重要成员通常是国会相应委员会的成员，同时基于多数优势，自民党又在大多数委员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样一来，自民党实际上操纵了国会中各主要委员会，从而在自民党的一党统治下，形成了以自民党为中介，党、政、议“三位一体”的权力与决策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自民党是主导力量，它的作用不仅破坏了在政党政治的条件下政府官僚的政治中立性，而且架空了议会原有的功能与作用。

国家机器被单一政党操纵所带来的议会政治的弱化，其直接政治后果是党的意志代替国家意志，党的政策代替国家政策，由此而来的是，不仅民主政治的发展受到了限制，而且也使已有的民主机制变得虚无，从而整体上导致日本民主的贫困，权力失去监督，自民党腐败之风日盛，国民强烈不满。

最后，自民党与利益集团的紧密结合，使政府决策偏向于部分群体的利益。因为一个国家的政治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在某个利益集团影响或推动下制定的政策很可能就会损害其他相关利益集团的

利益。自民党主要代表财界和农民的利益，大部分政治资源主要向工商业利益集团和农民倾斜，从而使其获得巨大利益，与此同时，受到伤害的是劳工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不是以公开和透明的方式进行的，而是进行黑箱操作，属于幕后交易。这种不公开和不透明的方式不仅严重损害了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威胁到日本的民主主义。

四、社会多元化侵蚀了自民党的 选举地盘和社会支持群体

首先，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自民党所依赖的农村总地盘在不断萎缩。政党是联系社会与公共权力之间的纽带，因此，它必然要代表一定的社会阶级阶层集团利益。只有代表一定的社会阶级阶层集团利益，从而获得该利益主体的广泛支持，政党才有可能在政权舞台上获得一席之地。对政党而言，这种支持力量就构成了它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自民党向来以广大农林渔村中的保守势力为其重要的社会基础和选举地盘。尽管自民党从阶级属性来讲，并不是一个农民政党，而是明治维新后逐渐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政党，但是，它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其主要社会基础是农民。如果说财界是自民党的“金库”，那么农村则是自民党的“票田”。但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必然带来农村人口的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自民党的传统支持群体。

自民党与农民的关系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在政党开始出现在日本的时候，日本社会的现代化刚刚起步，整个社会仍然是农村社会占主体。这就客观上决定了战前政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随着政党规模的发展，它仍然没有超越这种关系。一方面是因为政党所属议员主要是地方政治家，他们在地方上所具有的影响使得地方成为政党的主要支持地盘，而地方在当时主要体现为农村社会。另一方面，日本农村社会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名流和有权势者有很强

的传统权威力量，因此也就具备了很强的集票能力，可以给政党候选人提供重要的支持，这就使得保守政党与其在农村的选举地盘关系不断延续和发展，并保持到战后。

自民党经两个保守政党合并建立后，进一步利用“利益还原”作为手段来巩固和发展其农村的选举地盘。所谓“利益还原”就是指自民党政治家或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和某种政治优势给予支持他们的地区和选民利益回报。自民党对农村的利益还原主要体现在对农村的利益保护上，具体有三种形式：一是政策保护；二是财政补贴；三是下放权力。

自民党对农村的政策保护主要体现在对米价和农产品市场的保护。日本政府除了限制大米进口外，还给予农民大量的补贴，即政府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向农民统一收购大米，低价出售给消费者，中间的差价由政府来补贴。大米不是根据市场来定价，而是人为控制，由政府主持，生产者、消费者和中立的第三方组成的“米价审议会”来审议决定。自民党对米价的保护确实也得到了选票的回报。自民党在稻米产量高的地区得票率同样也比较高。以米价的变化来看，1961年政府收购价格每60千克4421日元，到1967年每60千克上涨到7808.4日元，涨幅达到76.6%之多。自民党保护米价的努力在1967年大选中就得到了回报。1967年大选中，自民党57%的得票率是依靠种植稻米的农民支持得来的。

日本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比如财政补助、提高关税、制定配额以及动植物检疫等手段限制国外农产品进入本国市场。因此，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是农产品市场准入程度最低的国家。到1987年，日本仍限制22种农产品的进口，而同期的美国和联邦德国只有3种，英国只有1种；迫于欧美国家的压力，日本在1992年全面开放了牛肉、橘子、果汁市场，但实行进口限制的农产品仍然有12种。限制进口农产品的品种避免了本国农产品受到廉价进

口农产品的冲击，这无疑保护了靠生产这些农产品为生的农民的利益。

日本政府对农业的财政补贴项目也十分繁多，大量农户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得资金补助。例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补贴就是其中的一种。凡经审批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的工程费用，中央财政会补贴全部投资的 50%左右，都道府县财政和市町村财政还要分别补贴 25%和 15%，只有剩下的 10%左右由农户自己负担。农户购置农业生产资料也可以享受到补贴。国家会负担凡是按标准集体购买并共同使用的机械设备、农用设施的相当大一部分费用。正是因为政府补贴项目繁多，所以农业预算在国家财政预算中一直占有很高的比例。例如，农业产值在日本国内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从 1960 年的 9%下降到 1970 年的 4.2%、1980 年的 2.4%和 1989 年的 1.9%，但是，农业预算在一般会计预算中所占的比例却从 1960 年的 7.9%上升到 1970 年的 10.6%，然后才降到 1980 年的 7.1%和 1989 年的 4.1%，份额相对较大。

名目繁多的农业补贴同样巩固了自民党在农村的选举地盘。自 1961 年《农业基本法》制定后，为了改革农业施政和推进农业现代化，日本政府在全国各地实施了大量的补助金融资，农业补助金显著增加，从 1959 年的 453 亿日元增加到 1961 年的 590 亿日元、1962 年的 726 亿日元、1964 年的 980 亿日元和 1966 年的 1660 亿日元，在直线上升的农业补助金的作用下，舆论调查中农林渔业者对自民党的支持率也从 1955 年的 52%上升到 1965 年的 59%、1975 年的 62%。^②

所谓下放权力就是把原来由政府负责管理的事务下放给农业生

① 参见汪巍：《日本的农产品补贴政策 and 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载《现代日本经济》1991 年第 1 期，第 48 页。

② 参阅徐万胜著：《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99 页。

产的最大组织——农协。这样一来，农协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就不仅仅是权力，同时得到了由权力带来的利益。这又一次体现了自民党的利益还原机制。自民党给农协权力，反过来，农协职员以办理农协业务为名，走村串户帮助自民党进行选举动员、拉拢选票。日本农民群体意识比较强，几乎所有农户都加入到一个或两个以上的农协组织中，甚至有的农户家中有多人加入同一农协，以至农协会员数比农户数还要多。农民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有很多需要求助农协的地方，因此他们都不会违背农协的投票意志，往往会按照农协职员的暗示投票。这样，就形成了农协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利用和相互制约关系。“政府通过政策和财政手段，吸引农协为其服务，即把农村作为行政部门的辅助机构；反过来，农协以自己的经济力量和在农村中的地位，支持自民党在农村的竞选，扩大自民党的政治影响。”^①

然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农林渔村人口流向城市及自营业者中农林渔业主的减少使自民党的传统地盘和社会阶级基础处于不断萎缩的状态。据统计，日本总农户由 1955 年的 604.3 万户减到 1990 年的 383.5 万户，农业就业人口由 1960 年的 1454 万人下降到 1991 年的 463 万人。^② 农业人口的急剧减少严重削弱了自民党的农村“票田”，农民阶层在大选中对自民党的支持“贡献度”相应下降。农林渔业者在自民党支持阶层中所占比例由 1955 年的 44% 下降到 1975 年的 19%。^③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化趋势的加强，国际社会要求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压力不断加剧，自民党不得不有限地开放日本农产品市场，这使农民蒙受重大损失，致使自民党在农

① 王振锁著：《日本农业现代化的途径》，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19 页。

② 参见徐万胜著：《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67 页。

③ 参见徐万胜著：《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67 页。

村的支持率逐渐下跌。这无疑对自民党的统治产生了冲击。

其次，“中流意识”的社会基础崩溃，无党派阶层的扩大也导致了自民党的执政危机。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中流意识”一度成为日本人的主要社会意识。自1958年以来日本总理府每年都进行“关于国民生活的舆论调查”，该调查显示，20世纪70年代，有90%的人自认为居于社会生活中等水平，80年代比例有所下降，但也接近90%。^①“中流意识”的产生，一方面反映了日本国民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性。人们对自己所处社会地位的判断标准出现了多元化，有看重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有看重经济收入和消费能力的，有看重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养的，彼此之间并不相互排斥并且都会得到承认；另一方面，“中流意识”也表明集团主义在日本社会十分盛行，日本人在社会生活方面既不愿意标新立异，也不愿意被排除在团体之外。

“中流意识”的产生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密切相关。经济发展带来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也就滋生了对现状的满足感。而这种对生活状况的满足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对现有政治秩序的维护。人们正是从现存的体制中获得了满足感，也就增生了怕变、求稳的保守心态。他们不愿意发生重大的政治变革，惟恐变革会危及他们满意的生活状况。即使他们有时会对保守的自民党政权产生不满情绪，但是也不愿意由社会党取代自民党执政，因为社会党是带有革新意识的政党。据1986年日本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高达40%的国民仅仅是期望社会党发挥监督自民党政权的作用，即使在社会党的支持者中，期望由社会党上台执政的人也不过19%。^②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后期，日本国民中广泛存

① 参见徐万胜著：《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页。

② 参见徐万胜著：《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页。

在的“中流意识”在客观上有利于自民党一党独大地位的维系。

但是，“中流意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日本经济出现了长期的不景气，失业率迅速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中流意识”的社会基础开始逐渐崩溃，而“无党派阶层”的作用也就日益凸显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自民党的“一党优位制”。所谓无党派阶层并不是以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和职业等为标准划分的阶层概念，而是根据与党派之间的关系确定的阶层概念，通常是指不与某一特定的政党联系在一起，即属于这个阶层的人不是某一政党的强有力支持者，他们不会在每次选举中都把选票投向同一个政党，甚至他们会对政党、对政治持不信任态度，这就导致他们在选举中有可能弃权。无党派阶层的出现增加了选举的“游离性”。对于特定政党来说，无党派阶层的不断增加，就意味着该政党固定支持者人数下降，选举成绩也就趋于不稳定。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后期，出于对自民党政权公害政策、社会福利政策、洛克希德事件、党内派阀斗争加剧的不满，很多无党派阶层在选举中选择支持社会党，结果造成很多地方选举中出现社会党人行政长官，国会选举中出现“朝野伯仲”的局面。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无党派阶层成为自民党的“潜在支持者”，也就是说，他们对自民党满意的时候，就会把选票投给自民党；如果对自民党不满，就会选择弃权。这虽然不会危及自民党的执政地位，但是也使自民党的选举成绩十分不稳定，自民党在 1980 年大选、1983 年众参两院同日选举、1986 年众参两院同日选举、1989 年参议院选举及 1990 年大选中所获选票上上下下、反复无常就证明了这一点。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由于自民党政权的金权政治腐败以及国内经济不景气，使无党派阶层再一次呈现上升趋势，而且出现了较强的“脱党化”特点，即无党派阶层拒绝参与政党政治，纷纷选择弃权。1993 年 7 月的大选投票率只有 67.26%，这是日本战后投票率最低的一次，这无疑也影响到自民

党在大选中的成绩。

自民党在其单独连续执政的 38 年时间里，虽然带来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党内派阀纷争、金权政治腐败以及一党独大使民主原则遭到扭曲，都使日本国民对自民党，甚至对政治失去了信任。再加上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农村人口的急剧减少，使自民党的“票田”萎缩，使得自民党不得不面对 1993 年大选的失败，同时也标志着日本政党体制由“一党优位制”向多党竞争体制的转变。

第四章

印度国大党：百年大党的兴衰沉浮

印度国大党，全称印度国民大会党，创建于 1885 年，创始人是退休的英籍印度文官 A. O. 休谟。国大党创建的初衷是缓和同英国殖民者与印度日益高涨的民族运动之间的矛盾。19 世纪末国大党开始领导印度民族独立运动。1920 年，该党通过了“圣雄”甘地提出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议案，并在全国实施。同年，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加入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作为激进派的代表，他在国大党内的作用逐渐得到加强，1927 年国大党年会通过了他提出的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决议。两年后，尼赫鲁当选为国大党主席，在他的领导下，国大党把争取印度完全独立确定为党的奋斗目标。1942 年国大党全国委员会通过了英国“退出印度”的决议，遭到殖民当局的镇压。1945 年底到 1946 年初，英在印度举行中央和邦议会选举，国大党在国会获得过半数席位，并在 8 个邦执政。1946 年英殖民者组织成立印度临时政府，尼赫鲁出任总理。1947 年迫于印度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殖民统治斗争的压力，英国政府派出的印度总督路易斯·蒙巴顿于 6 月公布了“印度独立法案”（又称“蒙巴顿法案”）。同年 8 月 15 日，印度、巴基斯坦实行分治，印度自治领政府成员在英国总督的主持下宣誓就职，尼赫鲁出任总理，新政府成员共 14 人，其中国大党人 8 名，非国大党人 6 名。这是一个以国大党为主党的联合政府。

1950 年 1 月 26 日，印度宪法正式生效，宪法规定，印度是主

权的民主共和国，权力来自人民。从此，印度结束了自治领的地位，成为独立的主权共和国。独立后，1951年10月25日至1952年2月21日，印度进行了首届联邦人民院和邦立法院选举，参加选举的有包括印度国大党、印度共产党、印度社会党在内的70多个政党，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地方性政党，很多是为参加竞选而刚刚成立的。所有政党都利用竞选广泛造势，发表竞选宣言，争取选票。国大党凭借其不同凡响的经历，在民众中树立起的威望，以及在自治领政府建立后的工作成绩，得到了选民的青睐，结果无论在人民院还是在各邦立法院的选举中，国大党都赢得了胜利。在人民院，它获得45%的选票，364个席位，占总席位的74.4%；在各邦立法院，它获得42.2%的选票，2248个席位，占总席位的68.4%，成为当之无愧的执政党。大选之后，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出任共和国首届政府总理，1952年5月13日新政府成员宣誓就职。

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根据印度国情，制定了印度政治现代化的四项原则：民族主义、议会民主、社会主义和世俗主义。其中的民族主义是主权要求，社会主义则是争取民心、缓和国内矛盾的口号，而构成印度政治制度核心的是世俗主义（政教分离）和议会民主两大原则。由于印度实行的是西方式的政治体制，即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又因为它人口众多，所以，印度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国大党在领导印度取得独立后，长期处于单独连续执政的地位，并使印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经济也有很大的发展。从独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国大党在中央的政权虽然不断遭到挑战，但除1977—1979年和1989—1991年外，基本保持了执政地位。但是，在各邦，国大党的实力遭到严重削弱。1987年3—6月在17个邦的议会选举中，它在9个邦失利。此时，全国25个邦中有11个邦的政权由国大党（英迪拉派）执掌。此后，有些邦的情况虽然变化不定，但总有大约近半数的邦政权不在

国大党（英迪拉派）手中。^① 1991年拉吉夫·甘地死后，党内资深领导人纳拉辛哈·拉奥当选为国大党主席，组成了在议会中占少数席位的政府，至此，结束了国大党统领印度的历史。1996年第十一届国会大选，国大党一败涂地，最终沦为在野党。

国大党在野8年后，在2004年的印度大选中，由拉吉夫·甘地在意大利出生的遗孀索尼娅·甘地领导的国大党东山再起，击败了时任总理瓦杰帕伊领导的人民党联盟，再次登上执政舞台，由有“印度改革设计师”之称的辛格出任总理。国大党渴望重振往日雄风，但是，理想能否变成现实，还要经受时间的考验。

一个有百年历史的老党，一个在执政舞台上独步几十年的大党，不管她今天如何，也不管她未来的路能够走得多长，其由盛而衰，由长期独掌政权到8年在野的历史都值得我们关注，其原因都值得我们去认真分析总结，其经验教训都值得我们党认真地思考和汲取，尤其是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今天。

综观国大党执政历程由盛而衰，最终沦为在野党的主要原因在于：

一、经济发展过缓，社会矛盾尖锐，导致民众不满，削弱了国大党的执政基础

印度独立后，国大党确立了要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核心是强调主要生产资料为社会控制以及公平分配。前者意味着基础工业和关键工业国有或由国家监督，后者意味着改善下层人民的经济地位，不使财富过分集中。在确立了社会主义目标后，计划经济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国大党政府开始制定国家发展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51年4月开始实行的，1956年完成，体现了以加速

参见林良光主编：《印度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231页。

工业化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从 1956 年开始执行的，延续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发展模式。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虽然工业得到了迅速增长，如“二五”计划期间，制造业年增长率为 6.28%，采矿业为 6.96%，能源和供水为 12%，但是，在一个农业人口占主导地位的典型农业大国，问题也随之而来，主要是农业生产提高的幅度不大，许多农作物的产量没有达到指标，与工业的迅速增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由于粮食短缺，不得不年年花费大量的资金和外汇进口粮食，严重地影响了工业化的进展。同时，由于土改不彻底，使农村大量过剩劳动力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到“二五”计划完成时，仍有 710 万失业人口。贫富差距未能缩小，从经济发展中受益的是少数人，多数人依旧贫困。连尼赫鲁也不无遗憾地说：“计划的执行帮助了富人而没有使穷人得益。”^①

1961 年 4 月开始实行国大党政府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继续遵行上一个五年计划的发展模式，同时也提出了大力增产粮食以达到粮食自给的目标。不过，在实际执行时，尼赫鲁把增产希望寄托于土改和合作化的推动上，而农业支出只是略有增加。结果，“三五”计划在农业方面实施的情况比过往更糟。各种农作物增产指标除甘蔗外都没有完成。粮食计划达到 1 亿吨，实际完成 7230 万吨；棉花计划 700 万包，实际完成 460 万包。“三五”计划期间进口粮食共 2500 万吨，比“二五”计划期间还要多。“三五”计划期间农业年增长率由“二五”期间的 3.35% 下降到 0.28%，是独立以来最差的。同时，国大党寄予厚望的土地改革，在遭遇地主们的顽强抗拒后打了折扣，进行得很不彻底。尼赫鲁关于要在农村实现合作化的主张，由于党内思想的分歧，也没有认真落实。1959 年国大党在那格普尔年会上通过了《关于农业组织模式的决议》，强调合作化应是印度农业组织的基本模式，号召全党重视并认真开展工作。

但是，决议通过后又是雷声大雨点小，并没有被认真地执行。那些响应号召成立起来的少量合作社，也多在成立后不久就因资金、管理、分配等一系列问题无法运转而陷于解体。尼赫鲁虽然对此耿耿于怀，然而也无计可施。

在工业方面，“三五”计划执行得同样不甚理想。由于受到资金紧张的困扰，预定的资金不敷使用或根本不能到位，结果只能紧缩投资并更加依赖外援。到1966年印度的外债高达350亿卢比。资金方面的捉襟见肘和外汇短缺，使许多计划进口的设备、材料不能进口，许多项目不得不推迟上马。

“三五”计划执行的结果与“二五”计划相比，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由4.27%下降到2.84%。国民收入年增长率由4%下降到2.4%，比计划预定的5%差了一半。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均收入年增长率由2.0%下降到0.2%。失业人口有增无减，由710万人上升到960万人。

1966年3月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满。英·甘地领导的国大党政府面对困难的经济形势，不得不暂时停止实行下一个五年计划，以进行政策的调整。1967年2月印度举行第四届人民院和邦立法院的选举。严峻的经济形势使国大党的处境异常困难，连续两个灾荒年使农业大幅度歉收，1966—1967年度物价上涨了约14%，是实行计划经济以来升幅最高的年份。经济的大滑坡导致国大党的威望也随之下降。党内出现了不稳定，各邦地方实力派人物有不少人退党，另立门户，成立各自的小党。面对此情此景，第一次领导国大党参加竞选的英·甘地，为消除民众对国大党的失望情绪，在竞选宣言中许诺说：“最重要的是保证每个人的基本口粮，并且尽快地满足国民在食品、衣着、住房、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最低限度的需要。”此次选举结果显示，尽管国大党仍然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得票率和所获议席与前几次相比有很大的跌落，在人民院，国大党获得的选票占总选票数的40.8%，比上次降低近4个百分点。获得席位284个，占总席位数的54.6%，比上次降低近20个百分点，

这是国大党自执政以来在选举中表现最差的一次，国大党丧失了议会中的绝对多数地位。在邦立法院的选举中，国大党也频频受挫，在约半数邦落到了少数地位。到 1967 年夏，全国 17 个邦中国大党只握有 9 个邦的邦政权。

大选之后，英·甘地继续出任总理，领导新一届国大党政府。新政府通过绿色革命来实施经济调整政策，即通过增加农业投资，引进现代生物技术的办法，提高农业生产率，以促进粮食增产。同时为了反映民意，争取民心，采取了多项左翼激进政策，俗称“十点计划”，以期实行社会公平。在调整工作取得预期的进展后，1969 年 4 月开始实行第四个五年计划，计划开始执行的前两年非常顺利，国大党初步实行的激进政策看来也甚得民心。1971 年 3 月，第五届人民院选举提前一年举行。国大党在竞选中又提出了“消灭贫穷”的口号，因此深得人心。执政的国大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所得选票占总票数的 43.7%，席位 352 个，占总席位数的 67.9%。这一结果表明，英·甘地领导的国大党政府所采取的激进措施得到了下层群众的肯定，下层群众对政府采取有力措施致力于改善他们的处境抱有很高的期望。

然而，好景不长，在凯歌声中建立起的第五届国大党政府，不久又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

第五届国大党政府成立后，英·甘地再次出任总理。这届政府把大选胜利看成是人民对政府实现激进政策的肯定和新的授权。以激进的民主社会主义为旗号的英·甘地政府，继续推进其激进的经济改革政策，大规模的国有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政坛上的左倾情绪也随之越来越浓。结果，国有化像一把双刃剑架在了国大党政府的脖子上。正像有的学者所总结的那样：“激进化措施的实行主要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经济增长的考虑是第二位的，因而是再分配取向的改革。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有些是合理的、必要的，如银行和保险业国有化、取消王公年金和特权、推进土改和互助合作等；有些并非很有必要（大多数国有化项目）；有些则完全没有必

要，纯属不智之举，如接管病态企业、小麦贸易国营等，只有负面效果。大多数企业在变为公营后，经济效益要么没有提高，要么还不如以前。^①如煤矿在国有化后，产量就降低了，政府要从国库拨出巨款维持病态企业。

与此同时，人祸、天灾接踵而至，国大党政府疲于招架。1971年底开始的印巴战争，造成军费开支直线上升，加之收容800万孟加拉难民的巨大消耗，使政府的财政负担不堪重负，只有靠压缩投资和滥发纸币的办法解决。结果不仅影响了“四五计划”的实现，而且引发了通货膨胀。1972年印度又遭遇了大旱灾，全国粮食产量下降，粮价上涨，引起物价的全面上涨。消费者买不到粮食，政府却帮不上忙，因食物引发的骚乱开始了。1973年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对已经捉襟见肘的印度财政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国家经济的困难，引发了政治的动乱，仅在孟买市，1972—1973年间，就至少发生了12000次罢工和静坐抗议。在全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有罢工、抗议游行和民众与警察冲突的现象。学生站在动乱前沿，在全国来回穿梭奔波。

这一切都使开端良好的“四五计划”没有办法实现。英·甘地领导的国大党政府为应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不得不忘掉过去自力更生的宣言，屈尊向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紧急援助。援助得到了，但其条件是：经济政策必须适合世界银行的胃口。英·甘地政府背上了反通货膨胀的包袱。于是从1974年起，印度开始采取紧缩通货政策，政府颁令限制红利分配，冻结工资，并削减政府开支，减少对私营成分的信贷，同时，大力号召提高效率，增加生产。这意味着提高失业率，群众更加不满。

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加剧了政治形势的紧张，人们对国大党政府的失望和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英迪拉热”也骤然降温。国大党“消灭贫穷”的竞选口号，曾给予下层民众以极大的希望，而眼前

的现实却使人们怨声载道。当英迪拉小心翼翼地解释贫穷不能“一夜之间”被消除时，她的批评者抨击到：“只有穷人的贫困没有被改善。”城市中的中小有产者也饱受经济恶化的影响。新一届国大党政府在上台一两年的光景里就输光了人们对它的希望和信任，人们对国大党的强烈不满给了反对党扳倒国大党的可乘之机。各种反对力量很快形成了强大的倒阁运动。学潮、工潮风起云涌，地方势力也趁火打劫，如在古吉特拉邦发生的骚乱，始于反对高物价和执政党的腐败行为，但很快就转变为一个如火如荼、更大范围的改革运动，人们对英迪拉的领导是否正确质疑转变成对“她统治的整个体制的合理性”的挑战。

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执政党内部的分歧加剧。英·甘地内外交困，在党内外要求她下台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她不甘示弱，不仅没有辞职，反而采取强硬措施，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来制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紧急状态实行后，经济形势虽然有所好转，但是政治形势却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国大党在实行紧急状态期间，采取了许多过火的和非法的行动，其中包括对反对党实行打压、大量逮捕、过分压制新闻自由、限制罢工、强迫节育、大拆贫民窟又缺乏妥善安排等。

1977年1月18日，英·甘地出人意料地在广播中宣布，在紧急状态中被两次推迟举行的第六届印度人民院的选举将在3月份举行。就此，对执政的国大党来说，又一次决定命运的大选拉开了序幕。

在第六届印度人民院的竞选中，执政的国大党提出的口号是：“消除贫困 减少贫富差别 铲除非正义”强调的重点仍然是实现社会公平。英·甘地为大选竭尽全力，她几乎走遍全国，到处发表演讲，为自己的党拉选票。她“竭力为实行紧急状态辩护，说那是被破坏势力的非法行为所迫而实行的，是为了从混乱和灾难中挽救国家。她还突出强调紧急状态期间印度经济上取得的进展，并以此证明实行紧急状态是为国家和民族利益着想，人民从经济发展中得

到了实惠”。^①

但是，选举结果却给了国大党当头一棒。人民党取得胜利，执政的国大党惨遭失败，它只获得总票数 34.5% 的选票，议席 154 个，占总席位的 28.4%。英·甘地本人落选，内阁 49 名部长中有 34 名落选。在国大党的优势选区，如北方邦、哈里亚纳邦、比哈尔邦和德里直辖区，它居然一席未得。国大党的人心向背由此可见。连续一党执政 27 年的国大党在人民的选择面前，无可奈何地交出了政权，3 月 22 日，英·甘地向代总统贾提递交了辞呈，并发表声明，作为反对党，愿与新政府实行建设性的合作。国大党至此成为议会中的反对党。

大选失败后，英·甘地本人对失败原因进行了总结。她说，政府采取的强硬措施激怒了行政官员，计划委员会为了快速增长而实行的某些计划激怒了农民，应该发给工人的补贴没有发激怒了工人，强行实行的绝育措施招来了很多人的不满。

在经历了短暂的失败后，英·甘地领导的国大党在 1980 年第七届人民院的选举中又重新登上了执政舞台。人民把拯救国家的希望又一次寄托在国大党身上。重新上台的国大党在英·甘地的领导下，调整经济政策，为改变印度的落后面貌竭尽全力。英·甘地遇刺后，其子拉吉夫·甘地继任总理，领导国大党政府继续实行经济改革，他熟悉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潮流，有全新的经济理念，思想解放，在他力所能及的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措施。但是，他却无力再造国大党往日的辉煌。拉·甘地的改革因遭遇重重阻力显得虎头蛇尾。在他执政的第三个年头，改革所带来的经济政治的繁荣景象骤然改观。“经济改革的措施虽然在继续，但改革的强劲势头消退；其他方面的改革则除个别外俱已偃旗息鼓。从经济方面看，改革显露出了成效，但远不够理想；就政治方面而言，则成效较小，给人总的印象是，印度在迈出最初的几步后又基本上徘徊

徊不前了”。^①结果，在1989年11月举行的第九届人民的选举中，国大党只获得39.5%的选票，197个席位，占总席位的37.3%。虽然国大党仍然是得票最多的党，但因席位不足半数，只有取得其他政党的支持才能组成政府。日趋衰落的国大党没有企图寻求其他党的支持，主动向总统提出放弃组织政府，又一次成为在野党。

1991年5月，印度举行第十届人民的选举，拉·甘地在竞选活动中被斯里兰卡泰米尔恐怖分子杀害，国大党在选举中获得37.3%的选票，225个席位，占总席位数的44%。这次，国大党鼓足了勇气，建立了以拉奥为总理的国大党政府。此时，面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泰国、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的跟进，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也崭露头角的现实，国大党拉奥政府，急于改变印度经济发展速度已明显落在亚洲许多国家后面，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局面，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加快了经济改革步伐。拉奥的改革是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为方向的。但在国内财政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国大党拉奥政府的改革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由于投资不足，严重影响了增长速度，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改革方略虽然实现了印度经济模式的转换，形成了一条与新时期相适应的实行经济现代化的道路，但是却大大改变了尼赫鲁以来国大党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做法。这使那些始终把缩小贫富差别，实现社会公平的希望寄托在国大党政府身上的民众深感失望。结果，拉奥政府的改革日益显现出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引起了印度广大民众对国大党的不满。1996年拉奥政府任期届满，举行了第十一届人民的选举，国大党被多数选民冷落，只获得28.8%的选票，140席，占总席位的25.6%。印度人民党跃为第一大党。此次国大党在野后，连续8年不得翻身，直到2004年大选才有机会重返执政舞台。

总之，国大党的兴衰沉浮是与它长期执政所实行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不力有关的，长期以来作为一个执政党它一直未能就困扰印度社会经济发展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许多重大社会问题拿出得力的政策和办法，没能给人民群众提供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和生活保障。首先，印度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但是，国大党执政后，却未能在农村解决占总人口近 80% 的农民的土地问题。国大党政府 20 世纪 50 年代曾宣布废除封建剥削的柴明达制度，推行“土地最高限额法”，但这项法律的实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全国农村原有的封建土地关系，占全国农村人口约 4.5% 的地主和 10% 的富农仍占据着农村 75% 以上的土地，贫苦的农民和无地的农业工人占到了农村人口的 25% 以上。这些农民的悲惨生活在独立后的印度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其次，社会财富分配极端不公，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印度是世界上较贫困的国家之一，国大党执政后，虽然历届政府都提出要缩小贫富差别，实行社会公平，并出台了十几个扶贫解困计划，但贯彻不力，收效寥寥。国大党的经济改革政策，往往是中产阶级和大企业家受益，而广大下层群众的生活状况则没有什么实际性的改变。像拉·甘地执政时期就被有的企业家称为私营工商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直到现在，全印度富人阶层约占总人口的 10%，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 30% 左右，而有近 50%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全国失业人口 7000 万，童工 1 亿多。据瑞士银行统计，印度商人、公司和政客在该行的外汇存款高达 2.5 万亿美元，占全印度私人财富的 1/3，是印度 GDP 的 6 倍。再次，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欠债太多。国大党虽长达 40 多年执政，但在 10 亿印度人中，至今却仍有 1.5 亿人住在贫民窟，有 5 亿多人没有用上电，3 亿多人没有安全饮水，7 亿多人没有卫生设施，1.3 亿人得不到医疗服务，4 亿多人是文盲。国家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每年都有数千万人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并无法得到及时而有效的救助。最后，种姓教派冲突严重，社会治安状况恶劣。印度民族、宗教对立由来已久，情况复杂，冲突激烈，国大党

执政后对这一历史社会问题一直处置不当，结果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以及东北部七个小帮，长期存在暴力恐怖活动；社会上的教派、种姓、民族冲突更是从未间断，国大党领袖“圣雄”甘地、英·甘地和拉·甘地先后成为教派冲突的“牺牲品”，民众更是缺乏安全感。失去民众的支持是国大党由盛而衰，由长期执政到多年在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家族政治色彩浓厚，党内没有正常的民主机制和领袖更替机制，致使国大党内部纷争、内讧不断，直至出现几次大的分裂，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印度国大党的执政，带有浓厚的家族政治色彩。这个党的历史是和甘地—尼赫鲁家族紧紧地连在一起的。党的命运基本上维系在一个家族、一个领袖身上。印度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5月13日，由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出任总理的首届政府成员宣誓就职。尼赫鲁连续领导了国大党的三届政府，1964年4月22日，尼赫鲁病逝。

尼赫鲁执政10多年，由于他的威望太高，所有重大问题部长们都请他做最后决定，没有形成接班的明显人选，加之尼赫鲁本人不主张事前指定人选，结果，尼赫鲁逝世后，围绕接班人问题党内出现了纷争。尼赫鲁逝世后，能够继任总理一职的有两个人选：一个是前财政部长莫·德赛，他当时年近70岁，在党内是一位饱经忧患的资深领导人，他本人也宣布要竞争总理职位。但是，不久前刚从南方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任上当选为国大党主席的卡玛拉季却联合党的地方实力派排斥德赛。他们认为德赛资格老，威望高，能力强，性格固执，不容易听得进不同意见。如果德赛当总理，他们就没有办法插手中央的决策了。因此，他们主张由另一位候选人、58岁的不管部部长夏斯特里接任总理，结果，德赛被说服放

弃竞争总理职位，国大党议会党团一致选举夏斯特里为国大党议会党团领袖，经总统任命，于 1964 年 6 月 9 日继任总理。国大党执政后，第一次领袖接替的问题看起来似乎平和地解决了，但是，国大党内部领袖交替的问题也同时暴露出来了。由于在中央、在尼赫鲁周围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结果挑选接班人这种本该由中央领导核心做的事，却只能任由地方实力派操纵。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党内形成了力图操纵中央决策的地方实力派小集团，被称为“辛迪加派”，他们通过控制党魁操纵政治。这对后来的政治发展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可以说是埋在国大党身下的地雷，后患无穷。党内的纷争和内讧由此拉开了序幕，直至导致党的分裂。

夏斯特里继任总理后，邀请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入阁，担任新闻和广播部长。尼赫鲁在世时，就让女儿英迪拉·甘地在自己身边料理事务。英迪拉年轻时留学牛津大学，1941 年回国，随即参加国大党活动，独立后担任父亲的秘书，经常随父亲参加国际会议和出国访问。1955 年被选进国大党工作委员会。1959 年担任过 11 个月的国大党主席，在政治上逐渐成熟，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

1966 年 1 月 11 日，夏斯特里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让人措手不及，这使国大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再次面临挑选领袖的困难局面。这次出来竞争总理职位的又是德赛，他发誓决不放弃总理一职。可是辛迪加派及其他国大党的领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阻止德赛上台。这次他们把目光投到了英迪拉·甘地身上。结果在国大党议会党团的选举中，英迪拉得 353 票，德赛获得 169 票。就这样，年仅 48 岁的英迪拉·甘地成为印度共和国的第三任总理、第一位女总理和尼赫鲁家族的第二位总理。

英迪拉·甘地继任总理后，起初由于缺乏执政经验，她颇为小心谨慎，显得魄力不足。但她善于在实践中学习，积累经验，很快她处理问题的能力就显示出来，雷厉风行和果断成了她办事的风格。“英·甘地就任头一年政绩斐然。国大党内那些对她的能力抱

怀疑态度的人，也对她增加了信任感。而以为这个年轻的女总理好驾驭的辛迪加派，对她初步显露出的才华感到吃惊，对其办事锋芒的锐利颇有疑惧。党内外尽管对她的政策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对她具有政府领导人的才能则很少人再怀疑”。^①

1967年2月，在印度第四届人民的选举中，英·甘地在国大党面临着极大困难的情况下，领导本党取得了胜利，由她组成了新一届政府。

然而，踌躇满志的英·甘地却不得不与党内的辛迪加派和右翼保守势力周旋乃至摊牌，她渴望在执政党中建立起自己不可动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她不想向任何人妥协，国大党的分裂在所难免。在1967年国大党年会上，辛迪加派成员之一尼贾林加帕当选为党的主席，他指定的工作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属右翼和辛迪加派。英·甘地提名的几位左翼候选人均被拒绝。英·甘地为了摆脱辛迪加派的控制，为了增加在与辛迪加派交锋中的政治资本，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政策。结果，党内纷争加剧，辛迪加派和右翼公开反对英·甘地的政策。

例如，英·甘地提出的对大银行实行国有化的政策，就遭到代表党内右翼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德赛的抵制，他甚至公开说：“只要我是财政部长，这件事就不能实行；如果总理非要做，她就自己当财政部长吧。”^②英·甘地毫不示弱，1969年7月18日她宣布解除德赛财政部长的职务，自己兼任财政部长，但仍希望德赛留任副总理一职，德赛拒绝留任，退出内阁。

与辛迪加派的摊牌则因总统的去世而提前到来。1969年5月，总统胡赛因病去世，需要选举一位新总统。在选举总统的过程中，国大党内英·甘地与辛迪加派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在国大党内提名总统候选人时英·甘地就与辛迪加派针锋相对。辛迪加派为加

^① 林承节著：《印度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2页。

转引自林承节著：《印度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0页。

强自己的地位，提名其成员桑吉瓦·雷迪为候选人。英·甘地认为辛迪加派的目的是利用总统权力牵制她，便提名贾·拉姆为候选人。结果在党内表决时，雷迪得到多数票。在总统选举时，作为党的领袖，英·甘地没有支持本党的候选人雷迪，转而支持现任副总统吉里作为独立候选人竞选，同时，号召国大党的两院议员和邦立法院的议员不要受任何约束，只凭良心投票。结果，吉里当选。

看起来，在与辛迪加派和德赛的争斗中，英·甘地占了上风，但是，党内矛盾和积怨却越发深厚了。辛迪加派和德赛不肯就此罢手，他们利用其在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中的微弱优势，对英·甘地实行党纪惩罚。1969年11月12日，他们宣布英·甘地被开除党籍，同时，要求国大党议会党团重新选举领袖，一心要把她从总理位置上拉下来。国大党议会党团的282位议员中，有220人投票支持英·甘地，其余62人另行组成议会党团。由此，国大党的分裂既成事实。同年12月，英迪拉派在孟买召开国大党年会，选举贾·拉姆为主席。国大党正式分裂。从此，国大党英·甘地一派被称为国大党执政派，另一派被称作国大党组织派。

国大党的这次分裂，不仅党元气大伤，还造成了整个国家人们观点上的不一致和政治倾向的转变。同时，英·甘地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变得更加强硬和专横，政策也更加趋于激进。党内民主越来越缺乏了，而党内专制的传统却用到了极限。

国大党早年就没有建立起党内的民主机制。尼赫鲁当权时，凭借个人威望牢牢掌握着党的领导权，在党内搞平衡、分配权益、调和矛盾，使自己成为哪一派都不可或缺的人物。但他的过分集权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他的一位内阁部长就曾把他比作大榕树，说在这棵大榕树底下成千的人可以遮荫，但万物皆不能生长。英·甘地任党主席后，经过残酷的党内斗争，她感到自己的权力地位不稳，更加集权地把决策圈子缩小到她和她的两个儿子以及几个亲信，使这种专制达到了极点。当时流行这样的说法：“英迪拉即印度，印度即英迪拉”。1975年她被控告在1971年大选中犯舞弊罪，法院判决剥

夺她议员资格 6 年 ,6 年内不得担任任何选举的职务。部分国大党议员联合 5 个反对党趁机让她辞去总理职务,他们到处组织示威游行,宣称英·甘地已没有资格担任总理,并要求总统立即撤销她的职务。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国大党(执政派)内部的分歧加剧。党内的少壮派要求英·甘地与反对党谈判,做出政策调整以化解矛盾,在遭到拒绝后,转而要求英·甘地在党内让贤;党内原本支持英·甘地的一些资深领导成员也转到要她辞职的立场上。

在这种内外夹击的情况下,英·甘地毫不示弱,为了自保,她要求总统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并且先斩后奏,1975年6月25日午夜,在总统签发了紧急状态法令后,她才在26日清晨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告知内阁。在紧急状态宣布后,政府采取了过激的行动,短时间内逮捕了10万多名持不同政见者,其中包括几乎所有党内反对势力的头面人物和反对党的重要领袖,到1977年3月18日,还有34630人被关押在监狱里。政府还颁布了新闻管制令,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同时宣布禁止26个政治组织活动。英·甘地还使议会通过了两项宪法修正案,禁止法庭受理任何有关实施紧急状态的起诉,总理在任期间,免除对总理的任何诉讼。

这是印度独立以来第一次由于政局不稳实行国内紧急状态。此举对英·甘地来说,虽然保住了自己的权力,但却不得人心。这一时期被称为印度的一段“黑色历史”,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政治后果,削弱了国大党的执政基础。对此,所有反对党都表示愤怒和同声谴责。如印共(马)领导人 A. K. 戈帕兰就指出:“国大党对政权的垄断受到威胁,英·甘地在党内和政府内的地位受到威胁,这才是实行紧急状态的直接原因。”他还说:“此举使议会民主被一党独裁取代,所有权力都集中到一个领导人手里。局势的这种突然转向,从民主向独裁的急促转变是执政党摆脱危机、保持自己统治的一种手段。”^①

紧急状态的实行，不仅反对党群起而攻之，同时还引发国大党（执政派）内部的再次分裂。党内资深领导人之一、农业部长贾·拉姆宣布辞去政府职务并退出国大党。他在解释自己退党的原因时说，他再也不能容忍英·甘地的独裁倾向了。同时退出国大党的还有精明能干的政治家、北方邦前首席部长 H. N. 巴胡古纳以及奥里萨邦前首席部长南迪尼·萨特帕蒂。他们刚刚迈出英迪拉国大党的门，便立即组织了一个新党，名曰民主国大党，旋即加入了人民党的阵营。他们的行为对国大党（执政派）无疑是重重的一击。

终于，恶果落在了国大党（执政派）头上。在 1977 年 3 月议会选举中，国大党（执政派）败北，这是国大党自执政以来第一次被击败，成为在野党，印度人把它称颂为“投票箱引发的革命”。在同年 10 月举行的 10 个邦议会选举中，国大党也都以失败告终。国大党长期执政，倚老卖老，故步自封。长期执政使国大党的各级组织普遍产生了自满情绪，使其在历史上失去了许多本可以自我更新的机会。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多数国大党领导人，虽然也发现了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但他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漠视了脱党行动和党内纷争给党所带来的危害，天真地认为国大党的统治地位会理所当然地延续下去。而其他新生的党派则借机迅速壮大，并利用国大党的政策失误和人民不断增长的不信任情绪，为自己赢得了选票。如印度人民党是为应对 1977 年 3 月的竞选，由多个党派联合而匆匆成立的，其中包括国大党（组织派）、人民同盟、印度民众党、社会党和国大党（执政派）中的少壮派持不同政见者，这个党成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击败英·甘地，夺取政权。其竞选宣言强调这次大选对印度人民来说是在“民主与独裁”、“自由与奴役”间作出选择。其竞选口号是“自由与面包”。在短短的时间内，该党就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第二大党，与国大党分庭抗礼，并进而取而代之，成为执政党。

面对大选的败局，英·甘地虽然愿意承担全部责任，但是却无法挽救党内的再次分裂。1978 年初，国大党（执政派）再次分裂

为两个党，两个党都宣布自己是正宗。从此，印度政坛上有了——一个由乌尔斯领导的国大党，简称国大党（乌），一个由英·甘地领导的国大党，简称国大党（英）。

国大党（执政派）的再次分裂，让英·甘地痛下决心，重整旗鼓，积蓄和扩大力量，以求东山再起。她回到了人民中间，奔走各地，接见党员，访问群众，召开各种会议，所到之处她那独特的风格和魅力似乎让“人民在瞬间就原谅了她”，她又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和爱戴。1978年11月她再次当选为议员，重返人民院。时隔不久，在1980年1月的第七次人民院的竞选中，英·甘地的国大党大获全胜，英·甘地又一次走进阔别了34个月的总理府。

英·甘地第二次执政后，因痛感权力失而复得的艰难，因此对权力更加执著，她把党政大权完全集中在自己手里。她不是从自身的方面去总结过往的几年里她的主要同僚离她而去的原因，相反，她不再相信高级同僚中的任何人。她总是疑神疑鬼，觉得自己被那些她曾“信赖”的人给“出卖”了。她倾力清除政府部门中占据要职但她不够忠诚的官员，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有能力、诚实正派的官员受到了冷遇；而一些被证明缺乏才能的官员，却因对英迪拉的“忠心不二”被任命担任重要和敏感的职务，一批唯唯诺诺的人进入了她的内阁，这些人对她言听计从。英·甘地变得更为偏执，除了亲生儿子外，她不再信任任何人，她的所作所为看起来是决意要把一个政党“完全置于她和她儿子的控制之下”。她开始着力培植他的两个儿子，“党内人士过去向英迪拉宣誓效忠，经常是一天几次。现在他们随风转舵地改了宣誓内容，同时向英迪拉和她的‘家族’表达忠诚。”^①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迪拉的小儿子桑贾伊就被推选为她理想的、也是当然的接班人。英迪拉第二次出任总理后，更是处

〔印度〕因德尔·马尔豪特拉著：《英迪拉·甘地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235页。

心积虑地为他的升迁创造条件，让桑贾伊担任印度人口最多、政治地位最重要的北方邦首席部长的活动很快便展开了。1980年6月23日，33岁的桑贾伊又被任命为国大党总书记之一。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仅仅20天后，桑贾伊就因飞机失事，突然死亡。英·甘地在巨大的悲痛中，又把原本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大儿子拉吉夫召回身边，并努力为他创造步入政坛的条件。一年后，拉吉夫当选为议员。从此，英·甘地就让他总管自己的一切内外联络，代表她去各地视察工作，听取汇报，传达她的指示，其用意显而易见，是让他尽快熟悉政务和人事，了解下情，并参与决策。这样历练了两年后，拉吉夫又被任命为国大党总书记之一，负责党务工作。对英·甘地这种不遗余力地培植家族势力的做法，党内外议论纷纷，颇有微词，但是，英·甘地却一意孤行，此时的国大党（英）作为执政党已经完全成为她个人独裁的工具。

1984年10月31日，英·甘地遇刺身亡。她的儿子拉吉夫·甘地继任总理和国大党领袖。他的执政虽然为印度政坛带来了一股清风，但是，他却没有力量把自己的党带出泥潭。在1989年的第九次人民的选举中，国大党又一次席位不足半数，最终没能组成政府，拉吉夫政府下台。接着拉吉夫又在1991年第十届人民的竞选中遇害身亡。拉吉夫去世第二天，国大党领导人选举索尼娅出任国大党主席，期待她在因拉吉夫遇刺而中断的选举中博取同情票。但索尼娅拒绝了。她的理由是：“这个降临在我的孩子和我自己身上的悲剧使我无法接受国大党主席职务。”

国大党群龙无首，虽然在这次选举中国大党排名第一，但也只得到37.3%的选票，与其他党合作，勉强成立了以拉奥为总理的国大党政府。但是，在拉奥任上，国大党又一次发生分裂。1995年以北方邦首席部长纳拉因·达特·蒂瓦里和前联邦政府人力资源发展部长阿琼·辛格为首的一批人另立新党。更有甚者，在1996年举行的第十一届人民的选举中，在国大党的传统地盘泰米尔纳杜邦，邦国大党的主要领导人率先起事，集体造反，抵制国大党中

央确定的该邦竞选联盟，他们组织自己的竞选联盟与之抗衡，结果，国大党在该邦的 39 个议席全部丢掉。

也就是在 1996 年的这次选举中，日趋衰落、内讧不断的国大党被多数选民冷落，得票率只有 28.8%，成为在野党。

在 2004 年的大选中，下野 8 年的国大党总算有了转机，再次上台执政，但是，困扰国大党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国大党的希望还是寄托在甘地家族的身上。拉·甘地的遗孀索尼娅·甘地，在她丈夫去世 6 年后，迫于党内的一再恳请，勉为其难地出山，承担起拯救国大党的重任，并奋力带领国大党赢得了 2004 年的选举，但她却不愿出任总理，结果在国大党内又引起一场风波，党内的一些重量级人物为劝说她接受总理职位，竟然以党的分裂相要挟。最后党内资深政治家辛格出任总理，暂时平息了风波。

综上所述，一个领导着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百年大党长期以来把党的命运维系在一个家族、一个人的身上，党内没有正常的民主氛围和领袖交替机制，由此而来的必然是党内无休止的纷争、分裂；领袖的独裁、专权；党组织的瘫痪和无所作为；党员醉心于个人的升迁，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见风使舵，最终党走向蜕化和衰败的进程几乎是在所难免的。

三、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腐败之风兴盛，致使民众怨声载道，国大党的形象和声誉受损，执政的合法性不断因此受到质疑

印度国大党从执政之初就开始孳生腐败现象，多少年来，这种现象不断地扩展，到 20 世纪 60—70 年代腐败已经蔓延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层出不穷的腐败丑闻，对国大党打击深重，但是，国大党始终没有进行有效的治理，直到拉吉夫·甘地执政时，似乎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采取措施，希望能在消除腐败、提高政府

效率方面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并因惩治腐败，提倡“廉洁政治”而获得了“廉洁先生”的美名。不幸的是，这位“廉洁先生”也被纠缠到“博福斯”受贿案中而有口难辩，备受打击。

印度国大党执政后，推行国家主导的混合经济发展模式，实行国家对经济的严重干预政策，为政治家和公务员提供了新的贪污机会。贪污在每一个层次上蔓延，人们为了接上电、买火车票或公共汽车票，为获得别的常规便利，必须进行贿赂，这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更不要说企业家和商人贿赂政治家和官僚的事了。到英迪拉时代，官员受贿、权钱交易愈加猖獗。“国家对私人经营活动的严格控制给了主管部门官员以极大的权力。他们可以很快批准某项申请，也可以寻找理由拒绝批准或无限期拖延，这时有没有贿赂往往成为决定性因素。贪婪的商人（包括外国大公司）眼睛总是盯住需要大量采买物资的主管部门和有权发包工程、有权签订贸易合同的部门，总是想方设法进行贿赂，或向掌权的政党‘捐赠’，或向负责官员送礼，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获得回报，得到工程或订货的合同单。收受贿赂是‘黑钱’的一部分。所谓‘黑钱’就是未列入国民收入统计的非法收支。除贿赂金外，还包括偷漏税款、走私、贪污、非法佣金、非法国外存款等”^①。

在一个竞争性政党体制下，要保持一党的长期执政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竞选是需要强大的资金来支持的。因此，筹措政党经费，是执政党腐败的又一个领地。尼赫鲁在世时，为保持自身的名声，他有一条原则，并曾就此告诫过英迪拉：永远不要在为自己的党募集资金时玷污了自己的手指头。尼赫鲁总是把这项工作交给一个杰出的领导人去干，他自己从不参与，以免产生舞弊行为。英·甘地执掌政权后，资金筹措变得压力越来越大，因此，她的做法与他父亲的完全相反。她对资金的募集和分配实行严格的控制，常常自己亲自出马筹资，结果闹得满城风雨，人们议论纷纷：“装

满现金的提包”被直接带进总理的家里。更有人在法庭作证时说过“她”甚至没有归还提包”。

英迪拉为她的党筹集竞选资金的积极作为，既败坏了她自己的名声，也败坏了党的名声。以前，捐赠者捐给国大党资金是为了赢得执政党的善意，是一项一般性的投资，在赠与和官方倾向上没有直接的联系。英迪拉掌权后，捐赠被政治交易的方式取代了。那些捐献巨额资金的人希望官方不时地对他们施以恩宠。有一个例子被认为是国大党作为执政党筹资方式的典型：英迪拉请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佩特尔帮忙筹集资金，以用于 1974 年 2 月在北方邦和奥里萨邦的邦议会选举。佩特尔于是就要求这个烹调油工业处于主导地位的邦的“油王”上交必要的捐款，交换的条件是“油王”可以在烹调油持续短缺、严重供应不足的状况下，随意提高烹调油的价格。对佩特尔，英迪拉的态度也很暧昧，她从心里不喜欢这个人，对他的许多习性嗤之以鼻，但是，既然他能搞到钱，她便容忍他的作为。于是，腐败现象、英迪拉的党与“囤积投机者和获暴利者”的瓜葛就成为众矢之的。老百姓普遍相信执政党与“黑钱”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关系，英迪拉政府的道德形象大受损害。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英迪拉听到这些议论后，一点也不生气，仍心平气和地说，老百姓之所以这么想，都是因为确实有人“贪污了大量黑款”。

吏治腐败更是令人瞩目，从英迪拉的小儿子桑贾伊的所作所为便可见一斑。桑贾伊早年从英国留学肄业回到印度后，在一家汽车修理部工作，该公子有一大爱好，喜欢把“那些中途退学者、流浪汉和无赖们”吸引到自己周围。他年轻气盛，待人傲慢无礼，办事考虑不周，对待母亲的同僚及其他长辈也非常粗鲁，但是，仰仗母亲的庇护，他青云直上，很快成为青年国大党的领导人，实际上控制着执政党中年轻的一派。在桑贾伊的率领下，“这些甚至连最基本的政治行为规范都一窍不通的年轻人，却圆瞪着眼睛，全神贯注地搜寻各种各样的机会，以实现两大目标：利用浑身蛮力效忠于主

子以及不失时机地攫取任何可以到手的物质财富。”^①当桑贾伊明确成为其母亲的继承人时，由他一手从“青年国大党”中提携起来的年轻人更是聚集在他的周围，希望能拉着他的衣襟平步青云，从此享尽荣华富贵。当桑贾伊处于权力顶峰的时候，部长们和高级文官们争相执行他的命令，不论那些命令有多么武断。地方的首席部长们甚至争先恐后地献媚于桑贾伊，邀请他到自己的邦，安排盛大的欢迎场面，仿佛他是个凯旋的英雄。那些不愿同流合污的人很快就遇到了麻烦：政治家被撵出政坛；“不顺从”的官员被解职。只要桑贾伊看不惯的人，政府的调查和执法机构便会去找他们的麻烦。在党内为了培植亲信，桑贾伊把国大党提名议会候选人的大权抓在自己手里。他的亲信，其中许多人属于品质恶劣的打手类型的人，都被安插作候选人，这样，有些本该呆在监狱里穿囚衣的人，却堂而皇之地坐在人民院或联邦法院的交椅上。而一批正直的不对他阿谀奉承、性命是从的人的名字则被从候选人名单上删除。

在地方和基层，国大党的腐败更是有恃无恐，在邦党组织一级甚至盛行利用黑社会势力捞钱拉选票的腐败风气。有这样一件事，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国大党地方和基层组织中的乌烟瘴气。英迪拉曾一度试图通过党内选举，使基层党员在将来的权力结构中享有一份发言权，并给党内她的追随者注入一些活力。但这种选举却没能进行下去，而且不得而被取消。因为在选举中常常出现“假冒成员”、“罪恶昭著的威胁”、“集体贿赂”和“阶层操纵”等现象。

在英迪拉时代，“毫无节制的腐败”成为印度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愤怒的控告与反控告的拉锯战。而英迪拉对此颇能泰然处之，见怪不怪。直到拉·甘地执政后，才痛下决心清除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腐败。

20世纪80年代，拉吉夫接手的印度，政治腐败和行政效率低

〔印度〕因德尔·马尔豪特拉著：《英迪拉·甘地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页。

下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拉吉夫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很希望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状况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执政的国大党，因为在各种腐败的勾当中，国大党是最大的受益者，人民的不满和愤怒也主要是指向国大党的。国大党是执政党，而且是多年的执政党，它手中掌握着政治资源，国大党的政治主张、民主作风和干部素质决定着政府的施政效能。从尼赫鲁领导的国大党执政以来，国大党对印度国家发展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国大党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自身在蜕化，党内民主的丧失，党员素质的降低和腐败之风的日益兴盛，这些弊端都通过它的执政地位直接带到了政府系统，党内的的问题变成了政府的问题。于是，拉·甘地以国大党主席的身份提出，国大党作为执政党在提出廉政要求的时候，必须革新自己。

1985年12月，国大党在孟买举行成立百周年的庆祝大典。拉吉夫出人预料地没有按照传统为党歌功颂德，相反，他在致辞中猛烈抨击党内的腐败现象。他说，作为一个执政党，国大党“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党内存在着一个“权力经纪人”他们利用窃据的职位，以权谋私，玷污党的名声，破坏党群关系，成了党内蛀虫。他说：“这些根深蒂固的党阀把国大党组织变成了空壳，以前所有的服务精神和牺牲精神都被蛀空。……我们嘴里讲的是崇高的原则和理想，说这些是建设强大和繁荣的印度所必需的，但是，我们置规章、纪律于不顾，缺乏公共道德，没有社会责任感，不关心公共福利。腐败不仅被容忍，而且被视为本领强。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恬不知耻做法竟然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每一步，我们的行为都与我们的目标冲突；而在每一个方面，个人贪欲的追求都使我们所承担的社会责任遭到损害。”^①

但是，积重难返，已经蜕化了的国大党并没有因此而觉悟、警醒。党的许多官员不是把注意力用在领会拉吉夫的讲话精神，进行

自我反省，为党的前途命运着想上，而是私下议论纷纷，猜测所指的经纪人是谁。更有不少国大党中有影响力的人物质疑拉吉夫的讲话合不合适，甚至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国大党领导人中的保守派，从中央到地方以各种借口对拉吉夫的改革消极怠工，百般阻挠，不但在党内改革问题上阳奉阴违，而且对其他方面的改革也通通以不利于国大党选举为由不予支持。在党内这种强大的压力和阻力下，拉吉夫虽然为廉洁政治、清除腐败、整顿党风做出过极大的努力，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更让拉吉夫难堪的是，贿赂丑闻的揭露，很快落在了他的家族和他自己头上。第一桩被揭露的受贿案是，在印度购买德国舰艇的交易中有人受贿，调查牵涉到英·甘地。第二桩是轰动一时的博福斯丑闻。博福斯是一家瑞典军火公司。1986年3月，国大党政府与瑞典达成一笔军火交易，价值13亿美元，由双方总理签署合同。1987年4月，瑞典国家电台和国家审计局先后披露，在这笔交易中，印度人接受了5000万美元的回扣。同年10月，《印度教徒报》以独家新闻报道说，回扣落入了政府官员及国大党权贵之手，其中一部分到了国大党的财库。国大党多方辩解，但是都未能说服选民。反对派借机大肆渲染，拉吉夫深陷泥潭，结果导致国大党在随后到来的选举中失败。

20世纪国大党的最后一届政府——拉奥执政时期，“哈瓦拉”贿赂丑闻又被曝光，贿赂金额达到1900万美元，几乎牵涉到国大党政府一半的部长，拉奥内阁的7名部长为此引咎辞职，此案还涉及115名政治家和高级政府官员，拉奥本人及其亲属也卷入腐败丑闻，拉奥成为印度第一个面对刑事审查的总理。

政治上的恶性腐败极大地败坏了国大党在人民中的声誉，每逢大选，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政治腐败上，反对党更是借机造势，国大党执政的合法性一次又一次地受到质疑，直接动摇了国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政党执政的历史一再证明，一个腐败的政党和政府，其寿命是不可能长久的，印度国大党也终究脱逃不

了历史的法则。

今天的印度国大党，已经风雨兼程地走过了 120 年，并开始了在野 8 年后的又一次执政，据称该党现有初级党员 3000 万、积极党员 150 万。在人民的选择中，她又肩负起历史的重任，并承诺要把印度建设成为一个政治团结、经济强大、社会公正、文化和谐的社会。她能否不辜负人民的期望，能否兑现自己的诺言，能否再创往日的辉煌，取决于各种因素，而她过往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一切更多地将取决于党的建设和执政能力的提高，取决于这个百年老党能否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对此，人们拭目以待。

第五章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 “一党独尊”的世纪终曲

2000年7月2日，墨西哥6年一度的总统选举结果公布：革命制度党候选人拉瓦斯蒂达获得13576385票，占总票数的36.10%，以241.2万多票、6.42个百分点之差输给由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和绿色生态党组成的“变革联盟”的候选人福克斯。福克斯当选为墨西哥现代史上第一位反对党总统，革命制度党在连续执政长达71年后首次失去总统职位，成为墨西哥第一大反对党，从而使墨西哥国内政治格局从官方党“一党独尊”转变为国家行动党、革命制度党和民主革命党三足鼎立的局面。由此，在世界政党政治史上，又一个大党、老党因为失去政权而吸引了世人关注的目光。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作为执政党，曾有过辉煌的政绩。对墨西哥来讲，20世纪是革命制度党的世纪。从1929年到2000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领导这个国家走过了71个春秋，曾经创造了令众多学者和政客赞叹不已的“墨西哥奇迹”：一个是政治奇迹，当拉美大多数国家政局动荡、政变频繁、军人独裁统治时常出现时，墨西哥的政治发展比较稳定，政权交替和平有序，军事政变销声匿迹；另一个是经济奇迹，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初，由于历届政府都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墨西哥经济结构通过调整得以优化，国民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在这40年里，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高达6.7%，其中，1946—1956年墨西哥国内生产

总值年均增长率为 6.1%。1957—1970 年为 6.8%；1971—1982 年为 5.2%。“墨西哥奇迹”大大加速了墨西哥现代化的进程，使墨西哥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

然而，进入 80 年代后，革命制度党的辉煌渐渐地变得暗淡起来。1982 年墨西哥爆发了债务危机，1994 年初恰帕斯印第安农民发动武装暴动，同年的 3 月和 7 月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科洛西奥和党的总书记马谢乌相继遇害，1994 年底、1995 年初又爆发了金融危机。面对这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危机，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似乎已垂垂老矣、无力回天，民众支持率一路走低。在 1982 年以前的历次大选中，革命制度党的得票率都超过 70%，牢固地控制着各级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然而，80 年代以后，党的影响逐步下降。在 1988 年大选中，革命制度党的总统候选人萨利纳斯得票仅为 50.3%，刚够半数，勉强当选；同期，在参、众两院，革命制度党也失去了一些席位。在 1991 年的议会选举中，党的得票率有所回升，达到 61.43%。在 1994 年的总统选举中，党的总统候选人塞迪略得票第一，但仅占 48.77%，是 1929 年该党成立以来得票率最低的一次。在 1997 年参、众两院的选举中，革命制度党在参议院 128 个席位中获 77 席，而在众议院 500 个席位中仅获得 238 席，第一次在众议院中所占席位不足半数。终至在 2000 年总统大选中，革命制度党候选人拉瓦斯蒂达败给反对党候选人福克斯，从而结束了革命制度党“一党独大”的执政史。

那么，这个拉美地区的第一大党缘何在这次大选中遭到惨败呢？要深究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由盛到衰、直至下野的缘由，首先要了解革命制度党这些年来走过的历史轨迹。

一、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执政历程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作为执政党的历史是从 1929 年开始的，根据其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和名称变化，到 2000 年下野，其执政

历程可分为三大发展阶段：国民革命党时期、墨西哥革命党时期和革命制度党时期。

（一）国民革命党时期（1929年3月—1938年3月）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成立于1929年3月4日，前身是国民革命党。墨西哥在经历了1910—1917年的墨西哥革命和制定了《1917年宪法》以后的十几年中，仍然处在动荡不安的境地，宪法并没有得到遵守，一切都还处在“考迪略”的控制之中。所谓“考迪略”，即地方军阀和地方首领，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动辄以兵戎相见。每到临近选举，就必有一场争夺权力的军事暴乱，政局始终不能稳定。为了稳定政局，在1917年宪法精神的指引下，墨西哥逐步实现了军队、教会和大学的制度化。但1928年7月26日再次当选为总统的奥夫雷贡（1920—1924年曾任墨西哥总统）在拉邦比利亚饭店被一名狂热的天主教徒杀害，墨西哥又一次陷入权力真空的危机之中。为了摆脱这次危机，同时也为了摆脱几年一度、始终折磨着墨西哥的政权交接危机，继任总统卡列斯深感只有实现政权交接工作的制度化，才能彻底结束“考迪略主义”。为此，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凌驾于所有“考迪略”之上的政治机构，以解决“考迪略主义”“人存政存、人亡政乱”的不稳定循环问题。于是，在卡列斯倡议下，1929年3月创立了墨西哥国民革命党。这是一个在卡列斯领导下，由全国大大小小的“考迪略”和地方党派联合起来而组成的官方党，是一个职业政治家的党。它的诞生使墨西哥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以一个全国性政党取代“考迪略”纷争、文人政治取代军阀统治的时期。国民革命党将全国各地的“考迪略”都纳入到麾下，原来一般要通过“考迪略”之间武力较量来解决的政权交接问题，现在可以在党内通过和平、合法的办法协商解决；“考迪略”的个人领导地位已由政党的领导地位取代了。在1929年的总统大选中，该党的总统候选人波特斯·希尔获胜，开创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执政史。

考虑到国民革命党过于松散，各地“考迪略”仍各自为政，“最高领袖”卡列斯在 1933 年又进行了两项改革：其一，重新修改宪法，恢复总统和州长不得连选连任的竞选规则，从而打破了地方“考迪略”长期垄断政府的局面，有利于中央政府在候选人协商中通过官方党扩大控制和选择的余地；其二，在国民革命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修改了党章，把“集体入党制”改为“个人入党制”，并限定在 6 个月之内重新登记入党，从而强化了党的组织纪律性，淡化了地方集团的权力影响。

（二）墨西哥革命党时期（1938 年 3 月—1946 年 1 月）

国民革命党成立以后，虽然“考迪略”的军事政治斗争开始纳入法制轨道，但墨西哥的政治制度还不是真正按宪法办事的宪政制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总统机构的职能和作用还没有制度化。真正的政治权力并没有掌握在合法总统手里，而是掌握在“最高领袖”卡列斯手中。所以，这个时期在墨西哥的历史上被称为“最高领袖统治时期”。究其实质，这种超法制权力的统治方式，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考迪略主义”政治。二是工农运动和工农参政还没有制度化。由于“迟发展效应”的作用，墨西哥的工农运动已超前发展起来，但受到各地“考迪略”的操纵和控制，这种迹象表明“考迪略主义”又有抬头的趋势。所以，工农运动的制度化和工农参政的制度化对于消除“考迪略主义”，确立宪政民主制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当时的国民革命党只是一个地方“考迪略”和地方党派的组织，排斥工农的加盟，这说明党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而，1938 年 3 月，该党的时任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对国民革命党进行了第一次改组，将党更名为墨西哥革命党。

墨西哥革命党的成立是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墨西哥工农运动发展的结果，是墨西哥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的政治改革。这次改革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在思想上确立了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墨西哥从

独立革命开始的历次政治革命，都是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卡德纳斯第一次把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作为党的思想纲领，提出了“革命民族主义”、“社会平等”和“全面民主化”的政治主张。这种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特点，既反映了时代特征，又准确地把握住了社会主要矛盾，因此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欢迎，为墨西哥革命党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二是在组织上建立了职团主义的结构体系。将工人、农民、民众和军人4个非地域性职业社团编为党的4个职业部门——工人部、农民部、人民部和军人部，由全国执行委员会实行集中领导。恢复“集体入党制”，只要加入党的4个职团部门，就是墨西哥革命党的党员。卡德纳斯对革命制度党最具根本性的改造就是建立起了党的职团主义组织体系，首次把包括工农在内的广大民众纳入官方党。经过改革，革命制度党已由地方“考迪略”和地方党派的联合机构转化为中央集权的、职团结构的执政党。墨西哥革命党的这种职团结构，对于宪政制度的确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一，党的工人部、农民部和人民部都有从基层到中央的垂直组织系统；其二，进一步把军队引入制度化的轨道。20世纪40年代，在卡马乔总统和阿莱曼总统执政期间，墨西哥革命党面对外来的挑战和内部的纷争，又进行了三次重大而深刻的改组。

由于卡德纳斯推行激进的经济政治改革，其中包括土地改革、铁路和石油国有化、发展工农组织、强化国家的行政权等，引发了一系列的危机。首先是经济危机。由于卡德纳斯的工业化政策主要依靠政府的投资，造成政府开支过大，财政赤字日益严重，从而引发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资本外流。其次是政治危机。由于政策激进，触怒了大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引发了1935年11月5000名“金衫团”团员的反政府事件和1936年2月6万人的示威游行。再次是选举危机。1940年大选前夕，官方党内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穆希卡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另一派是以希尔为首领的“恢复秩序派”。党内的斗争又引发了阿尔马桑将军借机分裂军队

分裂国家的严重危机。这次选举危机，使人们发现：尽管墨西哥已经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模式，但很不巩固；军人参政对于国家的统一和军队的团结危害极大。1940年12月卡马乔当选总统后，对党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改革内容主要有两项：（1）撤销军人部。虽然允许军人根据个人的阶级身份加入到工人部、农民部和人民部，但由于武装力量一分为三，军人发动政变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了。（2）提升人民部。在该党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人民部在党内的地位很低，力量不大，被人称之为“前妻的儿子”。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卡马乔推行以经济发展为首要取向的发展主义政策，积极改善同工农业资产阶级的关系，中产阶级的数量和实力快速增长，人民部也越来越受重视。在1943年的议会选举中，尽管人民部在数量上还是少数，但在党的领导机构和议会中却占据多数。人民部地位的提升，是为了抗衡工人部和农民部，从而达到控制这两个部的目的。

（三）革命制度党时期（1946年1月—2000年7月）

1940年选举中墨西哥革命党内出现的派别斗争，使党的领导人认识到：要想赢得1946年大选，党的总统候选人必须得到一个更加制度化的党的全力支持；必须避免党内各职团部门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影响选举的情况再度发生。同时，由于民众参政的要求不断增长和职业专门化趋势日益明显，官方党的职团结构很难满足日益多样化的利益要求。因而，1946年1月，该党第二次改组，并易名为革命制度党。这次改组主要有以下几项变化：（1）废除“集体入党制”实行“个人入党制”。个人能否入党再也不取决于是否已经加入某一个职团部门所属的组织。（2）重新规定了党的3个职团部门的作用，剥夺了职团部门的政治职能，强调党的政治职能只能通过党的领导机构来行使。（3）通过签订协定，迫使3个职团部门领导人承诺在选举中一致对外，不发生内讧。官方党的再次改组，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制度化，一个是集权化。通过削弱3个

职团部门的自主性，使之服从党中央（总统）的统一领导。

官方党的第二次改组虽然加强了权力集中，但同工农大众扩大参政的要求相抵触：它不仅大大削减了党内各职团部门的政治权力，也反对那些新生的、未加入官方党的利益集团参政。因此，这次改革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而且在墨西哥，废除官方党职团结构的条件尚不成熟。虽然党的职团结构在 1946 年的改革中几乎被废弃了，但其社会基础并没有什么变化，党员对其所属的职团的忠诚远远超过对党的忠诚，而职团部门的领导人常常利用这一条件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基于上述原因，在国会关于 1952 年党的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问题上，不但党内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而且引发了民众的示威游行。所以，1950 年 2 月，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又恢复了原来的职团主义体制和部门提名制度。通过这次调整，官方党仍然保留“革命制度党”这个名称，但党员则按其所属的组织或中心，或按其作为经济因素的个人特点，组成 3 个职团部门。因此，每个党员都有双重身份：作为其所属职团部门的成员和作为党的成员。而在任命各级选任职位候选人的工作上，也形成了至今仍然遵守的模式：“既考虑党的基层的更多参与，也考虑保证党的领导对选举的控制”。

至此，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组织体系和制度框架才最终形成并长期稳定下来，为墨西哥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二、2000 年大选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失败的原因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之路，或许正应验了中国的那句老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革命制度党之所以能由弱到强，在墨西哥连续执政长达 71 年，主要得益于：一是革命制度党能够制定和执行一套比较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二是革命制度党的职团主义组织体系最大限度地

团结了国内各阶级，使党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三是革命制度党灵活且包容性很强的意识形态，使党在思想上始终保持着优势和凝聚力；四是革命制度党有极强的党内外政治调控能力，它曾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军人干政，使其有效地避免了在拉美国家司空见惯的军事政变。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这些曾使革命制度党保持兴盛的优势渐渐地消退，革命制度党的辉煌也随之黯然。那么，导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衰败的原因何在呢？

（一）放弃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原则——革命民族主义，削弱了党的社会基础

革命民族主义是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虽然在1972年，该党的七大才正式把革命民族主义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但实际上，从革命制度党的前身国民革命党时期起，革命民族主义就已成为党的指导思想。20世纪30年代，卡德纳斯所推行的社会改革实践了革命民族主义的基本主张，因而，卡德纳斯被该党赞誉为革命民族主义杰出的先驱者。

革命民族主义的基本主张是：（1）在政治上，主张继承发扬墨西哥革命的传统，维护民族团结，协调阶级利益；（2）在经济上，主张建立国家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和个人私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3）在社会方面，主张通过个人劳动和增加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公正；（4）在文化方面，主张保护墨西哥多元的民族传统文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5）在外交方面，坚决捍卫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革命制度党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发展了民族经济，促进了社会稳定，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创造出“墨西哥奇迹”。

但是，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爆发以后，为了适应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需要，从德拉马德里政府开始，特别是在卡洛斯·萨

利纳斯执政时期，革命制度党逐渐放弃和背离了革命民族主义，以名为“社会自由主义”而实为新自由主义取代革命民族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尽管在塞迪略执政时期，革命制度党的十七大又决定重新举起革命民族主义的旗帜，摈弃社会自由主义的主张，但实际上，塞迪略所奉行的还是社会自由主义的政策。

社会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是：（1）政治上，主张通过政治改革和民主改革，维护民主和自由；（2）经济上，主张发展市场经济，推进私有化，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3）在社会政策方面，反对随意向群众许诺的民众主义和国家大包大揽的做法，主张通过“团结互助”实现社会公正；（4）在文化教育方面，主张既要保存和肯定传统文化，又要积极吸取各种外来文化，主张实行一种自由的国家教育制度；（5）在对外关系方面，主张国际合作与对话，减少对抗，积极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推动对外关系的多元化。

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背离了墨西哥革命的宗旨，过分强调经济自由，缺乏对社会问题的重视，再加上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导致社会财富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贫困化日益加剧，两极分化愈加严重，为社会平添了许多不稳定因素；由于党内实行新自由主义，使党在广大民众及党员面前丧失了其原有的、鲜明的特征，因而降低了党的感召力、吸引力和凝聚力；还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侵害了广大民众的利益，因而恶化了党同社会阶层的传统联盟关系，极大地削弱了党的力量。墨西哥《进程》周刊曾评论说，“德拉马德里开始敲响革命制度党的丧钟，萨利纳斯使党奄奄一息，而塞迪略葬送了党。”

（二）经济模式的调整和经济政策的失误，诱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危机，动摇了党的阶级基础

从 1821 年墨西哥独立至 2000 年革命制度党下台，墨西哥先后实行了三种经济发展模式：外向型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进口替代工业化内向发展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经济政策也相

应地不断加以调整。

1. 外向型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

1821年墨西哥独立后，曾长期实行外向型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墨西哥的出口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金、银等贵金属和铜、锌、铅、石墨等矿产品；另一类是咖啡、糖、棉花、水果、木材、牲畜、龙舌兰纤维等农牧业产品。在波菲里奥时期（1876—1911年），迪亚斯政府将传统的外向型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推到了顶点，实行“出口飞地模式”（*el modelo de enclave exportador*）。所谓“飞地”，就是指一国位于另一国境内不与本国毗连的领土。这里是指位于墨西哥境内，为外国人所有，由外国人经营，面向出口，与墨西哥本国其余经济部门相割裂的经济。“出口飞地模式”鼓励大量引进外国资本，积极发展矿业—铁路—农业的出口飞地经济综合体。一方面，它促使封建经济解体，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创了墨西哥早期的工业化。铁路的兴建、电力的使用、外资的流入、农矿业的发展标志着墨西哥工业化的起步。但这种工业化，不是自主型的工业化，而是依附型的工业化。另一方面，它保护了农村大土地所有制，却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展，堵塞了墨西哥向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由于社会财富的过于集中，贫富分化非常严重，政治和社会生活缺乏自由，人民生活条件日益恶化，使得民众不满情绪高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农村夺地斗争和武装暴动此起彼伏，终于导致了1910年墨西哥革命的爆发。

2. 进口替代工业化内向发展模式。

从20世纪初的墨西哥革命到20世纪30年代是墨西哥进口替代工业化内向发展模式逐步形成的时期。

1910—1917年的墨西哥革命和《1917年宪法》为墨西哥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墨西哥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因为墨西哥革命和1917年宪法不仅改变了墨西哥社会的阶级结构，随着迪亚斯独裁统治的垮台，以大庄园主、军阀和官僚买办阶级为核心的社会结构解体了，民族资产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

级；大地产制受到削弱，大批农民分得了土地，从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然而，由于革命后的历届政府没有积极贯彻《1917年宪法》的原则和社会改革纲领，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墨西哥的“出口飞地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加剧了墨西哥的困难形势：1929—1932年，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6%，矿业下降了45.2%，制造业下降了26.6%，商业下降了15.5%。这场危机充分暴露了墨西哥初级产品“出口飞地模式”的危害：危机期间，外资流入中断；世界市场对原料需求减少，出口价格下跌。这说明墨西哥的经济发展模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1934年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拉萨罗·卡德纳斯执政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实施土地改革。他根据1917年宪法和1934年制定的土地法典，打破大地产制，使80万农户分得了1800多万公顷土地；村社拥有全国47%的耕地；村社的人口从66.8万增加到160万。其次，进行了国有化改造。从1935—1938年，卡德纳斯先后颁布了《财富国有化法令》、《铁路国有化法令》和《没收石油公司财产法令》，没收了教会的不动产，将外国公司控制的铁路和石油收归国有，初步扭转了墨西哥经济过于依赖外国的局面，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再次，加大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扶植民族工业的发展。经过卡德纳斯政府连续6年的经济改革，彻底打破了迪亚斯时期的飞地经济模式，初步形成了进口替代工业化内向发展模式。

从20世纪40年代初到80年代初，墨西哥历届政府都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使墨西哥经济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其一，国民经济长期保持高速稳定的增长。1945—1980年，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高达6.7%。其二，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40年的25.1%增加到1979年的38.5%。墨西哥已从一个以生产农业和初级产品为主的农业国转变成为一个具有较完整工业生产体系的工业国。其三，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

化。城市人口、雇佣劳动者和中产阶级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的比重从 1940 年的 18% 增加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 50%；中产阶级在 80 年代初已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些明显的变化就是让人倍加称赞的“墨西哥经济奇迹”。

但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逐渐暴露出它的缺陷和不足：其一，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衡。政府过于强调工业化，忽视了农业发展。农业年均增长率在 20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和 80 年代分别是 2.7%、2% 和 0.8% 粮食从自给有余到需要大量进口。其二，外贸逆差日益扩大。虽然进口替代模式在替代消费品和中间产品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在替代资本货币方面收效甚微，工业企业的设备和原材料仍需大量进口。1977—1981 年，墨西哥外贸逆差由 13.6 亿美元增加到 49.7 亿美元。其三，政府干预过多。在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下，本国的工业投资水平低，产品质量差，成本高，技术含量低，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其四，外债迅猛增加。由于政府大包大揽需要大量资金，弥补外贸逆差也需要大量资金，所以，墨西哥除了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外，举借外债越来越多：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举借外债，但规模很小；70 年代，累计外债约 32 亿美元；1982 年达 860 亿美元。

1982 年 8 月，人们普遍担心的清偿债务危机终于爆发了。墨西哥政府因无力支付到期的 268 亿美元的债务，请求外国银行准予延期，在遭到拒绝后，墨西哥宣布停止偿还外债，无限期关闭全部外汇市场，国内的外汇存款一律转换成本国货币。酿成这次空前严重的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国内看，洛佩斯·波蒂略政府制定了以石油发展为支柱的“膨胀发展”战略，经济过热，开支过大，从而大量举借外债和发行货币，造成债台高筑，通货膨胀严重；从国外看，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世界经济衰退，国际市场上油价下跌，贷款利率大幅上升，同时，美国和欧洲加强了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墨西哥的外贸逆差剧增，经济陷入困境。1982 年债务危机爆发后，墨西哥的经济增长率降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

1982 年降为 -0.2%，整个 80 年代降为 1.5%；外债急剧增加，80 年代前期，每年外债还本付息额约占商品和劳务出口收入的 60%；通货膨胀加剧，通货膨胀率从 1981 年的 29% 增加到 1982 年的 98.8%；比索大幅度贬值，1982 年一年内比索三次大贬值，总计贬值 500%；投资下降，不少工程下马，企业倒闭，失业人数剧增。1982 年债务危机的爆发，表明进口替代工业化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墨西哥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实行根本性的转换。

3. 以出口导向为主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2000 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三届政府即德拉马德里政府、萨利纳斯政府和塞迪略政府都先后推行了以出口导向为主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1982 年债务危机后上台执政的德拉马德里、萨利纳斯和塞迪略三届政府一致推行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是通过调整经济模式，优化经济结构，尽快摆脱债务危机，走出困境；另一方面是为了减免巨额债务而接受了“布雷迪计划”。这三届政府在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中，对墨西哥经济进行了又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一，实行贸易自由化。通过进行外贸体制改革，逐步取消了进口许可证，减少了关税。其二，放宽对外资的限制。由于债务危机，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明显减少，资金短缺迫使政府放宽对外资的限制。其三，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改造。近 20 年里，除了电力和核工业以外的所有国有企业都实行了私有化。其四，实行金融体系私有化和国际化。不但大多数国有银行实行了私有化，而且比索由固定汇率制转变为浮动汇率制。

近 20 年来，革命制度党致力于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国民经济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在起伏不定中有所增长，进出口贸易额明显提高，国际储备数量剧增，通货膨胀大幅下降，外资数量逐渐增多等。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弊端也日益突出。在城市，由于对大多数国有企业进行了大

规模的私有化改造，使得私营企业主集团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大为膨胀，而中小企业却大量破产倒闭，失业工人数量剧增，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在农村，由于 1992 年墨西哥修改宪法，废除了“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停止了分配土地，彻底结束了土地改革的进程，使得大量分不到土地的农民涌入大城市，加入到劳动力后备大军中，有一部分走投无路的农民甚至揭竿而起，如 1994 年初发生的恰帕斯印第安农民暴动。

据统计，1980—1996 年，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2.07%，而同期人口平均增长率为 2.58%，经济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90% 的家庭收入减少。1989—1996 年，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 39% 增至 43%，赤贫人口从 14% 增至 16%，而占全国人口 10% 的富人拥有全国 80% 的财富。社会不公正现象日益严重，激起了广大民众对革命制度党及其政府的强烈不满。

由于经济政策失当，经济形势紧张，比索持续高估，进口快于出口，外贸逆差扩大；经济过分依赖外资，短期投资比重过大，金融风险加剧；美元利率上升，外资大量抽逃，最终导致 1994 年底 1995 年初，墨西哥爆发了震撼世界的金融危机。1994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给墨西哥经济造成 700 亿美元的损失。1995 年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6.9%，通货膨胀率高达 52%，国际储备最低时减少到 35 亿美元，外债总额达 1700 多亿美元，大批企业倒闭，城市失业率高达 6.8%。由于这次金融危机对墨西哥乃至拉美地区和国际金融市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许多墨西哥人尤其是对构成革命制度党阶级基础的工人和农民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经济改革未能调和各阶层的物质利益需求，使革命制度党失去了基层的支持；另一方面，工薪阶层的贫困程度不断加深，使政治反对派的力量进一步加强，造成了对革命制度党的直接冲击。革命制度党众议员马科斯·布西奥·穆希卡认为：“塞迪略总统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了革命制度党公众威信的下落，使

党在大选中失败”。

（三）职团结构功能弱化，削弱了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最大的特点是它的职团主义的组织体系。所谓“职团主义”，是把整个社会纳入国家指挥下的各种社团（或职团）的理论和实践。革命制度党的内部是按照三个部即工人部、农民部和人民部的垂直领导系统和横向协调系统组织起来的，因而，革命制度党既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又是高度集权的组织。

墨西哥官方党的职团结构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在国民革命党阶段，是按地域结构由各霸一方的地方党派和地方政权联合起来的。这种结构为“间接结构”，由于比较松散，实际上还是“考迪略”专政，所以解决不了权力集中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该党在一系列的改组中，采取了很多措施。在 1933 年 12 月进行的改革中，将“间接结构”改为“直接结构”，也就是废除集体入党制，实行个人入党制，这样就剥夺了各地方“考迪略”的地方垄断权，加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社会稳定。到 1938 年，该党又在改革中采用了一种明显的职团主义模式，即设立工人部、农民部、人民部和军人部四个职团部，以保证政权交接的制度化。这样，党的“直接结构”又改成了“间接结构”，即由党的四个职团部的领导来决定国家大事。由于发生了 1940 年“选举危机”，卡马乔总统随后撤销了军人部。此后，革命制度党一直由 3 个部组成。但是，党的职团主义体制建立后不久，就遭到了以前总统希尔为首的一批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要求废除这种职团主义体制，实行欧美式的、按地域进行议会选举的制度。于是，又有了 1946 年的改组，重新规定实行“直接结构”。然而，实践证明，这条路还是行不通。到了 1950 年，革命制度党又不得不恢复过去的职团主义体制。此后，职团主义体制一直成为革命制度党的组织形式。

从 1940 年起，革命制度党一直由 3 个大的职团系统即工人部、

农民部和人民部组成。工人部主要通过以墨西哥工人联合会为主的劳工大会来控制全国绝大部分工会组织。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会员组织包括 30 多个行业工会，9000 多个基层组织。工人部的成员多是工人，约有 400 万党员。农民部通过以全国农民联合会为主的农民常设大会来控制全国大多数农会组织。全国农民联合会包括 20 多个全国性农民组织。农民部的成员多是农民，约有 600 万党员。人民部通过全国人民组织联合会来控制国家机关及自由职业者等众多的基层组织。全国人民组织联合会由 50 多个全国性专业职团组成。国家工作人员工会联合会是人民部的核心。人民部的大多数成员都属于中产阶级，约有 300 万党员。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正是由于有这样一支数量庞大的、几乎囊括了社会各个方面成员的群众队伍，才为其长期连续执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革命制度党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对各职团部门实施了分化瓦解政策，使得各职团部门对党和政府产生了很强的依附性，与政府的谈判能力和在反映部门成员的要求与利益方面的积极性都大大削弱了。革命制度党常常利用各部之间及各部内部各个不同组织（职团）之间的矛盾实行分而治之的战略，达到力量平衡，以避免某一个组织（职团）凌驾于革命制度党之上的情况出现。1940 年 12 月，卡马乔总统执政后，大力加强人民部的力量，提高其在党内的地位，目的有二：一是为了推行其经济发展战略，希望得到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的支持；二是为了制衡强大的工人部和农民部。而 1946 年革命制度党的第二次改组，通过改革候选人提名制度，则完全剥夺了 3 个职团部门的政治职能。过去，联邦和各州参议院、众议院、各州州长以及市政府的候选人，都是由各职团部门任命的；现在，则要在各选区的基础上，由党内会议提名任命。而且，党的全国会议，不按部门标准组织，而以地区标准设置。可见，经过这次改革，党的金字塔权力结构已经决定性地取代了过去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的各部代表大会，把这种代表大会降低为党的执行委员会所做决定的一部认可机器。

由于职团部门功能的弱化，在新形势下，职团结构有趋于瓦解的危险。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这种危险的倾向就已露出苗头。由于当时的国家政策向右倾斜，约 3.5 万名不满的农民脱离了农业部，成立了“独立农民联合会”。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墨西哥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后，随着实际最低工资的急剧下降，官方工会——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受到严重影响；由于宪法第 27 条的修改，结束了土改，允许自由买卖村社的土地，从而使官方农会——全国农民联合会受到极大的打击；而人民部的惟一全国性组织——全国人民组织联合会实际上已不起多大作用。3 个职团组织与革命制度党的离心倾向愈益严重，墨西哥国家与劳工的关系再度出现了“非制度化”的危险趋势。

革命制度党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日渐脱离了衷心支持革命制度党的劳工阶级，削弱了自身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随着职团主义体系的衰落，建立在这个体系基础上的党也面临着动摇和解体的危险。

（四）党内派系斗争导致党的分裂，严重破坏了革命制度党的团结统一

综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历史，俨然是一部党内派系间无休止的斗争史。该党的派系源于 1929 年官方党成立前的“考迪略”当时成立国民革命党是为了结束地方“考迪略”各自为政、每逢大选之年国内大乱的政治局面，同时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保障。但是，表面的统一并不能掩盖内部的矛盾。由于党内成员的地域不同、地位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政治集团即派系。每个派系在结构上都表现为几个层次的保护人和被保护人关系的纵向组合，同时，相近的派系在同级层次上还有横向的支援和帮助。墨西哥制度中真正重大的政治冲突和竞争大多跟各派系之间的持续斗争有关。尤其是当时针指向 20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党的指导思想调整，政治经济改革的推进，党内利益越来越多样化，这

些派系非但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亡，相反，围绕“权”和“利”不同派别间展开了此起彼伏的抗争。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半期，党内在如何处理本国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问题上，就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和组织分化。1986 年 8 月，以米却肯州州长、前总统卡德纳斯之子夸特莫克·卡德纳斯和前革命制度党主席波菲里奥·莱多为首的一批观点较为激进的党员组成民主潮流派公开批评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党内的专制腐败现象，要求在党内进行民主改革，并提出党的候选人不应由现总统一人指定，应民主选举党的总统候选人。1987 年 8 月，民主潮流派领导人和一批党员被开除出党。1989 年 5 月，民主潮流派同社会党等 11 个政党和组织联合成立民主革命党，卡德纳斯和莱多先后当选为该党主席。卡德纳斯作为“墨西哥联盟”的总统候选人参加了 1994 年和 2000 年总统大选，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民主革命党的成立，不仅分化了革命制度党的力量，而且大大降低了革命制度党的得票率。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革命制度党内争权夺利的斗争有增无减。由于利益的分化，党内出现了众多派别：“元老派”（又称“恐龙派”）、“传统派”、“少壮派”、“革新派”、“现代派”、“技术官僚派”。近年来，党内又出现了“团结派”、“批判派”、“新民主派”、“民主进步派”、“2000 民主派”等派别。众多派别的存在，使党的团结统一更加难以维系。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遭受一连串的打击后，在 2000 年大选前，又一次不得不面对自身的问题，内讧对处境困难的执政党来说，可谓雪上加霜。1994 年 3 月，党的总统候选人路易斯·唐纳多·科洛西奥遇刺身亡。同年 9 月，党的总书记何塞·弗朗西斯科·鲁伊斯·马谢乌又被暗杀。萨利纳斯及其胞兄劳尔涉嫌与此案有关，引起党内许多人的强烈不满和极大愤慨。

2000 年大选前夕，革命制度党在预选党内的总统候选人时，4 位候选人自立山头、互相倾轧。这 4 位候选人分别是：内政部长拉

瓦斯抵达、塔巴斯科州前州长罗伯托·马德拉索、前内政部长和前普埃布拉州州长曼努埃尔·巴尔莱特、革命制度党前主席温贝托·罗克。为避免党内分裂，革命制度党的领导人让4位候选人在竞选第一天签订了“不攻击协定”，协定签订后，4位候选人热烈握手，以示团结。但初选一开始，4位候选人就都对自己的对手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拉瓦斯抵达含沙射影指责马德拉索在选举中募集黑钱，因为此前报纸上曾有文章揭露马德拉索在1994年竞选州长时曾接受一家被指控洗钱银行的捐款。马德拉索反击说，拉瓦斯抵达是得到政府支持的官方候选人，拉瓦斯抵达和“旧政府”正在把革命制度党引向失败的深渊。革命制度党4位候选人之间的指责和谩骂，不仅败坏了革命制度党在公众心中的形象，极大地削弱了自身的竞争力，而且被反对党候选人福克斯用来作为攻击革命制度党的“炮弹”，直接导致了革命制度党在大选中的失败。

（五）治党不严，为政不廉，层出不穷的腐败丑闻极大地降低了党的影响力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由于一党独大，连续执政71年，社会基础非常广泛，中央集权异常强大，又曾经创造了“墨西哥奇迹”，所以，从没想过有朝一日会失去政权，因而长期以来放松和忽视了党的自身建设，致使党内思想混乱，纪律松弛，组织削弱，再加上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健全，层层叠叠的关系网，致使腐败丑闻层出不穷。

墨西哥的社会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健全，对革命制度党和政府的制约作用微乎其微。在理论上，墨西哥实行总统制，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实行联邦制，地方（市）级政府有很大的自主权。然而实际情况是：（1）由于总统及其领导的行政权高于立法权和司法权，总统完全控制立法和司法部门，联邦议会参众两院始终受执政的革命制度党议员支配，因而，立法监督和司法制约对总统和革命制度党几乎没有影响。在地方上，州级法院和立法机

关通常反映州长的偏好，州长本身都由在位总统精心选定，所以，州级立法和司法部门也起不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作用。(2) 由于革命制度党一党独大，其他反对党力量弱小，对革命制度党没有什么威胁，因而它们应发挥的监督和制约作用也不到位。(3) 大众传媒对政府也没构成有效的约束。虽然政府不直接审查报刊杂志，但它控制着所有报刊杂志的新闻纸的供应。多数出版物从刊登政府广告中获取它们总收入的 20%~30%。而且，贿赂新闻工作者也能保证对政府做出有利的报道。按照惯例，记者除固定工资外，还从他们采访的部门或政府机关领取补贴，墨西哥人俗称它为“香肠馅”。

虽然墨西哥实行选举制，但在很大程度上，各级当选担任公职的人，都是由官方党政机关领导指定的。事实上，只要被指定为革命制度党的候选人，就等于当选了。因而，革命制度党当选者主要不是对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而是对他们的政治保护人负责。墨西哥的整个制度可以看作是由“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环环相扣的链条组成的。其中，“保护人”当然是指政治地位较高的人给政治地位较低的人提供恩惠。作为回报，“被保护人”向他们的官方党内或政府内的保护人效忠，有时也提供诸如动员民众投票和政治控制之类的有用的服务，当然贿赂也是必不可少的。

由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一党长期执政，在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既得利益集团。权力在党内连续不断传递的同时，财富也在他们中间生根和延伸。人们常常把那些在党内、政府内和群众组织中长期把持高位的领导人谑称为“恐龙”，这些人包括国家总统、各部部长、各州州长及中央和地方议会中的众多议员。另外，地方头头也可以利用其能在当地找到的任何机会中中饱私囊，或把自己的亲戚和随从塞进当地的政府机关中，地方头头在选举年为革命制度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负责协调其势力范围内的整个竞选和选举过程，替革命制度党候选人的访问做好安排，召集人们出席竞选集会，分发革命制度党的宣传材料，并确保实际投票和计票按计划进行。

由于革命制度党长期忽视党的自身建设，又缺乏必要的党内监督和社会监督机制，党内和政府内贪污腐化丑闻迭曝，在党内外影响恶劣，使党的威信不断下降，引起人们的不满和愤慨。

1983年6月，墨西哥石油公司前负责人霍奇·迪亚斯·瑟兰诺被提起诉讼，控告他在墨西哥石油公司购买两只天然气柜的交易中诈骗了3400万美元，迪亚斯·瑟兰诺被捕入狱。1995年2月，前总统萨利纳斯的哥哥劳尔·萨利纳斯被控与腐败和洗钱案件有牵连而被捕入狱，并被瑞士司法当局指控与贩毒集团有染而没收其在瑞士银行的存款，此案也涉及到萨利纳斯（自1995年起，他一直流亡国外）及其他高级官员。1997年2月19日，墨西哥全国缉毒局局长古铁雷斯·雷沃略将军及其两名助手因参与贩毒活动被捕。据报刊披露，在塞迪略执政期间，因贪污和涉嫌贩毒而被撤职、法办的军队高级将领除雷沃略以外，还有负责军事运输的弗朗西斯科·基罗斯·埃莫西利奥将军、马里奥·阿图罗·阿科斯塔·查帕罗将军和国防部长之子、负责军事通讯的恩里可·塞万提斯·马丁内斯将军。在1997—1998年间，联邦政府对违规犯法的官员进行了9665例行政制裁和959例经济制裁，处罚金额达4.18亿比索，对证据确凿的375名刑事罪犯绳之以法。2000年6月，正当墨西哥各大政党进行激烈的竞选角逐时，曾任革命制度党财务书记，后任墨西哥联邦区长官、旅游部长的埃斯皮诺萨因涉嫌贪污4.2亿比索而逃亡国外。在竞选的节骨眼上，埃斯皮诺萨的腐败丑闻极大地败坏了革命制度党的形象，这也是导致革命制度党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1979年对墨西哥城居民的一次调查中，90%的人承认“如果你真正想从政府得到什么东西，你几乎总是能用贿赂得到它。”革命制度党全国执行委员、墨西哥全国农民联合会总书记埃拉迪奥·拉米雷斯·洛佩斯指出，革命制度党的错误是“背离了人民强烈的要求，人民对腐败与逍遥法外问题和日益贫困忍无可忍。”参议员巴莱特认为，“腐败成为革命制度党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现

象，革命制度党几乎成为惯偷和窃贼的党，是腐败导致党的失败。”

（六）政治体制改革的双刃剑作用，从某种程度上加速了革命制度党的下野进程

1929—2000年间，独特的墨西哥政治模式不仅在拉美地区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在世界上也是很少见的，学者称之为“官方党一党长期执政的总统制”，或者称之为“一党执政总统制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模式”。墨西哥的政治模式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革命制度党作为官方党，是墨西哥政治体系的核心部分。（2）总统是至高无上的。墨西哥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既是武装部队总司令，又是革命制度党的领袖；总统所领导的行政权高于立法权和司法权。（3）该模式有三个体系即三大利益集团：总统集权的政权体系，属精英主义集团；职团结构的官方党体系，属民众主义集团；私营企业主体系，属自由主义集团。墨西哥的一党执政的政党制度是墨西哥历史所选择的、又为墨西哥历史所证实的、行之有效的政党制度，它为墨西哥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曾经创造了令人赞叹的“墨西哥政治奇迹”。

但是，1968年墨西哥城爆发的学生抗议运动标志着墨西哥的政治模式出现了危机。墨西哥申办第20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获得成功，1968年执政的迪亚斯·奥尔达斯政府为筹办运动会，投资1.5亿美元兴建新的体育场。许多面临失业的学生认为政府是想借机向世界炫耀自己的繁荣，以掩盖成千上万人挨饿的事实。从1968年7月下旬起，学生游行示威不断，要求开放民主，争取自由和大学自治。1968年10月2日，在特拉特洛尔科文化广场的集会上，近万名学生遭到了军警的残酷镇压，约30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2000多人被捕。这就是耸人听闻的“特拉特洛尔科惨案”。这一事件标志着墨西哥政局开始由稳定发展走向不稳定，它的意义在于把墨西哥政治制度的反民主性质和经济制度的不公正性质暴露在人民面前，在墨西哥现代史上第一次向一党制政治体制和

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公开的挑战，从而促进了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

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末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弊端的日益显现和“特拉特洛尔科惨案”的爆发，墨西哥于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遂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1982 年债务危机爆发后，由于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要求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所以，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政治改革步伐更快、更大。

墨西哥的政治改革主要是围绕选举制度的改革进行的。在 1963 年以前，墨西哥实行多数选举制，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席位几乎被革命制度党所垄断。1963 年 6 月，洛佩斯·马特奥斯总统修改宪法，在众议院中实行政党代表制即“党众议员制”。其基本原则是：少数派政党若在全国获得总票数的 2.5% 以上，即可取得 5 名政党代表的众议员席位；每增加 0.5% 的选票可增加 1 席；但政党代表的席位在众议院中不得超过 20 席。但该制度徒有其名，影响不大，因为当时最大的反对党墨西哥共产党自 1946 年就被当局宣布为非法政党，禁止活动；而其他反对党都难以取得 2.5% 的选票。

埃切韦里亚就任总统（1970—1976 年）后，对内实行“民主开放”力图改善甚至启用 1968 年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当部长或大使，1971 年和 1973 年两次修改选举法，把获得众议员资格的总票数由 2.5% 降至 1.5%，还把众议员的最高限额由 20 名增至 25 名，使国家行动党等反对党在众议院中增加了席位。

波蒂略总统在执政期间（1976—1982 年），为进一步创造民主化气氛，于 1977 年 12 月通过了《联邦政治组织和选举程序法》。根据该法，公民可以自由组织政党；少数派政党只要在全国议会选举中获得 1.5% 的选票或其党员超过 6.5 万人，登记后可以参加竞选；众议院实行部分议员比例代表制，取消政党代表制，新增的 100 个席位（原来 300 个，现为 400 个）由执政党以外的、经过登记的政党按比例分配。这次改革，使一些左翼政党，包括墨西哥共

产党取得了合法地位，1979年议会中期选举的合法政党从3个增至9个，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在众议院中的席位大大增加。

德拉马德里在执政期间（1982—1988年）共实施了三项改革：（1）自1988年起，众议院设500席，增加的100席按比例代表制进行分配；（2）参议院每三年改选一半；（3）修改宪法和选举法，加入“可治理条款”。根据此条款，在选举中得到42%的选票的政党即可获得议会中的一半席位，目的是为了保证执政党有足够的治理能力治理国家。1988年7月的总统大选，革命制度党候选人萨利纳斯得票刚刚超过半数（50.71%），勉强当选。

萨利纳斯执政期间（1988—1994年）曾多次修改宪法和选举法，主要的改革措施有三个方面：（1）将参议院的席位由64席首次增加到96席再次增加到128席。31个州和首都联邦区各选4席，其中3席由相对多数产生，1席由得票第二位的政党担任，这样，反对党首次可当选为参议员；（2）于1990年成立联邦选举委员会，由内政部领导；（3）废除“可治理条款”。1994年8月的总统大选中有9个党参加选举，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塞迪略得票居第一位，但仅占48.77%，是自1929年该党成立以来得票率最低的一次；居第二位和第三位的是国家行动党和民主革命党，得票占总数的25.94%和16.60%。

塞迪略执政时期（1994—2000年），墨西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和恰帕斯农民暴动。为了克服危机，恢复经济，稳定社会，塞迪略遂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政治经济改革。在政治方面主要的改革措施有：（1）结束“任命制”，总统不再指定革命制度党的下届总统候选人，在全国通过预选推举产生；（2）联邦区行政长官由该选区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不再由总统任命；（3）联邦选举委员会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不再由内政部管辖；（4）任何政党在众议院中的席位不能超过300席（共500席），即60%。塞迪略的这些改革，一方面缩小了行政权（总统）的权限，扩大了立法权（议会）和司法权（法院）的权限；另一方面，限制了官方党的势力，扩大

了反对党的活动空间。

塞迪略总统的改革与以往不同，一方面为了表明自己同官方党保持“健康的距离”，他不仅没有像过去历届总统那样，全力支持本党的总统候选人，反而对后者的失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塞迪略利用其总统和党的领袖的地位，干预党务，先后更换了 7 位党的主席，而且“每当某位主席想实施某项计划时，立即就被替换”。因此，有的墨西哥报刊把塞迪略称作革命制度党的“叛徒”“掘墓人”，有的报刊把塞迪略比做“墨西哥的戈尔巴乔夫”。

虽然，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及其政府迫于形势所进行的政治改革是渐进式的，其本意是希望通过政治改革，给予反对党一点活动空间，将其作为政治陪衬，以达到长期执政的目的，但是，由于这些改革措施逐步扩大了反对党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活动空间，国家行动党和民主革命党等主要反对党的影响不断扩大，对革命制度党的一党统治越来越构成严重威胁，终至 2000 年大选革命制度党丧失政权，沦为在野党。

总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由盛而衰，由长期执政到失去政权的历程，或许能从诸多方面给我们以警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于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第六章

印尼专业集团：东南亚 金融风暴中的沉船

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位于亚洲东南部，面积 190 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近 1.8 亿，其中爪哇人 47%，巽他人 14%，还有马都拉人、华人、巴厘人等 100 多个民族。居民信奉伊斯兰教（约 87%）、基督教（约 7%）、天主教（约 3%）及印度教、佛教等。首都雅加达是东南亚最大的城市。印尼盛产石油、锡等重要资源。

从历史看，早在公元 3 至 7 世纪，印尼就出现了一些小的封建王国。13 世纪末至 14 世纪初，爪哇出现了印尼历史上最强大的麻喏巴歇封建帝国。15 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殖民者先后入侵。1596 年荷兰殖民者侵入，并于 1602 年成立了具有政府职权的“东印度公司”，1799 年底改设为殖民政府。1942 年日本占领印尼，3 年后日本投降，印尼爆发了争取民族独立的八月革命，并于 1945 年 8 月 17 日宣布印尼独立。1947 年后，荷兰与印尼经过多次战争与谈判，于 1949 年 11 月签订印荷《圆桌会议协议》。据此协议，印尼于同年 12 月 27 日成立联邦共和国，并随之参加荷印联邦。1950 年 8 月，印尼联邦议院通过临时宪法，正式宣布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尼经济十分落后，工业主要是采矿和一些简单的原料加工，如制烟、制糖、碾米、编织等，战后五六十年

代，工业发展仍很缓慢。苏哈托掌权后，重视发展国家工业经济和农业，大力开发资源，主张“进口替代”和“面向出口”并重的经济发展战略。1967年后，印尼政府大量引进外资、设备和技术，促进本国工业的发展。1969年起，由政府制定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到70年代经济已初显繁荣。1974年前，印尼主要是依靠发展石油等采矿工业及替代进口的工业，1974年后，则大力发展原料出口加工业，以及化肥、纺织、化工、机械等制造业，开设出口加工区，经济开始了长足的发展。

1964年10月，印尼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组织——专业集团，并从1967年起连续执政30多年，是印尼建国后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该党开始称为“专业集团联合秘书处”，由为数众多的、多具明显军方背景的政治性职业组织联合而成，也是军方谋求参政的政治团体。从1971年起，时任印尼总统的苏哈托对专业集团进行整顿，并逐渐控制了整个党。

专业集团自1971年以来连续6次赢得大选，其实际领导人苏哈托连续当选7届印尼总统，执政时间超过30年，是亚洲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家领袖之一。该党有数百万党员，分布在印尼的各地区、各部族、各种职业和宗教信仰群体中，职业范围遍布印尼各行业，及工人、青年、妇女等群众团体。党的主要成分是退役军人、公务员和国营企业的职员、企业家、宗教界人士及教师，在农村主要是村干部。在专业集团执政和苏哈托当选印尼总统期间，印尼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过去相比，取得了比较快的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起直到遭受东南亚金融风暴冲击前，印尼多年经济增长率超过6%，1995年达到8.1%，国内生产总值从平均每人50美元递增到1000美元，到1984年，印尼的稻米已能自给，不再依赖进口。同时，政府大量启用优秀的技术官僚和经济专家治国，强调内政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并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保持了国内政局的相对稳定，曾一度成为西方推崇的发展中国家的成功榜样。但就是这个党，却在1998年上半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后，失去了多年

的执政地位，而它的实际领袖苏哈托，也在国内外一片抗议声中被迫辞职，直至走上被告席。

一、印尼的政治体制和政党制度

审视印尼专业集团垮台的历程，首先必须了解印尼的政治体制和政党制度。

（一）印尼独立后的政党体制

从实践上看，印尼独立后的政党体制的发展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苏加诺领导的“自由民主”和“有领导的民主”阶段与苏哈托领导的“新秩序”阶段。在1959年前，即所谓的自由民主阶段，实行的是西方式的多党议会选举制度，即多个政党参加大选，占议席多数的取得执政地位。当时，印尼数十个政党参选，但每次都没有一个政党在议会占有绝对的多数单独组成政府，而是通过政党联盟组成联合政府，由于各政党代表的社会利益和阶层不同，这种模式，在合作过程中经常因政策分歧而解体，导致了政府的频繁更替，也引起了社会的动荡和人心的不稳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加诺决定对政治体制特别是政党制度进行改革，决心要消除这种政党、党派纷争带来的混乱局面。他构想建立一种新的政党制度，其核心是强调各政党按议会的席位比例共享政权，他试图通过这样的体制，使代表社会各种不同利益群体和阶层的派别，特别是主要政党，都能进入议会参政，由此而避免西方大选后那种在野党和执政党之间的不停斗争，这也是与印尼早期的村社大会模式和文化意识有很深关系的。这样，在苏加诺“有领导的民主”时期，内阁中就包括了议会中所有的主要政党组织的代表。但这种体制在实践中并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以军队专业集团为基础的右翼和以印尼共产党为核心的左翼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这两大政党又在印尼的党派构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苏加诺思想的

不现实性，加上他在经济发展上的无方，政府官员的腐败，最终苏加诺在政变中被赶下了政治舞台。到了苏哈托的“新秩序”阶段，在政党制度的改革中，他吸取了苏加诺领导的“自由民主”和“有领导的民主”阶段的不足，一方面，力图在议会建立一个占有绝对优势的政党，使其他政党处于无法与之抗衡的地步，同时，和苏加诺一样，不采取西方式的自由竞争，主张贯彻“潘查西拉”。潘查西拉是印尼建国的五项基本原则。印尼的国徽是神话中的鹰，鹰的胸前挂着一个盾牌，盾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代表五项原则，每一原则以一个物件为标志，如五角星象征信奉上帝，榕树象征民族主义，野牛头象征民主，铁链象征人道主义，棉花和谷穗象征社会公平。建国五项基本原则最初是苏加诺提出来的，主要包括了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协商一致、共同繁荣和信仰神道，苏加诺把这五个原则的核心归纳为互助合作，协商一致。后来，又几经诠释，到1959年发展为“纳沙贡精神”，把民族精神、宗教精神和共产主义融合为一体。苏哈托上台后，把建国五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回归到最初的解释上，并在全中国开展了“领会和实践潘查西拉运动”（也叫4P运动），苏哈托把协调、平衡、团结等理念作为领会建国五项基本原则的核心。为了达到这样的政治目标，职业军人出身的苏哈托以暴力手段通过一系列政治事件，消除和禁止共产党及其他左翼激进政治组织。首先在1966年3月，宣布印尼共产党非法，并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与清洗。次年颁布“简化政党条例”，采取减少政党数目，统一意识形态，农村基层非政治化等办法，合并了当时的主要政党，并组建了属于他自己直接领导的政党——专业集团，1975年8月公布的政党法，更进一步确认了这些原则和做法。

专业集团参政，是源于苏加诺有领导的民主的试验，当时，他允许非政党的专业集团选派代表参加国会。1964年，陆军专业集团为了联合、控制其他专业集团与共产党竞争，组成了“专业集团联合书记处”，专业集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规章提出，它是一种社会政治力量，是各行各业复兴发展的同行业中志同道合的人们组

成的一个社会集团。苏哈托上台后，更进一步努力把其他专业集团都网罗到一起，成立了统一的组织，并凭借执政的优势和便利，逐渐把政府公务员、国营企业人员拉入专业集团，使之成为代表性最广、党员人数最多的政治组织。1971年大选胜利后，专业集团逐渐从松散的联盟演变为纪律严格、组织严密的政党组织，人数不断攀升，1994年达到3200万人。

（二）专业集团的主要政治特点

在政党体制建设上 在指导思想上 苏哈托强调协商一致 他又以唯物和唯心，即物质和精神孰先孰后的区别，让当时的印尼9个政党作出选择，并最后合并成由民族党、天主教、印尼基督教党、印尼独立支持者协会和大众党组成的以民族党为主的印尼民主党，和由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穆斯林党、伊斯兰联盟党和白尔蒂伊斯兰新党组合而成的以宗教精神为主的印尼建设团结党，加上印尼专业集团，形成了三党结构的多党制度。当然，实质上国家权力还是掌握在印尼专业集团手中。之后，他又以“潘查希拉”的内容为要求，迫使另两个党完全放弃自己的特征，完成了政党在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

在组织建设上，1984年初，专业集团变更党员制度，从过去主要以团体入党变为以个人身份登记入党，走上了一条集中统一的道路。苏哈托夫妇带头完成了从集体党员到个人身份的登记，使这个包括了全国数百个组织的政党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强化了党对成员的直接领导和党员对党的责任感。专业集团与其他两个党相比，可以充分利用手中的行政资源，包括各级公务员、各个社会阶层组织，在5年一轮的大选期间，它还可以依靠不受监督的政府补贴，依靠军队的强力秩序，通过各种优惠条件来吸引广大民众，而反对党则受到种种限制，如1975年8月政党法规定，一切未经许可的政党活动均视为反对国家、“潘查西拉”和国家宪法。规定没有书面批准，一切政府官员不得参加任何其他政党，这就防止了高

级官员对反对党的支持。并且他还以“浮民”为由，规定县以下的基层乡村在非大选期间，政党不得进行任何政治活动。这样，其他政党的基层组织便无法延伸到农村乡镇，而专业集团作为超党派组织，其基层行政官员却可以利用职务便利，对农民施加影响和政治导向。

在政治和思想上，苏哈托通过坚持以印尼的传统立国思想“潘查西拉”为基础，迫使其他政党在每个重大问题上最终同政府的立场保持一致，而不是通过民主的多数选票来决定。这样，苏哈托也就逐渐在意识形态领域淡化了其他政党的思想特征与理想追求，对削弱其力量起到了特别的作用。同时，吸收大批国家干部入党，逐渐完成了从一种社会政治力量向政党组织的转变。专业集团有完整的组织体系，最高权力机构是监督委员会，由苏哈托亲自领导，负责对专业集团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进行指导、建议。中央执行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总书记及工作部，一直由军人任主席，直到专业集团五大，才选出作为文职人员的新闻部长担任此职。在省一级设有执行委员会和评估委员会，后者对前者进行指导、评估和建议。在县一级，设立县执行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后者享有控制权。军队也有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相似的组织设置，如由国防部和安全部官员组成的监督委员会，也是专业集团的核心决策团体。在省、县二级，军队首领也都分别控制着相应的层面。军人干政，是专业集团党的建设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它的最重要立法机构“人民协商会议”中，有相当的名额是由政府直接任命给军队的。在专业集团的建制中，中央领导机构是各级执行委员会，但实际权力在中央是监督委员会，在省是评估委员会，在县是顾问委员会。而这些委员会的实权则掌握在以苏哈托为首的军队领导人手中。

对专业集团这一曾经是东南亚地区最大、执政时间最长的老党丧失执政地位的过程进行评析的时候，有必要了解他的独裁领袖苏哈托。

(三) 苏哈托

苏哈托 1921 年 6 月 8 日生于中爪哇日惹格穆苏村一个农民家庭。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其职业生涯主要是在军旅度过的，自 1945 年印尼独立战争后，他从普通士兵一步步晋升到了将军。

1965 年 9 月 30 日，苏加诺总统的卫队指挥官翁东中校突然发动“九三运动”绑架和打死了 6 名印尼高级将领，并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由此导致了号称拥有数百万党员的印尼共产党的沉亡。同年 12 月，印尼反对“九三运动”和印尼共产党的行动，在苏哈托的怂恿和支持下达到高峰。印尼各大学，特别是雅加达大学各校园里都出现了反对印尼共产党，直至要求苏加诺总统下台的抗议，示威者提出解散印尼共产党，改组内阁和降低物价等要求，并要求苏哈托上台执政。

当时，苏加诺总统签发了一份《命令书》，命令苏哈托可以总统名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持治安和社会稳定，保证政府正常工作，并确保他本人的人身安全与权威。由此，国家的实际权力落入苏哈托的掌控之中。翌日，苏哈托便作出“解散印尼共产党”的决定。印尼共产党被取缔后，苏哈托紧接着宣布不准其他政党或群众组织接受原印尼共产党成员，并要求印尼共产党成员向就近的政府机构报告。

1966 年 3 月，苏加诺再度被迫改组内阁，清除其中的印尼共产党成员，同时由支持苏哈托政策的人物取代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印尼共产党代表。6 月，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召开全体会议，会议撤销赋予苏加诺的“伟大的革命领袖”和“终身总统”等称号，并责成他向临时人民协调会议报告在“九三事件”前后的行为。会议确认了 3 月 11 日《命令书》，这意味着苏哈托已获得“临时人民协调会议”的委托，其地位更加合法化。会议还批准解散印尼共产党，并决定禁止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印尼土地上的存在。

1967 年 3 月，临时人民协调会议召开特别会议，一致推选苏

哈托为印度尼西亚代总统，这标志着苏加诺时代的结束，苏哈托时代的开始。从此，苏加诺从领袖成为平民，并饱受“政治隔离”的不公正待遇。在 1968 年 3 月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上，苏哈托正式当选为总统。从镇压“九三 运动”后仅仅两年多的时间，苏哈托便完成了就任印尼共和国第二任总统的历程。此后，苏哈托在无任何对手的情况下，连续连任总统。

二、1998 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中的印尼政治剧变

为了客观了解、全面把握印尼专业集团垮台的背景和原因，有必要历史地对印尼 1998 年那场政治剧变的最后时刻进行一次扫描，弄清苏哈托政权是如何被一步步逼下政治舞台的。

这场危机首先是从泰铢贬值开始的，1997 年 7 月 2 日，泰国被迫宣布泰铢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当天泰铢汇率狂跌 20%，和泰国具有相同经济问题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迅速受到泰铢贬值的巨大冲击。7 月 11 日，菲律宾宣布允许比索在更大范围内与美元兑换，当天比索贬值 11.5%。同日，马来西亚则通过提高银行利率阻止林吉特进一步贬值，而印度尼西亚则被迫放弃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比价，印尼盾 7 月 2 日至 14 日贬值了 14%，从 3600 盾兑 1 美元跌至最低时 18000 盾兑 1 美元。由于苏氏家族和权贵把持的国家企业过去向外国盲目举债，在金融风暴下，资不抵债，信用等级大降，资金周转不灵，生产萎缩，企业倒闭，工人大批失业，引起连锁反应，政府财政收入不敷出，市面上通货膨胀加剧，又逢农业歉收，物价不断攀升，特别是粮食等基本生活用品的价格上涨了 400%，民生在危急之中。

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下，苏哈托不得不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达成三个一揽子援助计划。但这些计划都要求印尼实行紧缩财政，取消物价补贴，取消家族和权贵对经济的垄断，放弃大型基建工程和任人唯亲的作法，建立符合市场规则的经济体制。此

后，苏哈托不得不按 IMF 的要求进行改革，试图与世界市场接轨，并放弃了他惟一施惠于人民的对燃油和电力的价格补贴，导致油价上涨了 71%，电价上涨了 60%，引起了社会骚乱。在这种动荡的社会形势下，苏哈托仍不思改革，不肯放弃特权，为了维护其家族利益，他企图通过建立与印尼外汇储备和金融监管能力都极不相符的联系汇率，以稳定物价，结果却引起市场混乱，国内外投资者都望而却步，股市进一步动荡，经济形势更加险恶。

当金融风暴进一步冲击印尼社会后，国内要求政治改革的浪潮便一浪高过一浪。1998 年 2 月，雅加达的大学生在校园里拉开了反对苏哈托家族统治，要求政治改革的人民运动的序幕，并使运动很快波及全国各大学。学生的行动得到了教授、学者和要求改革的社会力量的支持。而苏哈托在 3 月连任总统后，完全失去了在政治上的感召力。在严重的国内社会危机下，他居然还任命自己的长女为社会部长，任命自己的高尔夫球友为贸工部长，这种腐败的任人唯亲作法，进一步刺激了民众的反对情绪和统治集团对他的离心倾向。5 月起，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不断扩大，并得到在印尼有很大影响的穆罕默德传教会精神领袖赖斯、印尼前总统苏加诺之女梅加瓦蒂和改革派领袖、印尼前环境部长伊米尔等人的公开支持。

5 月 12 日，雅加达特拉沙提大学的 6 名示威学生遭到军警枪杀后，国内国际舆论大哗，国际社会强烈呼吁避免流血。15 日凌晨，在埃及参加 15 国首脑会议的苏哈托提前回国。回国后，苏哈托即在官邸召集副总统哈比比、国防部长兼三军总司令维兰托、政治安全协调部长唐俊、内政部长哈托诺、国务部长穆西、新闻部长达兰以及司法部长和检察部长举行会议，商讨对策，并决定撤销提高燃油和电力价格这两项总统令，从 16 日起降低燃油和电费价格，以便在目前危机时刻减轻人民的负担。这两项命令曾是北苏门答腊、棉兰和雅加达暴乱的导火索。会议还决定加强对雅加达及周围地区的安全措施，对继续制造骚乱的人采取严厉行动。苏哈托的女婿、战略后备部队司令普拉博沃发表电视讲话，称军队将对抢、烧

等违法活动采取严厉措施。雅加达市区部署了约 15000 名军人，并配备坦克、装甲运兵车及其他武器。同时，苏哈托还否认了准备辞职的说法。

翌日，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在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发动大规模暴乱、纵火和抢掠活动，另有数千名大学生在泗水市中心游行。与此同时，巨鹿、中爪哇城市梭罗均有暴乱事件发生。雅加达市区商店、银行纷纷停业，机关无人办公。为避免政局不稳而使印尼盾的贬幅加剧，印尼政府已停止印尼盾交易。基于印尼的政局不稳，世界银行决定延迟发放两笔总值 12 亿美元的贷款给印尼，并将与印尼政府谈判有关延迟还款问题。

此时，苏哈托派系的重要人物，印尼国会议长兼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民协商会议主席哈尔莫科开始表示，总统应顺应国民期望而改组内阁。而印尼总统苏哈托领导的专业集团的一个主要派系柯斯哥洛派则发表声明，反对苏哈托，要求他归还国会付托的总统职权，这使得苏哈托的统治更进一步陷入危机境地。

就在苏哈托处于 30 多年来最脆弱的境地时，反对派“回教运动”领袖赖斯也提出强力呼吁，并谋求印尼反对派人士联盟。长久以来，赖斯一直支持学生所要求的经济与政治改革。赖斯宣布成立一个由 56 人组成的“人民议会”，成员包括要求苏哈托下台的著名反对派人士和若干前内阁高官。鉴于军队是印尼政坛的一股重要力量，他还呼吁军方和社会各阶层站在一起，使印尼摆脱动乱。印尼人民党领袖、国父苏加诺的女儿梅加瓦蒂也公开呼吁军警不要以武力对付示威民众。

5 月 16 日，柯斯哥洛派又发表声明，要求苏哈托交出人民协商会议 3 月间第七度授予他的总统职权，“如果苏哈托不愿和平下台，我们便必须迫使他辞职。”这是印尼执政党内首次公开反苏行动，同时，印尼反对阵营的领袖们要求苏哈托下台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关于苏哈托的去留问题，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英国参与八国集团

高峰会时指出，此事应由印尼人民决断，他表示：“印尼现政府应与社会各界展开对话，以导向真正的政治改革。”同时，正在英国参加八国集团高峰会的各国元首呼吁印尼开展政治及经济改革，并且暗示苏哈托是下台的时候了。

5月18日，印尼局势的天平出现了新的倾斜。这一天，长期以来一直忠于苏哈托的国会议长哈尔莫科在印尼国会上首次公开呼吁总统苏哈托要为这次的大暴乱引咎辞职。国会领导层会议后，哈尔莫科宣读声明说，国会希望总统在国家团结及和谐的前提下，“聪明地选择辞职”并要求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别会议重新选出总统。

国防部长维兰托召开记者招待会，表示军队将组成一个改革委员会，与国会及迫令总统进行改革的“重要公众人物”合作，以处理目前的危机。形势变得紧张起来，军队在街上不停巡逻，各地可见大规模的学生示威。反对派“回教运动”领袖赖斯称，他将于5月20日发动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在首都雅加达，5000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并进入国会大楼，要求苏哈托下台，在场军警并无阻止。

5月19日，印尼局势再次出现新变化。当日，苏哈托与社会知名人士及武装部队领导人举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协商，然后他出现在记者面前，在历时15分钟的电视演说中出人意料地表示，他将根据为选举草拟的新法例尽快举行大选，但他不会角逐连任。不过，苏哈托再三声明他不会辞职，理由是此举既不负责任，又不能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况且，政治的传承必须依宪法而行，否则流血事件必随之而来。苏哈托说，他会为选举拟定新法例，并委派改革委员会执行改革工作，负责检讨和政治生活有关且具争议性的法律。他还会进行内阁改组，新的内阁将称为“改组内阁”。有关选举的法例一经制定后，印尼便会举行大选，新任总统将由议员和其他人士组成的特别议会指派。此外，为了恢复人民的信心，苏哈托革除了其女儿西蒂和另外6名部长的职务。

综观苏哈托 5 月 19 日发表的讲话，其要点是：大选将会尽快举行；声明他不准备获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身为总统，他决定立即实行及领导全国改革，成立改革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公众人物及学者，工作主要是落实大选、政治、国会架构等新法，包括反垄断、反贪污等新法规，检讨选举法、政党法以及立法程序，使之符合人民的期望，而大选将会根据新法立即举行；武装部队要坚持维护国家安全、保安、治安以及人民的安全。对他来说，辞职与否并非问题，关键是能否解决现时的状况。

印尼股汇在苏哈托发表讲话后反弹，印尼货币的汇价由 1 美元兑 16000 盾的低位上升至 1 美元兑 11000 盾，印尼综合指数在当日中午收市时上升了 6%。

苏哈托在发表上述讲话前还在官邸会见了 9 名回教领袖并由电视台作现场转播。9 名回教领袖向苏哈托转述了人民的意愿，其中一人提出要求苏哈托最迟在当年年底举行大选。国会议长哈尔莫科表示，国会领袖和国会内的政治派系均同意国家权力转移须以宪法为依据，但他强调总统辞职是符合宪法的。

印尼各方从 5 月 19 日开始研究苏哈托的理想接任人选。

5 月 19 日这一天，印尼的学生举行了通宵示威活动，逾 15000 名大学生重重包围首都雅加达的国会大厦，并誓言准备为改革而死，他们表示，除非苏哈托下台，否则不会撤走，未见军方有重大干预，来自加里曼丹和茂物的学生亦加入集会行列。第二天清晨，手持横幅、标语及印尼国旗的学生便在国会大厦外举行集会，不停高呼民主口号，其间上百名示威者曾爬上大楼的绿色圆形屋顶，另有数百名工人也加入示威行列。

赖斯前往雅加达国会大厦，向上万名反政府示威学生发表演讲。他声称苏哈托的气数已尽，呼吁国会学习学生的勇气，希望全国三军作一抉择：究竟选择靠拢家财万贯的苏哈托，还是选择站在印尼 2 亿人民这一边。

5 月 20 日是印尼独立运动纪念日，印尼首都雅加达以及日惹、

泗水、万隆、梭罗、棉兰等大城市爆发的反苏哈托示威游行人数逾 70 万，单是苏哈托的家乡日惹就占 50 万人，苏哈托对此感到万分沮丧，知大势已去。

苏哈托答应辞职，但没有说明具体时间，他是想等完成改革计划与举行新选举之后下台。为了完成改革计划，他加紧了准备工作。印尼国务部长穆西表示，苏哈托准备在 5 月 21 日宣布改革委员会初步名单。当然，苏哈托此举是为缓和对他下台的呼声日益升级的压力。

苏哈托是在国内反政府示威逐渐失控的情况下决定成立改革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检讨现时与政治有关的总统选举、政党、立法机构的组成、大型组织及全民投票等旧有法例，另外，还将制定反垄断及反贪污的法规。对此，反对派领袖梅加瓦蒂表示，该改革委员会必须要独立运作，最好不要由苏哈托主持，她并建议该委员会的成员应由少数党派出代表，连同国内最大的回教组织“伊斯兰教师联合会”、赖斯的“回教运动”、军方、学者及专业人士一起组成。

然而，面对国内、国外的强大压力，印尼总统苏哈托终于宣布辞职，结束了其对印尼 32 年的独裁统治。

5 月 21 日上午 10 时许，在雅加达独立宫，执政 30 多年的铁腕人物苏哈托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他用颤抖的声音通过电视说：“我已决定宣布，自我宣读此项声明之时起，停止印尼共和国总统的职务。”然后，他在女儿的搀扶下，乘车离开总统府。时任副总统哈比比即在最高法院法官见证下，手举可兰经正式宣誓就任总统。在哈比比宣誓就职后，国防部长暨三军总司令维兰托发表电视广播讲话说，印尼三军将保卫“包括苏哈托先生在内的前政府领袖”。维兰托说，他的声明是代表“三军的政治立场，也是对全民的一项宣告”。

苏哈托宣布辞职，使为期一周的政治动乱，包括此前造成 500 人死亡的雅加达抗议与暴动出现了一个转折。占领印尼国会的学生

在电视上看到苏哈托总统宣布辞职的消息后，欣喜若狂。新闻部长稍后表示，新总统将顺应民意，推动政治、经济与法律的全面改革。消息传开，学生们纷纷撤离街头，持续 3 个月的抗议活动暂时停止。首都雅加达的大部分路障、铁丝网开始拆除，大街上的车辆行人渐渐增加，一些逃到国外的华人开始返回国内。

当时，外界普遍视哈比比为苏哈托的忠实支持者，认为新政府不过是过渡性的傀儡政权。不少学生们与印尼人民，仍不愿接受由哈比比接掌政权，而要求二人同时下台，并为他们过去犯下的罪行接受审判。

反对派领袖赖斯拒绝承认哈比比，强调所有与贪污政权有关联的内阁成员，包括哈比比在内，必须一并撤换，赖斯并宣布将竞选总统，并要求审判前总统苏哈托。

印尼武装部队司令维兰托上将则表示支持哈比比为新总统。同时，他还保证武装部队将保持团结统一，将发挥积极作用，防止骚乱及其他威胁国家安全和团结的行为。

5 月 21 日晚上，哈比比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他将按照人民的愿望加快进行政治、经济和司法等方面的改革，诚心诚意地接受社会各阶层提出的全面改革要求。为此，他将在最短的时间内成立一个负责任的专业化的内阁。新政府将反对贪污腐败、裙带关系和垄断经营，并将修改和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他在讲话中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克服目前面临的金融危机。同时，他还表示印尼将认真执行与所有外国签署的协议，包括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一揽子改革协议。

三、印尼专业集团丧失政权的原因

从印尼 1998 年下半年这场政治剧变的过程可以看出，导致苏哈托领导的专业集团丧失政权的主要原因是：

（一）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引发印尼政局动乱的直接因素

1998年7月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印尼的金融市场持续动荡，货币大幅度贬值，失业人数增至1950万人，加之旱灾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食品供应困难，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贫富悬殊问题更加突出，一些人死于饥饿和疾病，而政府在解决危机方面的措施又远远落后于人民的期待，社会上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此情况下，印尼政府为了争取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巨额贷款，按照该组织要求它的改革内容，又实施了大幅度提高燃油和电力价格的政策，更引起了广大公众的强烈不满，进而被反对党利用，引发了要求苏哈托下台的大规模示威，并演变成严重的社会骚乱，造成约1300多人死亡。愈演愈烈的社会冲突和失控的群众运动，最后导致了苏哈托政权的垮台和印尼专业集团执政地位的丧失。

（二）贪污腐败、裙带政权、社会贫富悬殊是印尼剧变的社会原因

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专业集团执政期间，虽然在发展经济和稳定政局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也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贪污腐败、裙带政权表现得尤为突出。

依赖政府的资助，苏哈托的三子三女以及他们的配偶和亲属组成了庞大的商业王国，在印尼，几乎所有大项目中都有他们家族的股份，一般都占20%左右的股份，因此这个第一家族又被称为“20%家族”他们左右着印尼全国的经济。

其中，苏哈托的妻子控制了全国所有的公共工程公司，收取各公司10%的股份；其长女连续几届当选为国会议员，担任国家社会事务部长，长期掌管印尼的公路收费公司；其长子是印尼最大的汽车制造公司的最大股东；次子担任印尼比幕塔拉联合大企业主席，控制全国的电视业、房地产业、建筑业、酒店服务业、电信

业；次女拥有多家银行和建筑公司的股份，特别是拥有印尼工业银行 8% 的股份，她的丈夫长期担任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三子是国会议员，垄断了印尼的石化业，拥有一家航空公司和一家专门制造跑车的汽车公司，并掌管着全国制造香烟的丁香供应公司；三女则垄断了印尼海滨浴场开发公司的大部分股份，等等。除了直系亲属，苏哈托家族的其他成员也纷纷借助他的权力，涉足各项经济活动，牟取暴利，其堂弟控制了外国电影的进口，还兼任一家庞大的水泥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其他亲属则垄断了从石油开采、液化气运输到木材、胶合板的出口等生意，无所不包。

苏哈托在印尼执政期间共建立了 77 个基金会，总额达 50 亿美元。重要的基金会都由苏本人掌管，其他则由他的家族成员掌管。基金会打着社会福利旗号全部享有免税优惠，可以不公开财政收入和支出状况。苏哈托通过颁布各种政令、制定各种法规，要求企业每年必须向基金会交纳扶贫金。凡是年收入超过 1 亿印尼盾的公司和企业，都必须将收入的 20% 捐给指定的基金会，同时还要求每名国家公务员向基金会捐款。然而不少基金的部分金额却实际上成为苏哈托家族的私产。据调查，“超级三月指令基金”的宗旨是协助政府通过教育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而实际上用于此项的基金只占总金额的 16%。苏哈托将其余资金全部用于购置土地、买股票，或借给亲朋好友办企业等。“社会慈善基金”的资金则借给苏哈托的好友开公司达 16 年之久，从来没交过一分利息。“自力福利基金”用于扶贫的金额只占总资金的 18.5%。1990 年苏哈托炒汇亏损 4.2 亿美元就是由该基金注资的。根据印尼法律，各个基金会是不能控股的。苏哈托及其子女则巧立名目控股，如苏的长子在“社会慈善基金”控股 20%，在“献身工作基金”控股 30%，在“超级三月指令基金”控股 25%。

苏哈托还通过颁布政令方式低价强征民用土地。苏哈托家族在西瓜哇拥有 17.4 万公顷土地，在苏门答腊北部拥有 52 万公顷土地，在加里曼丹拥有热带雨林区 2200 公顷，他的妻子在茂物市附

近还拥有 600 公顷的养牛场。这些土地大部分是以其子女或他们的公司名义注册的。根据印尼法律，每个公民拥有的土地不得超过 10 公顷，而苏哈托家族却拥有数百万公顷的林地及数十万公顷的房地产。除此之外，苏哈托家族在英国、美国各有 5 栋豪华私宅，在新加坡还有放牧场。

据《国际财经》杂志和印尼商业资料中心公布的分析调查结果，苏哈托家族拥有的财产，保守的估计是 200 亿美元，最高的估计是 1000 亿美元。美国著名的《福布斯》杂志早就将苏哈托列入世界排行第四的富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调查资料也将苏哈托家族列入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行列。

（三）军人干政、压制民主、高压控制是印尼社会政治矛盾积重难返并导致剧变的重要根源

苏哈托是依靠军队上台的，执政后，也同样扶持军队干政。印尼议会和政府要员大都是退役或现役军人。印尼议会共有 500 个席位，其中 75 个席位由军人担任。苏哈托的二女婿担任特种部队司令，在人代会和人民协商会议这样的重要权力机构内，也有许多苏哈托的亲属和亲信。在印尼议会和人民协商会议中，超过一半的名额控制在苏哈托的手上。苏哈托把他信得过的人安排到“两会”中，这些人反过来则一次次地投票让他连任，人民民主自然成了一句空话。在军人干政的情况下，印尼的民主政治进程缓慢。印尼在苏加诺时代原本有十多个政党，但在苏哈托执政后，大多被下令解散，除了执政的专业集团，仅保留了穆斯林团结建设党和亲政府的民主党。苏哈托政权不容许新党出现，对媒体严密管制，压制异议团体，反对派人士经常突然失踪。人民有了意见和不满没有正常的表达渠道，问题日积月累，直至积重难返。苏哈托治国标榜五大原则，即信仰真主、民族主义、人道主义、社会正义及民主，但民主方面无疑是苏哈托所标榜的五个治国原则中最弱的一环。他的政治稳定和军人参政、高压控制是密切关联的，并非通过真正的民主政

体得以确保。

（四）专业集团内部分化、反对党势力增强、军方态度转变、国际势力干预是专业集团和苏哈托垮台的催化因素

在这次事变中，印尼专业集团内部出现了分裂。先是专业集团主要派系柯斯哥洛扮演了这样的角色。接着，议会议长兼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民协商会议主席哈尔莫科也出来发难总统，希望苏哈托为了国家利益明智地辞职。在执政党内部出现裂痕的情况下，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和“回教运动”，以及前总统苏加诺的女儿梅加瓦蒂领导的印尼人民党等主要反对党和著名反对派人士则纷纷抓住时机，不断地把群众斗争和反对党活动推向高潮。印尼独立 50 年来，缺乏正常的权力交替机制，政局的演变，往往和印尼军方的立场有密切关系。面对不断高涨的群众运动和日益加深的经济萧条，印尼军队内部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印尼军方高级领导不愿看到大规模流血冲突带来的后果，而中下层军人也开始感受到经济危机带来的困苦，从而导致一向支持苏哈托的军队领导人也从一开始支持苏哈托到后来公开发出了要求他辞职的呼声。国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迟了原先准备提供给印尼的巨额贷款，外国投资者纷纷取消了购买印尼国营企业股份的计划，股市和汇市更趋动荡，使广大民众感到政府原先承诺的经济振兴成为泡影。同时，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向苏哈托发出顺应民心，让印尼早日过渡到民主政体的呼吁。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虽然苏哈托也着手改革，甚至公布了具体的计划，宣布接受社会各界提出的在政治、经济和司法等方面的改革建议，解除了他的部分亲属在内阁的职位，降低了油、电的提价，向市民免费分发部分生活必需品等等，以期缓和局势，但这些措施都为时已晚，除了交出政权别无选择。

第七章

国民党：百年老店的坍塌

国民党是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党。国民党人通常把自己的历史追溯到 1905 年同盟会的成立。从同盟会开始，国民党在大陆经历了同盟会时期、民初的国民党时期、中华革命党时期和后来的中国国民党时期。在同盟会创立的时候，孙中山和他的后继者的建党目标是追求英美式的现代化和民主政体。因此，在党的意识形态、组织体制和从政机制上都以英美式的政党为楷模。比如党内派别林立，组织体系松散。后来，追求在中国实行英美式的政党政治失败后，孙中山对中国政治环境下的革命党进行了重新定位。在党的组织体制上，效仿苏共的建党原则，实行党内领袖独裁和民主集权制。在党的从政机制上则实行“以党领政”甚至以党代政。但是，孙中山始终认为，这种体制只是在中国相对落后的政治文化条件下迫不得已的选择，最终还是要建立接近英美模式的民主政体。20 世纪 80 年代国民党进行的“政治革新”和“党务革新”就可以从孙中山这里找到理论依据。

由大陆败退到台湾初期，国民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危机交织在一起，台湾岛内一片混乱，陷入严重的困境之中。在这种状况下，蒋氏父子对国民党进行了改造。首先打破了党内派系纷争的格局，建立了以蒋氏父子为核心的权力机构。实际上是强化了一党专政和党内独裁，建立了“党国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构在结构上相互融合，执政党享有法理或事实上的专政地位，其他政党即使允许存在，也不允许挑战执政党的执政地位。20

世纪 50 年代的改造为台湾顺利实行经济和政治政策的调整，实行土地改革和发展地方自治，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这就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在这个背景下，台湾在 20 世纪 60 年代奉行“进口替代”战略，比较成功地实施了第二、三期四年计划，进入了所谓的“经济起飞”时期。进入 70 年代后，国民党在内外形势的压力下开始了“政治革新”。在“政治革新”的促动下，其他政治势力迅速产生并发展起来，对国民党形成了挑战。2000 年 3 月 18 日，台湾“总统”大选中，国民党败给了党龄只有 14 年的民进党。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以微弱多数当选为“总统”。独立参选人宋楚瑜得票率屈居第二，而执政的国民党的候选人连战获得的选票还不足陈水扁和宋楚瑜的一半。虽然政党轮流执政是国民党多年来进行“政治革新”、追随民主化浪潮的必然结果，但是国民党在 2000 年“总统”大选中遭遇的空前大失败，并不是由于民进党政治势力的大规模扩充。执政长达 50 年之久的国民党，拥有庞大的组织机构，掌握着雄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这些优势绝非民进党可比拟。国民党执政期间的政绩也曾辉煌一时。然而，历史还是在 2000 年 3 月 18 日这一天，无情地宣告了国民党一党单独连续执政时代的终结。面对历史的宣判，人们不禁会问，国民党，这个统治台湾地区长达 50 年之久的大党、老党何以落到如此的境地呢？

一、打压宋楚瑜使国民党一分为二， 民进党坐收渔翁之利

国民党组织内部发生分裂，导致力量分散是国民党选举失败的直接原因。李登辉继任国民党主席后，专断独裁、排斥异己，造成国民党在其任内接二连三地发生分裂。1993 年 8 月，国民党内部的一批外省籍少壮派在国民党十四大前夕另立新党。他们因为揭露李登辉等国民党高层黑金腐败和暗助“台独”现象，提出要对党进

行改革受到李登辉的打压而愤然离党。这是国民党阵营第一次较大的分裂，导致国民党一党霸权根基的松动。1996年，台湾首次实行“民选总统”直选，李登辉一反过去对林洋港的承诺，亲自出马竞选“总统”，使林洋港、郝伯村、陈履安等负气出走，造成国民党第二次分裂，国民党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李登辉政党。两次分裂使国民党元气大伤。但是，李登辉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又借“修宪冻省”，对颇受台湾民众欢迎的宋楚瑜采取打压措施。

1997年7月，台湾当局宣布“修宪冻省”，即以“宪法增修条文”的形式，通过冻结“台湾省长”、“省议员”选举，虚化现在的省级建制，使其有名无实。这种变相取消台湾省建制的做法，实际上是要在政治体制上和法律上改变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的事实，为反对“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分裂活动制造“法制根据”，从而制造“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假象，在体制上完成“独立建国”准备。“冻省”不仅显示了李登辉的“台独”意图，同时冻结“省长”选举实际上也是李登辉在遏制宋楚瑜，削弱宋楚瑜的力量。

实际上宋楚瑜早年一直拥戴李登辉。1988年1月蒋经国逝世，国民党内以宋美龄为首的“元老派”即“非主流派”与以李登辉为首的“主流派”，围绕着最高权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蒋经国去世的第一个国民党中常会上，宋楚瑜坚决支持推举李登辉做国民党代主席，并以当场退席抗议宋美龄等提出的延后推举国民党代主席的要求。在宋楚瑜提出抗议之后：这次会议通过了李登辉接任国民党代主席的决定，确立了李在党内的地位，从此，宋楚瑜与李登辉建立起被舆论称之为“情同父子的关系”。1989年5月，宋楚瑜升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1990年2月，国民党“非主流派”推出林洋港、陈履安为“正副总统”候选人，与代表“主流派”的李登辉、李元簇组合相抗衡，斗争异常激烈。在国民党临时中央全会上，宋楚瑜以辞职相威胁，反对非主流派有关投票产生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要求，使双李组合胜出，再次在关键时刻为李登辉保

驾护航，为李登辉清除非主流势力，成为第一任“直选”“总统”立下汗马功劳。1993年3月宋楚瑜出任台湾“省主席”。

宋楚瑜的保驾护航并没有使自己顺利成为李登辉的接班人。1996年3月“总统”选举后，李登辉就向外界透露他未来4年的“交棒计划”即在国民党第十五届二中全会时辞去党主席职务，改由连战“接棒”并专任“副总统”。随后，李登辉更是一手把连战扶为第一副主席，进一步确定与巩固连战的接班地位。接着，李登辉就开始了的对宋楚瑜的打压。1996年底的“国家发展会议”上，李登辉与民进党的主流派许信良联手达成了“冻省”共识，不仅要“冻省废省”，更要“废宋”，这是李登辉为连战顺利接替总统职位扫除障碍的关键一步。李登辉坚决排斥宋楚瑜，是因为他担心宋楚瑜担任“总统”后，不但会全面接受国民党资源，而且会自行其是，不受自己的摆布。李登辉一定要确保自己的“接班人”能够与自己理念一致，基本执行自己的路线。

宋楚瑜十分清楚李登辉的“冻省”意图，自然也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开始了“反修宪”、“反冻省”的斗争。“冻省”与“反冻省”之间的斗争实际上也是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这种权力斗争再次把国民党推向分裂的边缘。在“冻省”消息发布后，宋楚瑜以“请辞待命”的形式到香港等地“度假”，长时间不到省政府上班。不仅如此，宋楚瑜还多次公开批评“冻省”共识，指责是针对他的阴谋。1997年3月，宋楚瑜暗中指示，“省议会”召开“省发展会议”以民主的旗号反对李登辉。5月，宋楚瑜又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批评李登辉等人的“处事态度，让民众无法感受诚意”，还指责国民党中央政党路线模糊，使国民党失去了向心力。此后，宋又多次在省议会上炮轰国民党决策层，称“在台北冷气房内随便搞搞，将修宪搞得太粗鲁，简直是一团糟”，并扬言誓死维护“省议会”的存在。宋楚瑜的抗争使李登辉的“修宪冻省”计划受阻。许多国民党籍“国民大会”代表也对“修宪”持怀疑态度，经常借故不参加“国民大会”会议。

为了贯彻“冻省”计划，李登辉采取各种措施对反对“冻省”的“国民大会”代表软硬兼施，如在副省长吴容明的家中电话上安装窃听器，对“反冻省”最积极的“祥和会”负责人吕学樟停止党权两年，取消“反冻省”的元老级人物林渊源的不分区“国民大会代表”资格并给其党纪处分。更为恶劣的是威胁恐吓，在表决“冻省”案的前一天晚上，反对“冻省”的“国民大会代表”杨荣明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接着就泪流满面地匆忙赶回家。第二天，杨荣明故意身穿黑衣前往“国民大会”。他告诉别人，头一天他的夫人在电话中痛哭失声，说如果他不赶快返回家中，就见不到其家人了。杨荣明对国民党中央向其家人施压的做法十分不满，所以借穿黑衣来隐射国民党已开始走向黑暗。为了确保“冻省”案过关，国民党中央通过行政、党务等多头系统进行复式动员，并采用由高层人士“认养”国代、人盯人政策，连远在中美洲兼具“国代”身份的章孝严、驻美代表胡志强等人也都被召回参加投票，可谓是滴水不漏。在李登辉的强势作风下，“国民大会”最终通过了“冻省”决议。

在“修宪冻省”后，宋楚瑜更加“勤政”经常走访岛上的基层人家，树立起了“勤政爱民、清廉改革”的形象，成为民众心目中代表国民党竞选下任“总统”最理想的人选。在这种情况下，李登辉仍不放弃对其的打压。他一方面攻击宋楚瑜不安心省政，另一方面则督促连战多下基层培养自己的辅选助手，并要求连战也多“走访”，多在民众面前露面。尽管不断受到打压，宋楚瑜在民间的支持度并没有受到损害，相反却更加高涨，而李登辉和连战的支持度却直线下降，创下空前低纪录。1997年底的民意调查资料显示，李登辉的施政满意度降到39%，连战不到34%，而宋楚瑜高达80%。

鉴于宋楚瑜在选民中的形象，自1999年起，马英九、吴伯雄等实力派及老一代的退休官员积极活动，希望促成连战与宋楚瑜合作，也就是“连宋配”或“连宋合”，以此来确保国民党的执政党

地位。可李登辉出于私利，极力阻挠“连宋配”。李登辉惟恐连战与宋楚瑜合作后，自己就会被架空，失去昔日的权力，而且他也担心以连宋为核心的权力组合，将来也会修改其“台独”的政治路线，毕竟李登辉对于连战的政治理念也没有充分的信任。

宋楚瑜在民意声望遥遥领先陈水扁、连战以及其他可能的参选人的情况下，却无法获得自己政党的提名，只好选择独立参选的道路。1999年7月16日，宋楚瑜公开表示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总统选举。宋楚瑜的这一举措，令李登辉恼羞成怒。11月15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会上，李登辉针对“总统大选”发表讲话，以异常严厉的口吻痛斥国民党内的“背离分子”把国民党的资源据为己有，实际上是暗中指责宋楚瑜。16日国民党召开“考纪委员”会议，以宋楚瑜“违纪参选”为由作出开除宋楚瑜党籍的决定，6名“宋核心”干部的党籍也同时被撤销。把宋楚瑜踢出大门，标志着国民党第三次发生大分裂。

宋楚瑜离开国民党后，在大选中表现十分出色，几乎所有民意调查的支持率均领先于其他候选人，连战和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都无法与其相匹敌。这更加招致李登辉的不满。他不仅亲自披挂上阵，大肆抨击宋楚瑜，甚至造谣说宋楚瑜拿中共的钱进行选举。然而，这一切都不起作用，宋楚瑜的民意调查支持率仍然高居第一。国民党又想出了一招。1999年12月9日，国民党不分区立委杨吉雄举行记者招待会，在会上揭发宋楚瑜的儿子宋镇远于1991年2月5日在中兴票券公司开户，当日就购买了1400万元票券。12月30日又大举购买了1.06亿元的票券，而当时的宋镇远只是一个24岁的大学毕业生，因此，有理由怀疑宋镇远购买票券的巨额款项的来路。杨吉雄还进一步指出，宋楚瑜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掌握第二届“立法委员”选举提名权，有权决定重点辅选区域，加上刚经手办完“立法委员”选举的庞大支出，宋镇远在选后就有大笔金钱买票券，当然令人怀疑。

“兴票案”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起初宋楚瑜试图避而不谈，

把这些说成是对他的攻击。可是，全社会对这件事情都十分关注，宋楚瑜已经无法回避。12月10日，宋楚瑜选举工作室发言人表示，那笔钱是一位疼爱宋楚瑜的“长辈”给宋镇远的创业基金，以宋镇远的名义开户买卖中兴票券，并且本金不能动，只有利息可以用。几个月前钱就已经被提走了，没有利益输送的问题，如果有非法问题，可依法办理。外界对这一说法议论纷纷，有人相信，也有人不相信。但是，“兴票案”对宋楚瑜的打击很大，这实际上是把矛头对准了宋楚瑜的清廉形象。国民党利用“兴票案”大造声势，与民进党一起攻击宋楚瑜，说他的清廉形象是假的，还要求继续公布他的更多的黑金内幕，并宣称绝不能让其当选，否则他一定是“台湾的马科斯”。在随后进行的民意调查中，宋楚瑜的支持率迅速下滑，首次跌到24%，下降了8个百分点。相反，连战和陈水扁的支持率明显上升，均达到23%。国民党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12月13日，杨吉雄正式向“财政部”与台北“地检署”提出检举书，指出宋楚瑜涉嫌逃税漏税等法律问题，“财政部”同时展开调查，“兴票案”正式进入司法程序。

在外界强大的压力下，宋楚瑜不得不于12月14日召开记者会，澄清购买票券款项的来源。在“兴票案”余波未了之时，国民党又向媒体透露说，东帝士集团陈由豪曾向宋楚瑜捐款1亿元，于是又引起企业家的政治献金问题。新偕中建设公司董事长也向媒体表示，他在1992年“立法院”选举时，两次捐款共计8000万元给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宋楚瑜。面对种种指控，宋楚瑜已无力招架，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但是国民党并没有就此收手。不久，国民党就向媒体披露说宋楚瑜在夏威夷有一栋豪华别墅。宋楚瑜立即出面否认，并宣称如果自己在海外有别墅，就马上退出选举。然而，话音未落，“立法委员”林瑞图就向外界公布说宋楚瑜家在美国有5处住宅。宋楚瑜再次反击，公开表示这是国民党在有意打击他，并指出“总统府”秘书室主任苏志诚在台北有数处住宅，国民党为什么不查，却单揪住他不放。宋楚瑜的回击并没有挽

救其下跌的支持率。选举结果，宋楚瑜获得 466 万张选票，比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少 30 万张，最终与“总统”宝座无缘。

国民党对宋楚瑜的打击并没有使其候选人连战获得任何便宜。选举结果充分证明，连战与宋楚瑜的争斗造成了严重的内耗，削弱了国民党的影响力。显然，宋楚瑜的支持者大部分来自于国民党阵营。这次总统竞选在一定程度上是连战和宋楚瑜在争夺国民党的支持者，让国民党的票源一分为二。因此，民进党的胜利，可以称得上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二、国民党与“黑金政治”划上等号， 使台湾民众“让国民党下台”的 信念越来越强烈

严重的腐败问题是国民党选举失败的现实原因。如果说历史没有给国民党留下好的声誉，那么李登辉把持国民党的十几年，不但没有改善国民党的腐化状况，反而使其进一步恶化。李登辉在其任内纵容“黑金”已到了民怨沸腾的地步。台湾《民众日报》曾发表文章指出：李登辉执政让“黑金政策变本加厉腐蚀民主政治体制，官场贪渎、工程弊案如雪球般满地滚，社会治安败坏，人民并没有一个免于被害被枪杀恐惧的生活环境。”^①

台湾“黑金政治”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黑道势力与政权的结合。国民党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依靠黑社会打天下，利用黑道维护政权的现象。李登辉执政后，并没有与黑道划清界限，而是继续与黑帮势力为伍，并利用黑道势力巩固政权。

随着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反对派势力越来越强大，甚至在一些县市获取了执政权。面对反对派的威胁，国民党采取了“胜选至上”的策略。为了达到赢得选举，巩固其执政地位的目的，

^①《民众日报》，1999年5月20日。

国民党看上了黑道的地方性质具有动员选票的能力，便把在地方上有影响力的黑道人物提名为候选人参选，以保证选举席位稳操在国民党手中。这就为黑道人物通过参选“漂白”步入政坛打开了方便之门。于是，在台湾就出现了“黑道治乡”、“黑道治县”的怪现象。屏东县“议会”“议长”郑太吉由一个黑道上有分量的人物快速上升为屏东县“议会”“议长”的历程就与国民党的支持提名有很大关系。郑太吉只有国中学历，早年就混迹黑道，1986年在扫黑行动中被捕入狱，在狱中结识了几位有影响的黑道老大。出狱后，郑太吉靠开赌场赚了不少钱，以此为资本进军地方政坛。1990年初他以高票当选县“议员”，并获取了“副议长”的职位。他后来在多次选举中大力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被国民党看中，于1993年12月加入国民党。在1994年县“议员”选举中，郑太吉当选连任，因辅选有功，被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名竞选县“议会”“议长”并在国民党籍议员的支持下当选为“议长”。至于有多少黑道人物混迹在政坛，1996年11月16日，台湾法务部部长廖正豪在立法院透露，台湾的县市级民意代表中，有黑道背景者占35%左右，在省市级民意代表中占25%左右，在中央级民意代表（如立法委员会）中占10%至20%。

黑道“漂白”进入政坛，并不意味着从此“弃暗投明”。相反，大部分黑道人物进入政坛，是为了利用“民意代表”的身份来保护自己，为自己进一步为非作歹获取“护身符”，同时还可以借助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更大、更多的利益。面对社会上对黑道人物进入政坛的谴责和批评之声，李登辉居然还为之辩护说：“黑道古今中外都有，不独台湾才有，社会自由化了，各种力量都可以出来。”其一名亲信公开承认说：“金权黑权是巨大的社会力对政权的取得与维持有帮助。”

国民党不仅提名黑道人物直接参加选举，还利用黑道人物为自己助选。黑道势力在选举中可以充当的角色包括“候选人的随身保镖，或坐镇竞选总部，或担任因选举引发纠纷的鲁仲连角色，或从

事布桩买票的桩脚”。一般黑道大哥手下都会有不少人手，候选人就聘用这些人自己拉票，同时负责监票，保证花钱购买的票能够投给自己而不“跑票”。有些候选人还用黑道势力来威胁恐吓自己的对手。虽然每到选举的时候，台湾当局也会做做样子扫黑，但是只会触动黑社会上的虾兵蟹将，对于能够为政府服务的有势力的黑道，是绝不会下狠手的。对此，一位黑道人物直言不讳：“以前选举也会扫黑，政府说是清跑道，但我们真正有影响力的兄弟根本不必理会或跑路，因为候选人需要我们，会设法维护我们的安全。有的兄弟自己跳出来参选时，警方还要派员保护他们。”^①

在台湾，官商勾结、黑白勾结等贪污腐败现象也十分严重。1996年，台湾展开扫黑行动后，在民众检举下破获了不少官商黑道勾结的大案，充分暴露了台湾黑金政治的严重性。台北县板桥市四汴头抽水站工程舞弊案就是一起典型的官商勾结、牟取非法利润的贪污大案。台湾商人钟太郎通过国民党“省议员”余慎打通关系，承接了这一防洪抽水工程。时任“省住都局”局长的伍泽元收取了钟太郎一笔巨额行贿款，款额高达600多万元新台币。工程主要设备在伍泽元的授权下完全按钟太郎选定的厂商机械设备型号办理，在招标中，也由钟太郎选定竞标的厂商。后因其他案件，把伍泽元卷入，才使四汴头抽水站工程舞弊案浮出水面。1996年12月，伍泽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公民权利终身。伍泽元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于是这一案件与其他许多案件一样，进入了没长的司法审判程序。在1998年的“立法院”选举中，国民党居然提名伍泽元为候选人。伍泽元以屏东县第二高票当选“立法委员”，由一个罪犯摇身一变为“民意代表”。这更加深了国民党在选民心目中的烂党形象。

台湾的军事采购数量一直十分庞大，动辄数百亿甚至上千亿元新台币。因此，军事采购与台湾的工程承包项目一样，是发生收受

转引自王建民著：《台湾的“黑金政治”》，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

回扣、贪污渎职的滋生地。1993年发生的“尹案”就是国民党官员贪污受贿的典型例子。1993年12月9日，台湾海军总部武器获得室执行长尹清枫神秘失踪。次日，在海上发现了其尸体，经调查发现是被人勒死后弃尸外海的。案发后不久，在尹清枫住所发现了一卷录音带，录音带暴露了多笔军火采购腐败内幕，涉及的人员有现役军官、退役军官、情报人员及军火商。从尹清枫的案子中，又引出了多起泄露军事机密文件的“案中案”达二三十件，仅在与尹清枫命案有牵连的军火商张家成家中，就搜查出27份军购机密材料。尹清枫命案还引发了“拉法耶”护卫舰重大军购舞弊案。据调查，台湾政府共花费27亿美元购买了6艘“拉法耶”护卫舰，而回扣高达30亿法郎，其中台方收取了3.6亿美元，全被秘密瓜分。这一军购舞弊案件后被查与李登辉有牵连，因此也就不了了之了。

而国民党所擅长的“贿选文化”更为民众所深恶痛绝。贿选不过是买票的代名词，就是用金钱或物品等换取选票。贿选买票已经成为台湾选举的一种文化、尽管台湾法律明文禁止买票，但是仍然无法阻止买票的流行。台湾各级选举中，贿选问题都十分严重。1993年县市长选举贿选案件共达261件，1994年县市议员及乡镇市长选举共发生贿选案件385件，1994年省市长及议员选举后，各有关司法单位共受理1020件贿选案件。1994年省市长选举时，台湾有关部门公布了10种常见的买票贿选花招：一是签六合彩。以候选人的编号为签注方式，若候选人当选，则赔以若干倍数的金额。为求得巨额收益，签注者一般都会全力以赴地为该候选人拉选票。二是餐券存根兑换现金。候选人在举办的募餐会上出售餐券，该候选人当选后，购买者就可凭餐券存根向竞选办事处领取多于餐券5倍的现金。三是办“流水席”。候选人在竞选活动期间摆设“流水席”供人吃喝，或由他人出面在各餐厅宴请选民。四是有奖摸彩。候选人在选区办摸彩大会，奖品有汽车、电视机、冰箱等，用这种办法来诱惑选民投票。五是代缴税款。候选人承诺为投票支持自己的选民代缴税款，选民由此可以节省一大笔开支。六是代办

贷款。候选人一般都是政商关系良好或神通广大的人，他向选民承诺可以为选区的选民办理小额贷款，一切免费服务。七是变相有奖问答。候选人散发印有本选区各候选人的征答问卷表，如果选民选择该候选人并当选，选民就可以因此获得丰厚奖品，而且参与者人人有奖。九是有奖收集身份证。候选人为削弱竞争对手的票源，派人向对方票源根据地选民承诺，若在投票前一晚交出身份证并在投票日当晚领回，就可以得到现金作为回报，通常价码是 1000 元。十是招待“桩脚”（指在选举中能掌握选票去向的人）或重要选民旅游。为避免买票触犯法律，有的候选人便采取集体旅游的办法招待支持自己的“桩脚”与选民。^①

在实际操作中，买票或贿选方式远不止这些。为了达到买票的目的，又逃避法律的制裁，候选人总是在不断翻新花样。至于选票的行情也是年年见涨，从早期的几十元到后来的 100 元、数百元，再涨到数千元，甚至高达上万元。据报道，1997 年底县市长选举时，彰化县一位候选人买票共花费 3 亿多元新台币，创下了台湾历年来单一候选人买票金额最高纪录。在选举竞争激烈的时候，买票候选人还会不断地抬高价码。1992 年“立法委员”选举时，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在投票前一周，采取全县普遍实行一票 300 元的买票计划，而另一位非国民党候选人则把价码抬高到每票 500 元。在得到这个消息后，国民党要求其候选人抬高价码，该候选人觉得自己无力支付，于是竞选总干事就提议由“省民政厅长”签下 3000 万元的支票，向中国化学制药公司和味王公司紧急调用现金，但是没有达到目的，结果国民党的候选人败下阵来。

其实，买票只不过是一种投资。这些候选人先用钱收买选票，达到谋取公职或“民意代表”的目的。一旦在选举中胜出，就等于手中掌握了权力，而有了权就等于有了钱。台湾公职人员和“民意代表”的薪金收入本来就很高，还可以领取各种名目的收入，如研

① 参见王建民著：《台湾的黑金政治》，黑龙江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5 页。

究费、考察费、助理费等。更何況，当大权在握后就会有很多黑色收入，如工程受贿等。所以，贿选只不过是為了得到更多的回报付出的小小投资。正是由于这些官员在通往官道的路途上付出了代价，所以这就更促使他们在获取权力后要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回来。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国民党贪污受贿案件时有发生。

党营事业更是台湾黑金政治的一只怪兽，是国民党党内贪污腐败的祸根。党营事业是指国民党投资或控制的一大批经济实体。国民党党营事业规模庞大，是国民党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也是其维持统治地位的重要靠山。比如国民党在各种选举中需要的大批资金都是靠党营事业提供的。据报道，在 1994 年省市长选举期间，国民党财务委员会向党营投资管理委员会要了 45 亿元经费，1995 年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时增加到 65 亿元。2000 年总统大选中，党营事业公司表示只向国民党候选人连战和萧万长捐赠了 5 亿元，但是民进党指控其计划投入的选举经费超过了 100 亿元。

党营企业完全是在国民党一党独大体制下形成的。台湾长期处于“党即国家”、“党即政府”的情势下，掌握政权的国民党依靠特权建立起一大批“党有企业”，于是党营资本成为台湾社会一种特别资本体。据国民党党营投资事业管理委员会 1999 年盈余报告，1998 年国民党七大控股公司获利约 80.5 亿元。另据资料显示，从 1992 年到 1999 年国民党党营事业共获取 675.4 亿元的巨额盈余。

国民党庞大的党产并不是全来自正当经营，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靠侵吞“国库”赚得的。国民党通过五大手法侵占“国库”财产。一是廉价购买或无偿占有“国土”。国民党惯用的手法是“据地为王”、“先占先赢”然后“廉价租用”，最后是“低价买进”。台北博爱特区的国民党中央总部土地就是典型的例子，国民党在租用多年后，于 1990 年向“国有财产局”以 3.7 亿元买进，较当时市价低了 40 亿元。二是“国家预算补偿党营事业”。由国库直接拨款给国民党党营事业，如中央社、中央日报、中正书局与中广公司等党营文化事业，过去长期享受政府预算补贴。三是委托业务。即政府

成为党营事业的大客户，如中兴电工与中央产险等党营企业长期与政府所属机构与国营企业有业务往来。四是双向委托投资，包括政府委托国民党作“人头股东”，以此规避“国会”监督。五是“党政合资”，政府与国民党携手合作创业是党营事业得以壮大的关键，因为这类事业多半具有特许、独占、垄断性质。^①党营事业受到了党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国库通党库”、“与民争利”的指责声不绝于耳。

“兴票案”虽对颇受选民支持的宋楚瑜是致命的一击，但是国民党本身的资产问题也成了攻击的对象。“兴票案”之后，党营事业的金钱交易与不法活动变成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宋楚瑜的支持度下降的同时，国民党候选人连战的支持率也随之下降，而民进党的支持率却首次有所上升，这也映射出台湾选民对国民党黑金政治的厌恶已超过了对台独当政的恐惧了。^②2000年1月13日“总统”选举角逐关键之际，由民进党“立委”组成的国民党党产讨债公司，揭发国民党党产弊端，指责该党在1976年曾将用来改善台湾人民生活、发展国营事业的逾亿美元美国援助，从国库搬到了党库。此举对国民党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国民党当政期间不仅黑金纵横 社会治安也败坏到极致 人民群众缺乏安全感。自1996年起，台湾社会治安问题日益严重，凶杀案接连不断。1996年11月21日上午8时，两名歹徒持枪闯入桃园县县长刘邦友官邸，将刘邦友等8人杀死，一人重伤。“刘邦友命案”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暗杀事件。如此重大的杀人事件，足以说明台湾社会的混乱、失控已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刘邦友命案”之后不久，11月30日晚上，民进党妇女发展部主任47岁的彭婉如又神秘失踪。3天后，彭婉如的尸体被发现，全身赤裸，被刺35刀。这是继刘邦友案之后，又一件轰动台湾社会的治安事件。

参见王建民著：《台湾的“黑金政治”》，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参见纽约《世界日报》，1999年12月15日社论。

继刘邦友、彭婉如两起大案后，台湾的刑事重大案件一直居高不下。据台湾内政部统计，1997年1月至2月共发生34起绑票勒索案，平均每两天一起。“白晓燕绑票案”又再次增加了民众的不安。著名艺人白冰冰，是台湾家喻户晓的“本土艺人”。1997年4月26日凌晨，白冰冰17岁的独生女儿白晓燕被绑票。白冰冰的知名度使这起绑票案格外引人瞩目，而且绑匪狮子大开口，勒索500万美元，打破台湾绑票史纪录，更把白家母女推向绑票案排行榜的榜首。白晓燕被绑架后，绑匪残酷地斩下她的一根小指头，送交白冰冰。白冰冰和“总统”、“行政院长”、“省长”、“市长”都有深厚的交情，多方力量被动员起来寻找白晓燕的下落。尽管如此，4月28日的晚上，警方找到的只是白晓燕伤痕累累的尸体，浮在一条大排水沟里。民众对治安的不满、对歹徒的愤怒，终于像火山般爆发。5月4日，约有10万民众自发举行了游行示威。此次抗议风潮是民众对国民党不满情绪的总爆发。

国民党在李登辉的控制下日益腐败，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也日益丧失，最终使台湾民众产生了通过选举“让国民党下台”的心态。而民进党在竞选中也把重点放在针对国民党贪污腐败问题上，提出建立“平安、廉洁”新政府的口号。“总统”大选揭晓，国民党终因黑金政治而失去了江山。

三、国民党自身组织体系的衰落 使其失去了选举竞争力

国民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百年老店”，再加上从退居台湾后就独霸执政地位，这就使得该党组织机构十分庞大。据统计材料，在下台前，国民党每年的人事开支就将近40亿元，占经费总预算的70%。^①但是，多年来，由于国民党疏于党的自身建设，出现党

① 参见全国台湾研究会编：《台湾选举纵横谈》，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员思想混乱、党中央缺乏权威和控制力、党的基层组织涣散的现象。国民党本身多年来的积弊是它丧失政权的重要原因。

首先，思想涣散使党失去了凝聚力和向心力。在退居台湾后，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定为“国父思想”。依靠这面旗帜在台湾对国民党进行“改造”、“革新”，靠它来凝聚党员，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国民党的思想统一，维持了国民党在台湾的执政地位。但是李登辉主政后，以“政治革新”为名，改变了“国父思想”在国民党内的指导地位。在1990年的“国是会议”上，李登辉公然声称“国父思想”成了“朝野改革派代表共同质疑的思想体系”。^①于是“国父思想”开始被“李登辉主义”所取代，而“李登辉主义”就是“台湾主义”，是“国民党现阶段的内政外交的理论与实际”。^②中国国民党的思想闸门由此被李登辉打开，各种思想蜂拥而入，原来的意识形态大坝轰然垮塌，造成党内思想空前涣散，出现信仰危机。

与此同时，李登辉在大陆政策上的反复也造成了党员思想的混乱。在1988年至1990年间，李登辉主要沿袭蒋氏父子时期的既定政策，认为“中国只有一个，应当统一，也必将统一。”但是从1991年起，随着权力基础的巩固，李登辉开始不断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1991年抛出“一个中国，两个对等政治实体”；1993年在西雅图亚太经合会上抛出“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1997年则以“行政院新闻局”名义在《透视“一个中国”问题》的说帖中抛出“一个分治的中国”；1999年7月彻底抛弃一个中国的原则，抛出了“向历史交代”的“两国论”。而且，为了达到“台独”的目的，李登辉经常与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合作，与其主席许信良在官邸秘密会晤，与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陈水扁把酒谈心。这不仅严重伤害了认同“一个中国”主张的党员们的心，而且

台湾《民众日报》，1990年9月18日。

纽约《世界日报》，1993年11月21日。

也使许多基层党员和党工“不知为何而战”，^①也弄不清楚党中央究竟是主张统一还是主张独立，甚至有人怀疑党主席李登辉是要向民进党“和平转移政权”。作为一个执政党，思想涣散必然失去应有的凝聚力、战斗力和领导能力，最后失去执政地位。

其次，国民党中央的权威受到挑战，控制能力急剧衰退。“政治革新”之前，国民党控制着台湾绝大多数政治和社会资源，国民党中央的政策就等于法律，决策就是命令，大多数国民党籍“立法委员”要靠党中央提名才能当选，连“立法院”都成了国民党中央的橡皮图章。在“政治革新”之后，国民党籍候选人对本党组织系统的依赖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党员只能靠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参与竞选，有时需要耗费自己大量钱财，经过艰苦奋斗才能击败对手，这样一来，国民党中央权威也就受到挑战，中央对党员的支配能力也就越来越小了。曾任国民党桃园县党部主委的吴梦雄哀叹说，从前主委约见一个党员，被约见的人会兴奋得三天睡不着觉，而现在主委要见一个党员，人家还不一定有空见你。更有甚者，有些国民党人不愿意被提名为本党的候选人，在竞选中不敢透露自己的国民党身份，害怕背上国民党的政治包袱。

国民党开党禁后，民进党等党的力量开始做大，在地方和中央一级选举中可以分到一杯羹。如1989年底民进党一举夺得21个县市市长中的6个。1995年12月2日立委选举，国民党获得85席，民进党获得54席，国民党的席位虽然维持过半数，但只比半数多2席而已。随着国民党不再能够获取各级议会中的绝大多数地位，而只能够勉强维持刚过半数席位，很多国民党籍“议员”的身价也就抬高了，他们拥有了与党讨价还价的资本。一些独立性强的“议员”经常利用手中的表决权向国民党中央进行政治勒索，如果无法满足他们提出的要求，他们就不会按照党的意志进行投票，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也就受到了威胁。为了维持手中的权力，国民党中央往

往只能答应他们的要求。有些国民党籍“议员”甚至联合起来对抗党中央，特别是在“立法院”内，“党鞭”指挥失灵，党内利益集团各自为阵，国民党籍“立委”跑票现象经常发生，更有些国民党籍“立委”私自与在野党派进行“议事合作”，导致国民党在议事运作中经常出现险情，有时甚至险些败在自己党员的手中。例如，在第三届“立法院长”选举时，李登辉曾亲自出面宴请国民党籍“立委”要求他们支持国民党中央提名的候选人刘松藩。经过两轮的投票后，刘松藩仅以一票险胜民进党与新党联合推举的候选人施明德。刘松藩虽然当选了，但是，这位“一票院长”在后来主持“立法院”的议事运作中，就因为只是以一票险胜而处处受到在野党派的掣肘。

再次，党的基层组织涣散，党员流失严重。国民党的整个编制就像是一个“倒金字塔”，党中央人事上越来越庞大，而党的地方组织如乡镇的基层组织却越来越弱小，党产都集中在中央一级，3700多名党的专职工作人员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他们或者忙于争权夺利、拉拢选票，或者闲散地待在办公室，根本没有人关心如何通过改革来挽救国民党濒临垂危的政权。不仅如此，基层组织与中央之间的联系渠道也不畅通，他们在党的重大决策中的发言权甚微，所谓“党有、党治、党享”完全是党上层的事情。而党中央的官僚作风十分严重，有的党工“在家中为孙子勤洗尿布，但在办公室却要专人为他冲泡茶水。”^① 国民党中央原秘书长吴伯雄就曾坦言：“党员缺乏组织意识 基层组织涣散 组织活动推展困难”。^②

国民党虽然号称有 270 万党员，但是真正与各级党组织保持联系的党员只有 195 万，甚至更少。而且，党员流失十分严重，尤其是年轻党员和学历层次高的党员流失更为严重，他们或者加入在野党，或者退党自立新党，更多的是不满国民党的腐朽老化而退出了

台湾《联合报》，1996年8月27日。

台湾《中央日报》，1996年8月24日。

党组织。有一些党员虽然还留在国民党内部，主要是出于利用国民党的资源为自己谋利益，已经谈不上是出于忠于国民党的信仰。1994年的台北市长选举、2000年的“总统”选举都出现大批国民党党员把自己的选票投给其他政党候选人的现象。

党员流失严重造成国民党优秀人才短缺，尤其是青年人才严重稀缺。于是，每到选举的时候，国民党就越来越感到很难推举出形象、人品都十分出众的候选人与其他党派竞争。为此，主持辅选工作的吴伯雄曾向记者抱怨说：“要找一个学识、能力、品德都受肯定又适合竞选的人才，很难！”^①

总之，国民党在2000年3月18日的失败绝非偶然。党内四分五裂削弱了党的力量，瓦解了党的支持群体；而在其执政期间，黑金政治逐渐成为台湾社会一种恶性蔓延的毒瘤，成为台湾人民挥之不去的阴影。正如台湾舆论所说，国民党败在分裂与“太烂”。李登辉主政十年来，“经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权谋斗争，台湾的政治俨然变成威信扫地，廉耻荡然，宪制混乱，巧取豪夺的戏码，甚至已有积重难返之势”。党内分裂，黑金政治，再加上“百年老店”内部的老朽，终于把国民党拉下了马。

后 记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盛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的确，大党老党接连失去政权的严酷现实，对我们这个有着80多年的历史，连续执政50多年的党，其震撼犹如警钟敲响。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要加强研究、吸取教训。中央党校党建部世界政党比较教研室近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其中由中央党校求索音像出版社出版的电视片《世界执政党兴衰史鉴》，得到了广泛的好评。特别是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过程中，广大党员和干部对电视片《世界执政党兴衰史鉴》的反响越来越热烈，在这个基础上，中央党校出版社盛情邀请我们编写此书。

本书选出了前东欧国家、苏共、日本自民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度国大党、印尼专业集团和国民党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致力于对这些大党老党丧失政权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大部分内容是在电视脚本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同时加进了前东欧国家执政党盛衰的内容。我们希望它能够对我们党正在进行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提供一些素材。

本书各章的具体分工为：王长江（导言）；姜跃（第一章、第四章）；王瑜、季正矩（第二章）；王瑜（第三章、第七章）；李国伟（第五章）；耿克民（第六章）。